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二章（下）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第二章（下）

澳门的黄金时代

当中国政府允许葡萄牙人长期性地在澳门建立经贸基地以后，中国商人们、以及葡萄牙商人们，都蜂拥而至、来到澳门。【不过，葡萄牙人数量并非很多；1583年的时候，有900葡萄牙人；1640年的时候，在澳门的26000人中，只有1200葡萄牙人】。澳门很快成为葡萄牙人的三条重要贸易

航线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广州、澳门、日本长崎；以及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在这三条贸易航线中，广州、澳门、长崎的这条贸易航线尤其利润丰富，因为葡萄牙人起到了中间商的重要作用，把中国丝绸运送到日本贩卖，而把日本的白银运送回到中国。尤其是，由于日本海盗【也包括中国海盗】猖獗的原因，1547年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商人与任何日本人进行直接经济贸易，所以，葡萄牙人成为了在中日之间的唯一垄断性商业人员。这使得葡萄牙舰队在广州、澳门、长崎之间的贸易航线获得了很大利润。

澳门的黄金时代，恰逢葡萄牙国王与西班牙国王于1580年至1640年间相互联合【即，葡萄牙国王与西班牙国王在那时是同一人】的时代。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想改变澳门航线的既有状态，因而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以及西班牙人在菲利宾马尼拉的贸易继续进行，而葡萄牙人继续与中国人做生意。

澳门不仅成为了一个重要贸易港口，而且，也成为了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一个活动中心。天主教把这里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基地，想要从这里出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给中国与日本的广大人口。天主教耶稣会于1560年代首先来到，然后是天主教道明会也于1580年来到。他们很快在这里建立起了教堂与学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耶稣会所建的圣保罗教堂以及道明会所建的圣多米尼各教堂。1576年，澳门被罗马教宗设立为天主教体系下的一个教区，并任命了第一位主教。

1637年—1844年，下降的年代

1637年，日本政府对于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敌意愈演愈烈，以至于日本方面彻底关闭了与外国人来往的通道；日本从此进入了闭关锁国的年代。在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下，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国民离开国境（那些已经离开国境的日本人也不被允许回国）；任何外国商船也不被允许在日本的任何港口停靠。不过，来自于荷兰的商船得到了例外许可，仍然可以在长崎外海的一个人工小岛上与日本商人进行贸易。

因而，澳门的最有利润的商业航道，即，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经由澳门的贸易，不得不停止了。1641年，荷兰人占领了马六甲；这使得澳门与印度果阿之间的、经由马六甲的航线也受损。

1685年，中国康熙皇帝颁布命令，禁止与任何外国进行商业贸易。澳门失去了优惠贸易政策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俄罗斯，相继来到广州与澳门，在广州及澳门设立厂房与商业办公区。1790年代，英国在这些经贸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直到1844年4月20日以前，澳门一直归属葡萄牙驻印度的基地人员管理。1844年以后，葡萄牙里斯本政府把澳门看作是葡萄牙本部政府下属的一个海外直辖区。

1844年7月3日，中美两国政府在澳门签署了和平与商业协议。这被称为中

美望厦条约，因为条约签署地是在澳门地区内一个叫做望厦的村庄。这标志着中美之间正式官方往来关系的开始。

1844年-1848年，香港的影响

当中国于1842年把香港转让给英国管理以后，澳门作为区域商业中心的地位就进一步下降了。各国的许多大型货船都被香港地区吸引，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深水港去停靠。

为了与香港的贸易地位竞争，葡萄牙宣布澳门为自由港。然而，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的冲突导致了一些混乱。1849年，澳门的葡萄牙总督被暗杀。1883年，葡萄牙人又重新把澳门置于葡属印度果阿的管理之下。1887年，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署协议；中方允许葡萄牙永久性地居住并管理澳门，葡萄牙方面则保证，若没有中国的同意，就绝不会使澳门独立。

1871年，澳门建起了一家中医医院。1892年，孙中山把西医技术引入了这家医院。

1848年-1870年代，澳门成为了臭名昭著的运送苦力的中转站。

1938年-1949年的二战前后期间，澳门成为了一个收容难民营中心。短短几年之间，澳门的人口从20万人增长到70万人。这些难民收容工作，主要由总部位于里斯本的葡萄牙著名慈善机构、仁慈堂组织进行。

在二战期间，在一定有限的程度上，日本人尊重葡萄牙人在二战期间的中立的立场。因而，在一个短暂时间内，作为华南地区的唯一一个中立港口，澳门享受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当日本占领了广州与香港以后。

1943年8月，日本军队劫持了停靠在澳门的英国蒸汽船SIAN号，并杀死了20名英国卫兵。接下来的一个月，日本要求，由“日本顾问”负责指导澳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否则，日军就会军事占领澳门。这导致了，澳门处于日本的事实掌控之下。

当美国人发现，名义上号称中立的澳门港口准备向日本售卖航空汽油的时候，美国军机USS ENTERPRISE 于1945年1月16日轰炸了澳门的停机库，毁掉了储藏在那里的航空汽油。1945年2月、6月，美国飞机也轰炸了那些地方。【1950年，葡萄牙政府为此向美国提出抗议；因而，美国向葡萄牙支付了两千万美元的赔偿金】。日军在澳门的占领于1945年8月结束。

1949年-1999年，澳门与共产主义中国

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中共宣布，中国政府从前与葡萄牙里斯本政府所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因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是外国政府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但是，中国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处理那些历史遗留问题，因而，并没有对澳门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北京政府对英属香港也采取了同样类似的立场。

1951年，葡萄牙萨拉查政府再次宣布澳门为葡萄牙海外属地。

1954年以及接下来的数年当中，澳门举行了赛车体育赛事。

1962年，葡萄牙澳门政府颁发许可，特许“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赌博业。这个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是由一些香港与澳门地区的商人们组成的一个联合团体公司。该公司因而拥有在澳门经营赌博的垄断权力。该公司把西式赌博游戏引入澳门，并大力改善了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交通。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香港赌客来到澳门赌博。

因而，从1960年代开始，由于赌博被澳门政府合法化，澳门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赌博业城市。

1966年，在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文化革命时期，澳门也爆发了暴乱事件。澳门的中国本地居民与澳门政府之间爆发了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所谓的“12-3”事件。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葡方官员对于澳门一些居民及商人关于某些建筑许可的小型纠纷的过度反应。在之后的暴乱冲突中，8人丧生，葡方政府全面瘫痪。1967年1月29日，葡萄牙澳门总督，JOSE MANUEL DE SOUSA E FARO NOBRE DE CARVALHO，在当时的葡萄牙总理萨拉查的支持下，向当时的澳门华商总会，签署了一份官方正式道歉书；当时的澳门华商总会主席、何贤，出席了澳门总督的道歉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上，悬挂着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

当时，葡方澳门政府还签订了两份协议。一份协议是葡方澳门政府与澳门华人团体所签订的。另一份协议则是葡方澳门政府与中国大陆政府所签的协议。在与中国大陆政府签订的协议中，葡方政府保证，向本地华人社区支付两百万澳门元赔偿金，并且，禁止国民党政府在澳门地区的活动。

葡方澳门政府的这些行动，平息了当时的骚乱与冲突，也改善了政府方面与澳门社区里面的左派团体之间的关系。从那以后，官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

澳门的这些事件的发展，促动了香港地区的华人左派团体也想要向港英政府发出同样的冲击。这导致了1967年的香港左派团体所引发的一系列暴乱事件。

在此期间，尤其是在1974年葡萄牙里斯本的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政府曾经提议，把澳门地区归还给中国政府；但是，这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

1999，澳门政府权力回归中国

1986年5月20日，中葡政府双方开始了正式谈判，解决澳门地位的问题。从1986年6月30日至1987年3月26日，双方进行了四轮协商。1987年4月1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地位问题的正式宣告。双方商定，1999年12月20日，澳门将要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政府主权。

1993年3月31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该法将于1999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证：在一国两制体系下，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会适用于澳门特区；澳门政府在外交与国防事务之外，在各项行政事务上享有高度自治；并且，这种状态至少保持五十年【即2049年以前】不变。

尽管早在1960年代葡萄牙政府就试图谋求把澳门地区归还给北京政府，但中方当时一直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此，直到1999年，即香港回归两年以后，澳门地位的历史性问题才这样尘埃落定。

1999年—现在，澳门成为亚洲的拉斯维加斯

2002年，澳门政府结束了赌博行业的垄断经营局面【即，在此以前，只有获得澳门政府特许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才能经营赌博业，而任何其他商人都不能在澳门经营赌博相关行业】。有多家赌博商业集团与财团公司进驻澳门。2004年，澳门开始建造许多新的酒店与赌博设施。从此，澳门崛起为亚洲的赌博业中心。2017年，澳门赌博行业的营收【三百亿美元以上】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业营收【一百亿美元左右】的三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Macau
（以上信息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

在近现代历史初期，由于需要面对君士坦丁堡【即现代的伊斯坦布尔】陷落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即突厥人、或现代土耳其人的祖先】之手、欧亚陆路贸易瓶颈被强行掐断的局面，葡萄牙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开始走出去、开拓国际贸易的航海大国。从此，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开始了所谓航海大发现的时代。葡萄牙本是欧洲位于西班牙半岛上的一个弹丸小国；但是，葡萄牙人却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帆船制造和远航技术以及非凡的探险精神，从欧洲的南端，一直绕海航行、绕过非洲大陆，来到了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南海、日本。葡萄牙人所发现并开创的航线，为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开辟了道路。在这些西方人的努力与探险精神下，全球贸易的时代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本书前文所述，西方世界里面的三种人、三种势力都有着不同的表现。那些信仰敬虔的人，想要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与福音传遍天涯海角；他们也希望通过公平与自由的贸易活动，造福于世人，使得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从这些经贸活动中得到益处。然而，在西方世界中，还有很多唯利是图、没有信仰的人们；他们常常在世界各地行许多不公不义之事。在那些行驶到世界各地的葡萄牙人商船上，既有勤劳、富有冒险精神的水手们，也有信仰敬虔圣洁的天主教耶稣会、道明会的宣教士们；也更有那些唯利是图、贪婪狡诈、自私自利的好勇斗狠之辈。

在葡萄牙人的商船舰队上，沙勿略、这位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第一次来

到印度果阿、来到日本长崎、来到中国南海地区。沙勿略把基督福音传播到日本、印度等地。至今，在印度果阿地区的大多数印度人口中，都是信仰基督教、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基督徒们。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从日本人的口中听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对于日本影响至深。因而，沙勿略给天主教耶稣会在欧洲的本部写信，请求耶稣会本部从欧洲选拔那些知识分子精英，派遣他们来到中国、向数量巨大的中国人口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沙勿略终生未能踏上中国大陆本土。后来，沙勿略在中国南海地区外海的岛屿上，因病逝世。

正是在沙勿略生前的推动下，在沙勿略去世几十年后，欧洲传教士、知识分子精英、利玛窦等人来华。从此，基督教文明体系开始与中国的儒家文明体系、佛教体系等第一次真正地相遇。

在经贸方面，由于葡萄牙本身仅仅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其人口和土地都很少，因此，后来，当西方其他国家开始陆续跟随葡萄牙的脚步进行远航贸易的时候，葡萄牙渐渐从历史舞台的中央，退居到一个不是很重要的角色地位。但是，在强烈的天主教信仰传统的影响下，葡萄牙仍然给南美洲很多国家、以及中国的澳门地区带来了很多有益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澳门，从一个曾经人迹稀少的荒岛地区，变为今天的国际化都市；在整个世界上的葡语地区的经贸发展上，澳门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澳门的历史，见证了中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互动、交流的缩影。葡萄牙人对于澳门长达四百年的、基本上和平的统治管理，见证了，西方人中的大多数，在向海外扩张的时候，寻求的目的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不是领土的扩张，更不是侵略、压榨等不公不义之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应当公道地、实事求是地看到一些西方人所作的许多不公不义之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公道地、实事求是地看到，另一些西方人所作出的巨大经贸、科技、文化贡献；我们更应当公道地、实事求是地，在那些西方来华传教士身上，看见他们信仰的热忱以及对于耶稣基督福音传播事业的真心真意的挚情奉献。

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

从1840年至1900年，除了俄罗斯、日本、英国、葡萄牙、法国、以外，荷兰、德国、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与中国之间发生了很多碰撞、互动、交往、贸易、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泥沙俱下、好坏参杂；在西方国家、西方势力与中国政府与民间交往的过程中，既包含着文明的、先进的、良善的、公义的事情，也包含着不义的、唯利是图的、不公不义的、强暴侵略之事。在这些事情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起因、过程、结果、以及许多不同的成分同时在其中发酵。往往，这些事情中不同的成分都与：——是否有正义性、合约性、信实性、公平性、自私还是恩慈；是否是以大众利益还是以统治者的专有利益为考虑要点；是否考虑互惠互利、诚实无欺、还是仅仅考虑己方私利；等等——有着重要的关系。

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既要看到西方国家在过去数百年的近现代贸易历史中的贡献、给中国百姓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益处【从农业技术革命、到机械、电器、冶金、纺织革命等等，都给整个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益处；使得大量的普罗大众的平民生活状态告别了贫困饥荒、或是一穷

二白、衣不蔽体、贫民窟常常泛滥的古代时期，而开始进入每一个、或大多数普通人都能够享受物质文明科技进步的现代化时代】；同时，我们也不应当盲目地崇洋媚外，误以为凡是外国的就一定是好的、是完美的。事实上，我们的心灵与灵魂的归依，我们生命所应当倚靠的，不应当是任何被造之物，而应当是那创造天地、赐予人生命的造物主自己。

+++

【罗马书 1章相关文字】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

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3章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9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10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14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15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16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17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18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19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20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22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

（引述百度百科相关文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9A%E6%B8%85%E4%B8%AD

%E5%85%B4%E5%9B%9B%E5%A4%A7%E5%90%8D%E8%87%A3/3204275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有两种说法，说法一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说法二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

曾国藩

（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左宗棠

（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 ），组成中法混合军 ，称常捷军 ，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 1866 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破陕甘之乱军后，力主远征新疆。为表示自己讨平新疆叛乱的决心，左公于军中携棺而行。历时数年终平定新疆全境，无左公则无新疆。

李鸿章

（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晚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称“李中堂”。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一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

（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胡林翼

（公元1812年7月14日－公元1861年9月30日），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抚鄂期间，注意整饬
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彭玉麟

（1816—1890）清末湘军将领，湖南衡阳人。字号，雪岑、雪琴。
早年曾参与镇压新宁李沅发起义。1853年（咸丰三年）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并购洋炮。次年于湘潭之战击败太平军，任知县。后随军攻陷岳州，在武汉、田家镇连败太平军水师。1855年2月在江西湖口为石达开所败。于是整顿水师，配合陆军于1856年败太平军于樟树镇、临江等地，升广东惠潮嘉道。1857年，同杨载福等攻湖口，继夺九江、安庆，升安徽巡抚，力辞，1861年擢为水师提督，复授兵部右侍郎。1862年（同治元年）率水师策应曾国荃陆师沿江东下，堵截天京护城河口。次年与杨载福等破江浦、九洑洲、浦口，断绝天京粮道。攻陷天京，加太子少保。1868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次年春回籍。1872年奉命巡阅沿江水师，疏陈整理事宜，并荐李成谋为长江水师提督，又奉命嗣后每年巡阅一次。1881年（光绪七年）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仍留督江防、海防。1883年晋兵部尚书，受命赴广东办理防务，整修虎门要塞，加强沿海完备，遣部将防守钦州、灵山。多次上疏主战，战后疏请严备战守，以防后患。1888年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后以疾病开缺回籍。以平民之身逝于衡阳江东

岸寓所。赠太子太保，谥刚直。并为他建了专祠。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

毓贤、刚毅、载漪、礼亲王世铎、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袁世凯等人（拒西派、中间派、开明派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成分以及张力）（《老残游记》：比贪官还要可恨的某种清官）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3%E8%B3%A2

毓贤（1842年－1901年2月22日），字佐臣，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叶赫地方颜扎氏，清末年间臭名昭著的酷吏及排外极端种族主义者。捐监生，纳赀为同知府。他与刚毅的恶行都因为刘鹗的《老残游记》而广为人知，他们都是“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的代表。

生平简历

监生出身。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选用同知捐纳知府派分山东。

十五年（1889年），署曹州知府。任职期间，不分良莠，一以诛戮为事，

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颇得上司赏识。

二十一年（1895年）升授山东兖沂曹济道，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

二十四年（1898年）升山东布政使，同年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次年二月授山东巡抚。

二十六年（1900年），出任山西巡抚，仍坚持仇教排外。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毓贤率兵勤王，并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9月26日，被革职，发配新疆。

二十七年（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毓贤即行正法。诏书在甘肃追上了毓贤。22日被斩于兰州。

酷吏生涯

毓贤在曹州任知府4年，在官场上的的外号为"屠户"，对民众采用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他惯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鳌、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但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置木笼12架，每架木笼内壁布满铁钉，把人吊在木笼内，再在人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2]这样，人在笼内不能动弹，稍有动弹，肉体就被刺得鲜血淋漓；当人踏到砖时，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

庚子拳乱

带有宗教性质的群众运动义和拳势力开始抬头后后，毓贤感到外国教会势力比拳运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对义和拳的镇压就不像以前那样卖力，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提出"化私

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以实现其排外的目的。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任山东巡抚后，明确表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并特意在省城济南设场招纳拳民，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他任凭平原、高唐、茌平一带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义和拳领袖设场授徒，攻击教堂，打击教士。

毓贤在京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力荐拳民可用，获准面见慈禧太后，1900年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任山西巡抚时，毓贤排外更加激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之后对传教士假称兵力不足，未能在各县对其保护，设计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一室之内。于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将这46人尽数处决，妇孺皆不免。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至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后，毓贤自请勤王，而当圣旨命其统军入京，毓贤却不想出发，暗地里唆使山西民众呼吁朝廷让他留下，朝廷不允，再发旨催促。1900年7月，毓贤不得已才上路，而上路前还告诉义和团民：“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当时，联军已破京师，毓贤在路上遇到逃亡的两宫。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1900年9月26日，毓贤被革职，发放新疆。毓贤至兰州，住八旗会馆，恰逢农历新年，当时护理陕甘总督的藩司李廷箫宴请毓贤吃年夜饭。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毓贤即行正法。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A%E6%AF%85

刚毅（1837年－1900年），字子良，他他拉氏，满洲镶蓝旗人，晚清大臣。因戊戌政变后监斩戊戌六君子及支持义和团而著名。

生平

刚毅以刑部笔帖式出身，后逐渐升为郎中、按察使、布政使。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刚毅积极主战，受到慈禧的赏识，遂进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毓贤入北京向大学士刚毅等亲贵，力荐义和团拳民可用，为义和团事件的先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坚持反对戊戌变法，甚至主张废黜光绪帝，升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成为慈禧亲信之一。八月，监斩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梁启超〈谭嗣同传〉记当时情况:“（谭嗣同）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为中央政府解决财政困难，赴南方各省督办税务，其间多有搜刮各地的行为，一时舆论哗然，称其为“搜刮大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刚毅与载漪等人出于极端的排外心理，主张招抚义和团，希望能利用义和团的“仙术”达到“扶清灭洋”的效果。6月，刚毅和赵舒翘等前往顺天府良乡县、涿州一带察看义和团虚实，回朝后胁迫赵舒翘向慈禧太后报告“其术可用”，遂同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刚毅随同慈禧太后“西狩”，途中病死于山西侯马镇。战后，西方列强将刚毅列为

主要战犯之一，要求慈禧太后加以惩处，慈禧以其先死，未加以追究，但追夺其原有全部官职。

刚毅与毓贤皆是刘鹗《老残游记》中清官比贪官可恨的代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BD%E6%BC%AA

载漪（1856年8月26日－1922年11月24日），爱新觉罗氏，隶满洲镶白旗，嘉庆帝四子惇亲王绵恺嗣孙，道光皇五子惇亲王奕誴子，生母侧福晋赫舍里氏。后过继瑞敏郡王奕志（嘉庆帝四子瑞亲王绵忻子）为嗣，1893年三十七岁为御前大臣，三十八岁袭封端郡王。义和团事变祸首之一。

生平
载漪是光绪帝的堂兄弟。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是员外郎绍昌之女，生长子溥僎；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为阿拉善亲王贡桑朱尔默特之女，生次子溥儁。庶福晋赵佳氏，赵延之女。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如何处置光绪帝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焦点。1900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下旨，收继其次子溥儁为同治帝嗣子。外界认为，慈禧太后其实是计划废黜光绪帝，史称己亥建储，但溥儁不获外界认可，种种因素下，慈禧被迫停止废立计划。1900年义和团庚子拳乱，他掌管负责京师安全的神机营，后来还一度接管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支持义和团。后八国联军入京，载漪被列在战犯名单上，排名祸首。

####

（以下引述一篇网文
https://new.qq.com/omn/20180829/20180829A0G3MT.html）

清朝礼亲王世铎的奇葩问题：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

19世纪晚期的中国，就像一艘古老而庞大的船舶，在惊涛骇浪之中艰难前行。令人无语的是，这艘船舶上的掌舵队伍里，少有能清醒看清周边形势的人。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礼亲王世铎，就是其中之一。

世铎是满洲正红旗人，生于1843年。世铎出生之际，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刚刚平息。中国正在慢慢地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渊薮。当然，对于这些变化，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世铎根本就不可能了解。世铎投胎于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家族，属于大清宗室后代，7岁时就承袭爵位，成为新一代的礼亲王。

你在7岁时，才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吧？看看人家，已经是亲王了。

大清宗室后代，不需要寒窗苦读，更不需要苦心专营，时间到了，官帽子就自然飞来了。世铎长大后，被安排担任正一品的内大臣。没过多久，又先后任职宗人府右宗正、宗令。这些职务，位高、权重、责任轻、油水大，是朝廷为大清宗室准备的特设岗位。

1884年，慈禧太后见恭亲王、领班军机大臣奕訢权力越来越大，有意裁抑，便以"委靡因循"为由，免除他的所有职务，还将全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逐出

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旧的军机大臣走了，新的军机大臣找谁干呢？慈禧太后召集醇亲王奕譞，询问当朝亲贵之中，谁适宜担任军机大臣。奕譞便推荐了世铎。慈禧太后照准。于是，41岁的世铎就满面红光地进入了清朝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成了一名军机大臣。

张之洞追求了一辈子、直到晚年才终于得到的军机大臣，不过是大清宗室的掌中之物，唾手可得。

不过，世铎虽然位居军机大臣之列，却一点都不讨人厌。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满面春风、一团和气，被称为最没有“王爷”架子的当朝亲贵。那时候，李莲英是慈禧太后身边最红的太监，说一句话顶一万句。不过，李莲英见了世铎，依然要按照礼仪向他下跪请安。没想到，世铎竟然乐呵呵地跪下来还礼。

这样的亲王，谁不喜欢呢？

或许正因为此，世铎很受慈禧太后赏识。到1885年时，世铎已任职领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

1889年 2 月 26日，18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3月4日，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光绪皇帝正式亲政。至少从名义上，慈禧太后的世代结束了。她在光绪帝的陪同下前往颐和园居住，不再处理朝政。然而，谁都知道，慈禧太后依然在幕后指挥。重大的军国大事，还得慈禧太后拍板。

光绪皇帝亲政后，世铎一度想辞去军机大臣职务，慈禧太后坚决不

许。慈禧太后当然知道世铎的能力不堪大用。然而有什么关系呢？慈禧太后不过是借用他的亲王身份，坐镇军机处。具体事务，就交给其他能臣干将办就行了。

慈禧太后对世铎给予很优厚的待遇。1894年，慈禧太后迎来六十大寿。慈禧太后高兴之余，大加赏赐。世铎作为大清宗室，被赏赐双俸，等于是领了两份薪水。不仅如此，慈禧太后还下令增加世铎的护卫数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逃出北京。由于走得太匆忙，世铎没来记得跟上队伍。慈禧太后感觉对不住世铎，到了陕西西安，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专门召世铎到西安去。可惜世铎正好患病，最终没有成行。

有了慈禧太后的信任，世铎的位置就稳如泰山。直到1901年，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整顿政务，打算推行新政，这才撤掉了世铎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让他还是回去做宗人府宗令，过点悠闲日子养老。算一下，世铎居然做了17年的军机大臣，其中有16年是任职领班军机大臣。

一年冬天，北京沸沸扬扬的下了一场大雪。这天，世铎子、侄辈中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登门拜访他。世铎一生从没出过国，不知道外国是怎么样子。他好奇地随口一问：“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

听了这句话，回国者掩口而笑，回答：“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

世铎听了，默然无语。

这时候，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参考资料：《清史稿》《睇向斋闻见录》等】

####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B1%E5%BA%94%E6%BA%A5/10855073

钱应溥（1824—1902年），字子密，别署葆真老人，嘉兴人。钱泰吉之子。拔贡出身，参加朝考得一等，用为七品小京官，分吏部，直军机。参与国家大计决策。次年迁左都御史，转工部尚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因病罢职。卒后，谥恭勤。著作有《葆真老人日记》，记同治、光绪两朝政事为多。

钱应溥是钱镠第三十世孙，钱陈群五世孙，钱泰吉次子。道光己酉拔贡，朝考甲等一名。1890年任礼部侍郎，1895年入直军机处参与国家大计决策，1896年兼工部尚书。朝鲜战事起，廷议主战，钱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势日危,深感非变法不能图存，倾向于变法。钱应溥任军机大臣（宰相）兼工部尚书时，康有为在工部任主事。钱应溥主持江南制造局筹建计划，亲拟奏本给光绪皇帝。光绪二十五年，钱应溥因病告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病卒于嘉兴，享年79岁，谥"恭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御赐工部尚书，军机大臣钱应溥祭文石碑一通，原保留在海盐县沈荡镇钱氏祠堂内，现移置海盐钱镠纪念馆。钱应溥才思敏捷，时恭亲王奕欣和醇亲王奕譞相继秉政，都赏识应溥才能。在军机处与闻军国大事，起草诏旨。曾国藩写给咸丰、同治帝的重要奏章,大多

出自钱应溥之手。钱应溥母亲庆寿时，曾国藩、曾国荃都赠送了亲笔书写的对联。钱应溥生当清朝末年，步入仕途时，清朝统治的彻底崩溃已现端倪。尽管他殚精竭虑，克勤职事，但对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朝已于事无补，但仍不失为清朝统治的股肱干臣。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曾国藩率军在安庆与太平军激战，招应溥入幕，助其起草文书。应溥才思敏捷，甚为得力，获重用，随其转战各地。太平军失败后，以参赞劳绩，清政府给以五品卿衔。
同治三年，奏加五品卿衔。大军征捻，驻周家口。捻宵至，守卒仅千人，众骇惧，应溥镇静若无事然。於是国藩坚卧不起，捻卒不敢犯。晋四品卿衔，国藩深倚重之，其督两江，有大兴革，上奏辞皆嘱应溥具草。
同治四年(1865)四月，随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3省军务，参与策划镇压捻军，又晋四品卿衔。是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凡上奏文稿都由应溥起草。光绪初，养亲事毕，乃入都，重直军机，擢员外郎。恭忠亲王、醇贤亲王相继秉政，皆嘉其谙练。每承旨缮诏，顷刻千言，曲当上意。累迁礼部侍郎。偕尚书昆冈按事河南，自巡抚裕宽以下降黜有差。朝鲜事起，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旋任军机大臣，再迁工部尚书。在军机处与闻军国大事，起草诏旨。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应溥为主和派。
二十一年，以礼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参与国家大计决策。次年迁左都御史，转工部尚书。
二十五年，因病罢职。
二十八年，卒，谥恭勤。著作有《葆真老人日记》，记同治、光绪两朝政事为多。
子钱骏祥，清末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山西学政。后归乡，任嘉兴府学堂总理。 谢病归。

####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96%E5%A3%BD%E6%81%86

廖寿恒（1839年－1903年），字仲山，晚号抑斋，福建汀州府永定县人，寄籍江苏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晚清大臣，支持光绪帝推行新政。

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恩科二甲第五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湖南学政、国史馆纂修、侍读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礼、户、吏四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刑部尚书。

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廖寿恒曾力主筹饷制械，抗击法国侵略，巩固西南边防。二十四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同年，廖寿恒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约康有为问话，询问变法的步骤方法。维新运动展开，廖助康有为向光绪送书递折，也给康传递光绪"上谕"，"凡有顾向之事，由总署代传，或有章奏条陈，亦由总署呈进，特派廖公专司之，朝中呼之为廖苏拉。"康有为当时与廖过从颇密，曾记其事："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有谓为康狗者。"

光绪二十六年，廖寿恒因病开缺回籍，三年后卒。

####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6%87%E9%9F%B6

王文韶（1832年－1908年），字夔石，球石，号耕娱、赓虞，晚号退圃，谥文勤。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下城区清吟巷）人。晚清重臣，洋务派中坚之一。历仕咸同光三朝，官运亨通，权倾一时，但为人圆滑，明于趋避，有“琉璃蛋”之称。

生平

道光壬辰年十月二十一日（1832年）生于苏州府嘉定，有资料讹记为杭州，然其籍贯则为杭州府无误。出身贫寒，文韶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其家族于明代自上虞迁至杭州，祖父为一无名盐商。

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举人，咸丰二年（1852年）联捷进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道员。才能优异。得到左宗棠、李鸿章赏识，交相推荐。在同治回乱以及捻军战乱期间作为陕甘后路粮台助理左宗棠的战事。升湖北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年)，署理湖南巡抚，农历十一月到任。任职总共6年。期间曾多次军事镇压民众，包括张秀眉的苗民起事等。于1872年5月基本平定苗疆反清叛乱，其余部亦于6月遭剿灭。此后任职兵部侍郎，并直军机。还曾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云贵总督，镇压起义有功。

甲午战争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续推进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任内散遣冗兵、兴办水师和武备学堂、革漕运积弊、开矿（吉林三姓金矿、磁

州煤矿）、兴筑京汉铁路，并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成就斐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值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盛，他反对对外启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是唯一一路随护皇室到西安的军机大臣，力主对外妥协，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后历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全权大臣、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1907年回到杭州养老。于清吟巷府邸居住。

王文韶十分敬佩左宗棠，称其为“伟人”，对于林则徐则有微议，认为他行事作风过于强硬，拖累大局。王文韶在仕途早期即与西方国家外交官有来往。他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听取西洋外交官的意见。在一次参访美军军舰时，他曾感叹“兵制如此严肃，军火如此壮丽，诚未可以力与之角胜也”。在清末民变问题上，王文韶并不完全认同清廷，对苗疆起事者抱有同情，但仍全力执行被授予的职责。

其府邸王文韶大学士府今为杭州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西泠印社和民居占用。

####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有编辑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4%B8%96%E5%87%AF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故又称袁项城。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清朝总理、北洋新军领袖，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与贡献。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于清末投身淮军，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国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自道员、巡抚、总督累升，至入值军机处，甚至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文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袁世凯逼迫宣统皇帝逊位，由自己组建临时政府。

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其施政引发争议，中国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刺导致二次革命，又与日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引发国内民众不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将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建立中华帝国，但由于国内多方势力的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改元后仅82天（1916年为闰年）帝制便以失败收场。同年5月6日袁世凯同意将辞退大总统之位，但还来不及实现就于6月6日病逝，后来葬于河南安阳。

早年生涯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1873年冬，堂叔袁保恒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世凯会面，袁世凯获得赴京念书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世凯与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世凯"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世凯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世凯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世凯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世凯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

1876年秋，袁世凯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一般认为袁世凯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世凯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陈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世凯因此成为牺牲品，虽然未能及第，但袁世凯于同年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两年后诞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过袁世凯与于氏关系并不融洽。袁保恒见袁世凯完婚，频繁招袁世凯回北京继续学习以考取功名，袁世凯最初也极为重视"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读，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1877年初，袁世凯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谋职户口，袁保恒知道袁世凯的想法后断然否定。

1875年至1878年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慈禧太后命身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前往河南赈灾，袁保恒于是偕袁世凯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发，途中经过保定，袁保恒与李鸿章会面，请求帮助，李鸿章当即拨米三万石，但此时李鸿章是否见过袁世凯则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达开封。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十分寒冷，袁世凯冒着恶劣气候办公，为避免流言住在开封城外。在此期间，袁世凯目睹了饥民惨状，官军残杀，赈款不敷，曾感慨道“赈务实属万难”，但也下决心“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当时开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恒认为自己身体强壮冒险前往检查粥厂，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达之前，袁世凯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务。此后，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并在此与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时间。期间，袁家在袁保龄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分家，但分家的结果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在此期间，袁世凯“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其性格“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袁世凯与知府吴重熹成为“诗酒友”，“雅敬爱之”。此外，袁世凯意外结交当时正在陈州授馆从事文牍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园林游玩的徐世昌。相见第二天，二人拜为金兰，徐世昌为兄。袁世凯资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顺天乡试，二人双双中举。

1879年秋，袁世凯致三哥袁世廉信中发誓：“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未料再次乡试不中，因此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1880年，袁世凯决定弃文就武，投靠吴长庆，加入庆军，吴长庆为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从陈州出发，先前往上海，准备之后再前往山东登州即吴长庆大本营所在地。抵达上海后，袁世凯很喜欢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无果。在此困顿之际，袁世凯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结识苏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欢，无话不谈。沈氏阅人无数，得知袁世凯身世后劝其尽快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并用私房钱资助袁世凯。袁世凯发誓安定下

来后回来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后会自己出钱赎身并等他回来。后来袁世凯将沈氏接到朝鲜生活。沈氏终身未育，袁世凯将次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为嗣子，北上途中，袁世凯结识阮忠枢，一见如故。袁慷慨资助阮，阮后成为其终生心腹。

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对袁照顾十分周到，优待至极。由于袁尚未通过乡试，吴召来营中最好的老师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向他们引见袁世凯，特意强调“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也”。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于是每天督促袁功课，袁再度备考科举。此间，袁世凯称“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张謇眼里却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由于张謇严厉直率，导致二人疏远。而周家禄则点到为止，以鼓励赞扬为主，袁“更喜周公”，后任直隶总督时请周入幕府，礼遇有加。

崭露头角

1882年，袁世凯23岁，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变夺权；亲中的朝鲜事大党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前往协助。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世凯将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掳后，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驻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建亲军与镇抚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

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中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中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袁世凯唯恐奉天危急，以筹粮为口实，躲到新民厅。遭李鸿章的训斥，令速到前线，袁世凯才赶到九连城，不久又逃至新民厅。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奉命随军撤回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的练兵，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北洋军阀的雏形。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

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部下徐世昌把德国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改编成《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

袁世凯善于笼络人心，事必躬亲，重视官兵福利，亲自监督发饷，避免贪污舞弊，重视军人的装备是否齐全，士兵非常爱戴、感念。他也善用洗脑方法，每日操课前后，军官都有“三问”，第一问：“我们吃谁家的饭？”所有士兵齐声回答：“袁宫保的饭！”。二问；“我们穿谁家的衣？”齐答：“袁宫保的衣！”第三问：“那我们为谁家死，为谁家出力？”齐答：“为袁宫保死，为袁宫保出力！”士兵们皆将袁世凯视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竟达到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程度。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世凯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

戊戌变法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听从康有为建议，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17日，康有为接到光绪帝密诏，密诏中光绪帝认为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与袁世凯秘密在京郊法华寺见面，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领敢死将士数百，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

意。

根据史料记载，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其真实情况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

但也有部分人认为，在20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辞行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二人商议对策（一说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慈禧于翌日宣布训政，囚禁光绪帝。

清末新政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10月23日，陆军在河间府会操，共有二镇四协计3.32万余人，清廷派阅操大臣袁世凯、铁良前往校阅；10月25日会操结束。为中国地区历史上

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

1906年2月5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请外务部转商驻京英公使萨道义，减少进口印度鸦片；2月6日，英公使萨道义答复限制印度鸦片事，须俟中国自限栽种罂粟有效，始允照办。2月11日，袁世凯奏设高等师范学堂于天津，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奉天等省均可派生附学。2月17日，袁世凯奏设矿务总局于天津，严禁私售矿产于外人。4月27日，袁世凯派武备学生分赴德、奥学习陆军。5月25日，清廷电饬袁世凯、赵尔巽、程德全等协力进剿马贼。6月13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马队1,200人剿办马贼。6月28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北洋银圆局立案开办劝业铁工厂。7月2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法国撤减直隶驻兵，交还廊坊、杨村、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各处兵营。8月6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到达天津，同袁世凯讨论筹备立宪及改革官制等事。8月9日，袁世凯会商两大臣奏改官制，并饬办学各绅商会议地方自治制度。8月23日，袁世凯委周学熙、孙多鑫收回唐山洋灰公司。10月22日，新建陆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大典，袁世凯、铁良为总校阅官，10月25日举行阅兵仪式。

1898年的戊戌维新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约》后，立宪声浪日涨，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领导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1906年8月26日，清廷谕派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鼐等暨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公同阅看考察各国政治大臣条陈各折件，请旨办理。8月27日，慈禧太后召见袁世凯，袁面奏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8月28日，清廷帝后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直督袁世凯等，讨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条陈各折件，商讨实施立宪事宜。9月2日，清廷为厘定官制，派载泽、世续、戴鸿慈及袁世凯等14人公同编纂，并命端方、张之洞等六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是日至10月7日，编纂诸大臣接连在朗润园会议官制。9月

13日，清廷据袁世凯奏请于奉天省安东县大东沟设海关分卡，归安东关兼辖。9月26日，袁世凯刊刻各国官制大略及组织之用意，分送各王大臣及政界中人。9月30日，户部尚书铁良反对改革官制，与袁世凯大起冲突，镇国公载泽严劾铁良阻挠立宪。10月9日，内阁学士文海奏，欲去军机大臣，设大总理，是欲学从前之日本权在大将军，请即行裁撤厘定官制馆，并请饬袁世凯速回本任。10月17日，袁世凯编刊《立宪纲要》，颁发直隶各属。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

1907年1月13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着直督袁世凯迅饬提督夏辛西统带原统队伍，前往山东督办兖（州）曹（州）剿匪事宜。3月13日，盛京将军赵尔巽、直隶总督袁世凯联电外务部，请与日使议订《满韩陆路通商详细专章》。3月29日，都察院代表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筹款自建津镇铁路，清廷谕军机大臣着袁世凯、张之洞妥商办理。5月17日，袁世凯派蔡廷干统带军舰“海容”、“海圻”两艘游历南洋，借以保护华侨。6月17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徇私溺职”命开缺回籍，朝野为之震动，是为清末“丁未政潮”。党争中林绍年请辞。7月10日，外务部以中俄北满洲税关章程业已互换，咨南洋大臣端方、北洋大臣袁世凯，北满洲税关定期开关。7月12日，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7月28日，袁世凯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条陈管见十事，其要旨为：建政府、设资政院、办地方自治、普及教育、融化满汉界限；袁世凯奏请简派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国日本会同出使大臣考察宪法，并请简择王公近支聪颖特出者遣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助预备立宪之施行。

1907年8月18日，天津县议事会成立，选出正、副议长。8月24日，清廷电召直隶总督袁世凯入京陛见，8月30日袁入京。8月30日，袁世凯奏请以天津为模范，计划全省自治办法，期以三年一律告成，以为预备立宪之基。9月4日，清廷命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开缺，充会办税务大臣，以直隶总督袁世

凯为外务部尚书；任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为军机大臣。10月26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奕劻、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夤缘比附，清廷诏以其摭拾空言，有意沽名，传旨申斥。同时也使袁氏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队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因溥仪年幼而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3月9日，康有为致书梁启超，力主联络肃亲王善耆以打击袁世凯。由于载沣反对袁世凯的许多新政措施，并建议隆裕太后解除袁世凯所有职务，于是隆裕下诏解除袁的职务（根据溥仪回忆录，载沣认为其兄光绪帝系袁世凯谋害，亟思报仇，但袁掌握军系人脉，无法断然下手），袁见形势不利，决定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

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10日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政府内部清楚知道中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

镇压革命

湖北

1911年27日，袁世凯接任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立即对湖北革命军展开攻势。30日，冯国璋纵火焚烧汉口，迫使革命军退守汉阳，11月27日又攻占汉阳，革命军撤入武昌。

河北

1911年12月18日，耿世昌率领五百余革命党人，发动任丘县起义。袁世凯闻讯，从保定调动两营淮军前来围剿，最终将其彻底剿灭。

1912年1月3日，滦州起义军在知府衙门宣布起义，成立北方军政府，声明从属中华民国，议和期内“袁氏不得派兵来攻”。袁世凯则拘禁冯玉祥在海阳，令其无法与之会师。

山西

吴禄贞遇刺后，燕晋联军破产，袁世凯派北洋军第三镇开赴山西，兵迫娘子关。1911年12月12日，北洋军炮轰娘子关，革命军弃关退走。

山东

1911年11月12日，山东宣布独立，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山东布政使、吴炳湘为巡警道，赴济南迫使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

奉天

1912年1月，蓝天蔚筹划组织北伐军两千人在烟台登陆。26日，袁世凯电告赵尔巽：“蓝天蔚现暂驻烟台为根据地，拟日内派一支队于貔子窝附近登岸，其余大队于日本租界域外之地点登岸，进攻奉天、牵制北方各军，希饬严密探访。”又派人到沈阳跟赵尔巽和咨议局议定办法五条，其中第三条是严搜民党，第四条是驱逐“急进会”会长张榕。

河南

12月29日起，陕西革命军陆续东征，袁世凯令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麟集中兵力，挟野炮山炮五六十门向民军进攻，又增调毅军十营，将革命军击退至陕西潼关。又将革命党人刘纯仁、纪宗义、刘建中三人杀害。

安徽

1911年12月，淮上军欲西征驰援河南，袁世凯调北洋第三镇两千多人南下阻击，又派河南布政使倪嗣冲率武右军进入安徽，于12月10日攻陷太和，继则扑向颍州。于15日破城，“以剪发为革命军符号，杀之无遗。”

南北和谈

随着战事延长，部分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朝廷施压，请求清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便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政府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其居住于锡拉胡同19号四合院，原为慈禧之故居。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人为主

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大清帝国覆灭

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选出孙中山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未经各省民意正式授权，仅持有各省督军或领导人信函。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廷，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廷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奕劻配合袁世凯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1月16日袁世凯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

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革命党孙中山黄兴与陈其美等人同时推动向英日俄等外国势力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如愿。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终如愿以偿。袁世凯于是加快了逼宫的脚步，1912年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军五十位将领发布了《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向隆裕太后逼宫，不久，段祺瑞又发表《乞共和第二电》，直接挑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吓隆裕太后，隆裕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帝国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统治宣告终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中华民国总统

临时大总统

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

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仍坚持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会约束袁世凯的要求，引发袁世凯的强烈不满。6月间，国务总理唐绍仪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原本同意，后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表了改任王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位同盟会阁员被迫于6月16日辞职并离开北京。袁世凯先提出了无党派的陆征祥组阁，参议院因其发言不当新提阁员全部被否决而流产。北京军警指参议院挟持私见，黎元洪责违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责为"奸府"，请袁世凯便宜行事，盛传将解散参议院，参议院迫于形势，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次日弹劾陆征祥失职，陆称病请假，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代理，至此内阁被袁世凯直接控制。

孙中山让位总统后，从事国家建设，宣传民生主义、事业发展、铁路计划，黄兴请辞南京留守，表示没有割据的意思。内阁问题发生后，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前往北京，消除争端。应黎元洪的请求，袁世凯召集了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的张振武和方维，以"图谋不轨"于8月16日在北京杀害，引发临时参议院和黄兴的言辞责问。袁世凯为离间黎元洪和同盟会，将黎元洪的来电公布，使得黎元洪无法辩驳而只能依附袁世凯。8月下旬，孙中山和黄兴北上，孙在北京停留20多天，与袁世凯会面13次，希望袁世凯作正式总统，十年内练陆军百万，建筑铁路十万里，袁世凯授予计划全权。为了让袁世凯放手作为，孙、黄同意由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9月25日，袁世凯发表八大政纲。10月，梁启超得到袁世凯的谅解，从日本返国，在北京受到袁世凯的隆重欢迎，颇受感动。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时人普遍认为袁世凯授意暗杀，引发全国声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大总统之叛逆》等文，称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的口号。3月26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与黄兴会晤，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党内人士反对，经过3个月未能组织起讨伐袁世凯的力量。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以全部盐税收入作为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4月7日，袁世凯发布秘密动员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开始军事部署。5月21日，袁世凯发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和重庆相继宣告独立。9月，冯国璋与张勋攻占南京，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北洋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和胡汉民逃亡日本。

正式大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在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演说中，谈及个人从政生涯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实业发展等方面问题。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版。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为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

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内中指出：

“……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世凯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在召开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凯指出内政紊乱是因部分人错误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还声明乱党人员失败后卷公款而逃，并谈及外交及司法独立问题。1914年1月，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等人及政治会议的意见，将国会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与日条约

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和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地带。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经过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除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

日本政府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

。。。。

袁世凯复辟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接受帝位后，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登极）。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评价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称：“袁氏为人，有术而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

张之洞说：“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

严复评价袁世凯说，袁世凯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日帝制之下的督抚，“欲

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

梁启超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黄远生评论袁世凯：“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袁世凯的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1913年7月，陈其美发表讨袁宣言：“国贼袁世凯，残害忠良，袒护凶犯，

捣乱司法之制，提倡暗杀之风，蔑视国会，干涉宪法，诬陷善类，擅捕议员，私借外债，丧失主权，重人民之负担，启各国之干涉。蒙古叛乱，不加一兵。失地丧权，擅缔协约。授各国以利益均沾之口实，陷中国于瓜分豆剐之危机。滥掷金钱，日用多至一千余万。收买议员，国会遂至一事无成。解散各省联合会之民意机关，擅设不经议会通讨之滥竽宫职。约法扫地，奸宄盈庭。”

1914年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鸣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讨袁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与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檄文称袁世凯“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

1916年1月，康有为发布《讨袁世凯檄》，直斥：“国贼袁世凯者，蜂目忍人，豺声乱性，含奸薮慝，蕴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总揆之登庸；假立宪之高义，以收军国之全权；借排满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禅让。”“始以高位厚禄，笼络革命之英；继即以重兵酷刑，诛锄革命之杰。始以美言多金，诱进步党而排国民党；终则专制横行，散国会而驱逐党人。”“始则累誓保守共和，而铲除专制；继则明布力行专制，而大反共和。始则深恶国

会，竟敢废自治而停选举；今则为改帝制，忽而选议员以开大会。”“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称帝矣。于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谋，伪托为举国之民意。民选议员本大公无私，岂知名由官中直指；劝进电文之千篇一律，岂知稿由朝贵拟来。掩耳盗铃，以予知自矜；只手遮天，以愚民为戏。其反复无良，诈欺弄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

家族

袁世凯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八个孙子、三十一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九十一人。

妻 于氏（河南沈丘县财主于鳌之女）
第一子 克定，娶吴大澂之女吴本娴为妻。
第一妾 沈氏（苏州人，未生育子女）
第二妾 李氏（朝鲜人，第三妾金氏两个陪嫁姑娘之一）
第一女 伯祯，嫁张人骏子张允亮。
第五子 克权，娶端方女儿为妻。
第七子 克齐，娶孙宝琦女儿为妻。
第十子 克坚，娶陆建章的女儿为妻。
第十二子 克度，娶富商罗云章的女儿为妻
第六女 箓祯，嫁孙宝琦儿子。
第三妾 金氏（朝鲜王族夫人之表姐妹，两班出身）
第二子 克文，娶刘梅真为妻。
第三子 克良，娶张百熙的女儿为妻。
第三女 叔祯，又名袁静雪，嫁杨士骢(杨士琦弟）之子杨毓珣。
第八女 环祯（早亡），
第十女 思祯，嫁邹文凯（北京宪兵司令）
第四妾 闵氏（又作吴氏，朝鲜人，第三妾金氏两个陪嫁姑娘之一）

第四子 克端，娶天津盐商何仲璟之女何慎基为妻。

第二女 仲祯，嫁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

第四女 次祯（早亡）

第七女 复祯，嫁荫昌子荫铁阁。

第五妾 杨氏（天津杨柳青人，小户人家，精明能干）

第六子 克桓，娶陈启泰之女陈征为妻。

第八子 克轸，娶周馥之女周瑞珠为妻。

第九子 克玖，娶黎元洪次女黎绍芳为妻。

第十一子 克安，娶天津盐商李士铭的女儿李宝慧为妻。

第五女 季祯，嫁陆宝忠之子。

第十五女 玲祯（早亡）

第六妾 叶蓁（南京人）

第十四子 克捷，娶北京女招待王氏为妻。

第十七子 克友，娶京剧演员于云鹏的女儿为妻。

第九女 福祯

第十一女 奇祯

第十二女 瑞祯

第七妾 张氏（河南人，未生育子女）

第八妾 郭宝仙（苏州人）

第十三子 克相，娶那桐的孙女张寿芳为妻，后又娶陈炳焜女儿陈思行为妻。

第十五子 克和，娶盐商张调宸之女为妻。

第十四女 怙祯，嫁曹锟的长子曹士岳。

第九妾 刘氏（第五妾杨氏一个丫头）

第十六子 克藩，早亡。

第十三女 仪祯，在季祯死后，续嫁陆宝忠之子。

青帮、洪门、白莲教、罗教、以及后来的红灯照、大刀会、小刀会、等等

++

++

++

++

++

++

++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5%B9%AB

青帮是一个中国秘密结社，创于清朝雍正年期，为崇信罗教的翁岩、钱坚及潘清所创，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上海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占有显著影响力，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三大帮会之一。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崩溃，青帮离开上海并在1950年代初踏足香港。

起源

青帮在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由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帮会人士在初期皆以漕运为业，帮会亦为水手提供墓葬和宿舍等服务，亦因青帮起于漕运，故帮会人士在早期多流传于江南一带。到了乾隆年间，青帮被朝廷视为一种威胁，在1768年摧毁罗教寺庙并取缔该教派，驱使青帮转向地

下活动。

随着19世纪的社会动荡，大运河漕运受到严重破坏后没落，导致漕运水手要不加入太平天国或捻军，要不转移到海岸加入盐走私贸易。在1870年代江苏省北部，水手和盐走私者开始组建所谓的“安庆道友”，是20世纪初青帮的前身。

传承
青帮的字辈排行有：

前二十四代　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学）。
后二十四代　万象依皈，戒律传宝，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光照乾坤，代发（发）修行。
续二十四代　绪结诚计，崑芮克勤，宣华转枕，庆兆拔魁，宜燕应存，挽相同流。
第一代“清”字辈指的是金纯，号碧峰，明朝南京麒麟门外金家村人氏，为永乐帝大臣，永乐迁都时营造帝都有功，后封为伯爵，好饮酒，政治上宽仁无为，在刑部任内严禁酷刑。金纯据说颇喜佛法，找出了少林寺达摩祖师定下的前后四十八字辈作为派系，于是他的法名，便叫做“清源”，据说罗清慕其为人，并推崇他为第一代祖师。
第二代“静”字辈有罗清，山东即墨人，北直密云卫军人，罗教教主，法名“静清”，号称“罗祖”，是青帮与罗教实际上的祖师。陈瀛，字易水，道号“静海”，广西贵县人，罗祖的同修。
第三代“道”字辈有陆飞，字羽飞，道号为“道行，”江苏丹徒人，曾任江西总兵，甲申之变后隐居茅山、广东娥素山。赵大官，字悟本，道号为“道元”，金陵霞邑人，明朝末进士，崇祯年曾任总兵之职。
第四代翁岩、钱坚、潘清三人乃“德”字辈，为避讳祖师，“清、静、道、德”

等四个字为禁忌，清帮后代，不允许使用于谱名。

活跃于上海

随着海运兴起，漕运没落，上海成为粮食的重要转运点，大规模的外省移民进入上海，当中包括大批青帮人士，他们到了上海从事各种行业。1920至30年代，在大多数的上海工厂里，控制包工制度的工头和监工都是青帮的人，在工厂内所有工人都被纳入到青帮体系内，因不加入帮会就不能进入工厂工作。

青帮常被国民党的蒋介石雇用以打击工会集会和工人罢工行动，并参与国共内战。1913年，青帮领导人尹桂新参与了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暗杀行动。青帮亦是蒋介石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后者在1915年至1923年在上海生活时认识前者。在四一二事件中，青帮亦与其他帮派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在上海屠杀约5,000名亲共罢工者。蒋介石后来授予杜月笙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军衔。蒋介石的姐夫和时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联同青帮向上海的银行施压，让他们购买国债。在国民党势力在南京的最后两年，青帮继续向各大企业施压购买国债。

国共战争后

香港

1949年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崩溃后，青帮离开上海，并在1950年代初在香港开设了海洛因工厂。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青帮与当地其他帮派在控制毒品市场上发生争斗。到了1950年代中期，来自汕头的以潮州人为主的帮派控制了海洛因市场，他们雇用青帮的化学家，扩大了香港的海洛因消费量。在1960年代早期，他们的影响力扩散到东南亚，1960年代晚期，香港的化学家在泰国和缅甸边境开设了第一个制作纯度最高的4号海洛因的实验室，将技术引入当地，使金三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地。

台湾

目前青帮主要分布在台湾，并成立有合法社团“中华安清会”。在美国部分城市，青帮也有一定影响，惟有另类看法系当年杜月笙本于所为以行刑模式杀了六名共产党员，而后受迫迁徙至香港，香港三合会模式亦见其与此有所关连。

目前已知清门全国性社会团有：中华正义社、中华安清会、中华安清协会，以及中华安清公益事业协会，中华安清岩社，台湾大中华家庭关怀协会等，至于地方性社团有，台北市安清协会，桃园一心安亲会，台中安清协会，台南安清协会，杭三文化协会，台湾安清协会，高雄安清协会，屏东安清协会等；因彼此皆系出同门实有密切联系与相互支应更在家人般的亲情互为支撑下有所作为。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9%97%A8

洪门，又称天地会，与袍哥会、青帮为清朝三大秘密结社，主要活动于华南，以福建、广东、湖广等地区更盛。有时史学家所谓的洪门一词，代表一切反清的秘密会社，如青帮、理教等。后来演变成名称不一的多个地下社团或会党，并随着华侨移民南洋而传播东南亚。

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广东帮会会众借洪门之名反对地方政府。原本就是互不统属、各有不同宗旨的社团，因为同一理由互相合作，对外宣传，吸引新会众，实属发动民变的社团组织，如像历史上白莲教所发动民间组织的社团民变一样。洪门也协助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逃亡途中的护军

就是广东洪门。

清末时，革命党为了推翻满清需要而参与洪门；及至1911年中华民国肇建后，不少天地会、三合会成员均有国民革命军身份。1949年后，香港三合会组织的两大龙头大佬皆有中华民国国军将领军衔。

源流

关于洪门的源流有十几种说法，有郑成功与陈近南创立说、方以智创立说、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二十六年万云龙首创说、台湾藤牌兵征俄创立天地会说、始于雍正初年说；以“万”为姓，群雄再创立天地会说等等诸多说法。

五舵主

五祖各居一郡，开山立会，郡名都是实际上行省的代号。

长房（头舵）天地会：堂号“凤凰郡青莲堂”，曾远征甘肃，主要在台湾、福建发展，舵主蔡德忠。

二房（次舵）三合会：堂号“金兰郡洪顺堂”，主要在广东、广西发展，舵主方大洪。

三房（参舵）袍哥会：堂号“莲章郡家后堂”，主要在四川、云南发展，舵主胡德帝。

四房（肆舵）哥老会：堂号“锦厢郡参泰堂”，主要在两湖、贵州发展，舵主马超兴。

五房（伍舵）小刀会：堂号“德兴郡宏化堂”，主要在江浙、山东发展，舵主李式开。

明郑王朝郑克塽投降清廷后，他们在闽粤留下之中国武术门派，统称为南

少林“功夫”，两广人士称武术为功夫。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僧人郑洪二，化名万云龙，在福建创立天地会，倡议反清复明，白日诵经礼佛，夜间聚众赌博，累聚银钱，预谋起事，子郑继，部下陈彪、陈丕、张普、张狗（破脸狗）、卢茂、李少敏、赵明德等数百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云龙派手下卢茂，率领会众三百余人，攻漳浦县衙门。但部众未曾到齐，事即败露，被杀数十人，会众三百余人皆被俘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初，云龙派李少敏奉明朝宗室朱振兴为“振兴大王”，不料官府听闻风声，纵兵掠捕，事件立刻失败。云龙两次起事皆败，折损数百人。众人被捕时，畏惧云龙报复他们的亲属，都不敢供出云龙，云龙佯作僧徒，依然于庙中饮酒狎妓，安居行乐，官府不知。云龙死后，其子郑继接管天地会，法号“行义”。

林爽文事件后，朝廷敕命严查闽台天地会，因而揭露上述两次起事主谋为万云龙。其子“行义”被捕。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的奏折内容：“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名洪二和尚。”

为了纪念万云龙，天地会会众常自称为“万家兄弟”，甚至把“万”当作姓氏的暗语：如，“您老哪个万儿？”

。。。。

大多天地会研究者认为成立的时间应是康熙十三年而当年确有入会仪式在木杨城举行。衫仔有载1674年时已尊称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蔡德忠及李式开为少林五祖，说明第一次天地会仪式远在1674年之前。郭义为木

杨城镇将，1661年降清，调任广西总兵而之后在广西发现会簿（会簿为天地会内部的秘密文件）的数量比任何地方找到的还多，可以初步证明天地会和郭义有关及在其离开木杨城前成立。

主要分支

哥老会

袍哥会

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后，恐怕清廷猜忌，除部分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不少人因而参加反清的天地会，在湘、蜀一带聚党行事，游侠绿林，被称为哥老（四川话方言，指一种赌徒，或结拜的流氓），故称哥老会。有些哥老会党徒甚至从事诈骗、绑架、赌博、妓院、抢劫、鸦片贩卖等。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1892年肃清两江境内的哥老会。湘军之“哥老会”，再分出成“潘门”，又称“潘家”等。

三合会

因广东以北江，西江及东江流域三江汇聚，有称“三和合水万年流，低头饮尽三河水”之说；故于当地称“三合会”。“三合会”也代表三才相合：即是“人”参与“天、地”之间，其实就是“天地会”会友的代号。

三合会不是一个由当地自创的社团或会党，尔后以原天地会会簿资料流传。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佛山、肇庆地区传出有三合会的活动，参与“洪兵”反清的起义中。1854年，三合会的各个社团分别于佛山、肇庆各地起义，欲先占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大杀三合会会众。1857年，广州被英法联军占领后，邻近乡镇绅民重建团练公局，佛山设总局。此后部分团练受三合会的影响，一一成为洪门团体。

在民国年间，三合会等积极参与革命，如协助孙中山、黄兴、陶成章、杨

衢云、郑士良、陈其美等起义革命。现代中国大陆的中国致公党即由近代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致公堂发展而来。20世纪初成立于美国。

现代有部分三合会转而成为黑社会组织；在香港，宣布己身是三合会会友将可能遭致刑责。

。。。。

洪门为推翻清廷的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于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回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

马来西亚578帮会则由福清团队打造，柔佛古来区余公涵兄与thomas及gordon创立。团队特性：活跃于欧美亚黑帮之一，其合法性在东南亚为商会代表，但资金来源为偷渡，洗钱，毒品等交易。掌控每年数亿美元收入。

。。。。

台湾
由于洪门素有革命性质，神秘色彩未除，因此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播迁台湾后，长期未允洪门申请为公开的民间社团。

解严以后，洪门于1989年各山堂始组成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社会事业建设促

进会”与外界交流，然而当时“洪门”二字犹未允公开使用。

2004年1月11日，洪门南华山堂在中华民国内政部登记成立“财团法人国际洪门中华民国总会”，始拥法人地位，为一般民间团体。

在中华民国内政部登记的洪门相关政党有：

原名中国台湾致公党（政党证字第098号）；2017年12月16日，改名为中华民族致公党。
2010年5月21日，于中华民国台湾内政部登记成立第一个以洪门为正式名称的政党即是中国洪门致公党（政党证字第167号），公举由台湾洪门致公堂总堂主萧明英(宝)为主席，宗旨系以【事谋国家进展为先，时以人民福祉为念】为宗旨。
中国青莲党（政党证字第184号），洪门青莲堂系统，由世界公认之长房青莲堂总堂主洪棍何俊元为主席。
中国新洪门党（政党证字第200号）、台湾洪门共济党（政党证字第262号）等。
今台湾大部分之山头多以哥老会为主。

。。。。

中国大陆

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
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决定，成立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炯明为党的总理。1925年12月陈炯明退居香港，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设于香港，而陈炯明、唐继尧被推举为正副总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致公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8个民主党派之一。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参政政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大参政党之一。2007年4月，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及接任第13届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并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为自傅作义过世后30多年来首位非中国共产党籍的部长，以联系海外洪门华侨团体回归祖国。

至于其他洪门分支组织大多奉行避世，据指在中国大陆现在存在着的洪门分支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洪门组织遗留。

。。。。

洪门组织之优点是有纵横系统，如在职位名称上有龙头、坐堂、执堂、心腹、巡风到么满的纵列，又有“言谈”、“手势”等的横向系统。即使第一次见面的洪门弟兄，一见手势动止，一闻“春典隐语”，一说“花亭结义”，则是兄弟也，即是生死之交，若原有仇恨也化为玉帛。这种纵横系统，言谈隐语、手势均是洪门博学之士所编造的，在世界上并无其他任何秘密组织所能望其项背。洪门组织对入会无资格限制，仅须有介绍人，加入后彼此以手足相待，所以虽是秘密组织，但发展迅速，由台湾延伸至中国大陆及海外。

哥老会、袍哥
以下之组织乃四川、长江流域哥老会袍哥之山堂组织架构：

忠义总堂（“山 、堂、水、香”四字号）

山 主；或称“寨主”、“龙头”大爷。

副山主；或称“副寨主”、“副龙头”大爷。

内八堂（内八堂皆为在朝“京官”、内阁阁员）

香长；或称“圣堂”大爷、开香堂时的主香人，为客卿。

盟证；或称“中堂”大爷、开香堂时的盟誓人，为客卿。

坐堂；或称“左相”大爷、总管山寨事务。

陪堂；或称“右相”大爷、协助总管山寨事务。

管堂；或称“总阁”大爷、负责人事升降赏罚。

执堂；或称“尚书”大爷、负责人员组训工作。

礼堂；或称“东阁”大爷、负责教育礼仪。

刑堂；或称“西阁”大爷、执掌刑法。

护印大爷

护剑大爷

外八堂（外八堂为“军队”“分支”）

心腹；“刑副”大爷、领军武将。

圣贤；“圣贤”二爷、军师、负责谋画(谋划)。

恒侯；“当家”三爷、总管财务、粮饷等内务，又分披红与插花。

金凤；“金凤”四姐。

管事；“管事”五爷、负责对外及总务，又分承行、执法、红旗、蓝旗、黑旗、青刚。

巡风；“花冠”六爷、负责巡查，又分内巡风、外巡山、镇山（光口）。

银凤；“银凤”七姐。

贤牌；“贤牌”八爷、登记功过、替人讲情，又分白袍与八德。

江口；“江口”九爷、职司挂牌，凡开山立堂，栽培新进或办提陞之仪式人员，又分检口、抖口、守口。

么满；“么满”大爷、或称“镶门”，负责杂务的士兵，又分总么满、执法么满、镶门、大么、小么、大满、小满、铜章、铁印。

少保；或称“少侄”、“太保”，在组织里的位阶只有半步，入会人通常为未成

年者，社团先予以记名，在组织里见习并学习仁义。

三合会

以下为珠江流域、东南沿海三合会组织架构，地缘关系与南洋地区的公所、会党较为相似：

龙头（四八九），又称“坐馆”、或称“话事人”；为全社团最高领导人。
二路元帅（四三八），又称“香主、先锋”；每堂口设有一名或多名，在平时二路如非坐馆有职无权。
红棍（四二六），俗称“揸fit人”；简称十二底，多是金牌打仔；众四二六中最杰出者则被尊为双花红棍，意指文武全才。
白纸扇（四一五），又称“先生”“白扇”；简称十底。负责文职，讲数，亦负责社团财务，管理数簿，为社团军师。
草鞋（四三二），又称“铁板”；简称九底（九底以上通称为大底）。负责“信差”，对内外事务之联系。
四九仔（四九），又称“马仔”（洪门大典开堂收马）；经入会仪式入会者则为四九，为普通会员。
揸数，又称“讲数”，通常负责社团财务，管理数簿，属文职，多由“白纸扇”兼任。
挂蓝灯笼，所有有意入会而未经仪式之非正式会员。

南洋私会党

以下为星马华人私会党、公司、公所的组织架构：
大哥：也被称“总理、元帅”，在星马私会党公司中，皆是指首领，是会党的精神象征。
二哥、三哥：为私会党公司中的副首领、助理首领。在大哥、二哥、三哥之下，各自带领白扇、财副、虎将（先锋）等。
先生：先生者，须熟悉口令、诗句、礼仪，且通常较为年长，不属于特定

的公司；只有在主持入会仪式时，聘请先生出现。

红棍：被视为"法官"，与先生一样不属于特定的公司，只在会党发生纠纷时，担任仲裁角色。

白扇：为会党各香堂的军师、头目；有权发号司令，代表会党对外谈判，对内处理会务。

财副：负责会党财务管理，许多财副是由大哥或白扇兼任。组织规模大者，又有柜匙（会计）、收柜（出纳）等职称。

虎将：也有称"先锋"者（如大伯公），为会党的打手、小头目，负责领兵维护地盘、收取规费等。

草鞋：也被称"铁板"，会党中担任"信差"的小头目，负责传递情报讯息、命令，领兵执行任务。

马仔：人数最多的普通会员。年资较深可带新人入会者，被称"老马"或"带马"。

天地会

传统天地会大致上只有大哥与师傅（军师）两种称谓，发起人为大哥，熟悉仪式者为师傅；随着规模与人数增加，内部分工与职称愈多细腻。然而，成立时间与地点不同的情况下，同职称确有不同含义，也时有所见，如有"先生"与"香主"，在职称上不同，但职务与地位相似的情形。不过天地会发展到成熟时期，一般只有三个主要职务统称"三花及第"（指头顶配戴的龙眼双花、牡丹单花、凤雀双花），其职务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分别象征权力的"棍"、谋略的"扇"及行动的"鞋"：

洪棍（四二六，十二地支）统帅、炉主、总理大哥、负责开台以及主持一切事务。

纸扇（四一五，十天干）军师、师博、书房主，掌兵权、管钱粮。

草鞋（四三二，九宫）领兵将军、头目、具备文韬武略特质，传递情报、命令、执行任务。

在三个主要“及第”职务的底下就是

会员（四九，太极乃十八阴阳四九分）普通成员、士兵。
此外，后来衍生出在特定场合时（如开台仪式等）才会出现“有职无位”的象征性职务，大致有：

先生、香主（四八九）陈近南职、熟悉教条礼仪、主持入会仪式。其诗词，意喻主持仪式之职（四八九）仍是由资历深、地位高的师博（四一五）在特定场合受炉主邀请来担任，仪式结束即完成任务，领取谢酬后走人，并不直接涉入该组织事务。
先锋（四三八）天佑洪职、领兵打头阵；则是在特定场合由众领兵将军（四三二）中最优秀者由炉主推荐所扮演，协助仪式的进行，仪式结束后即恢复原本身份。
以上各职务并搭配“天干 地支 九宫 太极 易经”及历史诗句等隐语。

会簿（广东三合会的海底）
组织之秘密会册，只有组织之高层拥有。内容为组织组成之历史、现任组织名单、组成结构、入会形式、誓词、违反组织之刑法、背（隐）语、手语、在公众地方表达为组织中人之方式。隐语为“海底”，又名“金不换”。

在施琅攻台时（1683年），郑克塽将其祖父郑成功开山（金台山）立堂（明远堂）有关洪门天地会中的文件、名册、印信等装入铁箱密封，沉入海底。

三合会会簿
民国洪门中人樊松甫曾撰文说：1848年（道光28年、事隔16年后太平天国前期），永宁郭永泰开尽忠山，持有在福建渔人手内获得的《金台山实录》，所以定名为“海底”。以后之三合会会簿，由此演变出来。

重大影响

太平天国
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举兵称太平军，成立太平天国，得力于广东三合会。

刘丽川1845年于香港参加洪门组织三合会、同年英属香港响应清廷建议取缔三合会。

孙中山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檀香山时，由三合会首领介绍入会，并开立山堂，改组致公堂，创立兴中会，山堂名"大陆山"。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上说：
"…追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也。此乃洪门创设之本意也。"

二战后，三合会在香港演变成犯罪组织。

其他影响
台湾清领时间有朱一贵在康熙六十年（1721）起义，七日占领全台湾，即借助洪门的力量。
乾隆（1711-1799）时福建莆田、福清之天地会（一说成立于乾隆26年）领袖万提喜（又称万提起、万云龙、云龙和尚、洪二和尚）事件。
台湾，福建天地会之林爽文（1787）、戴潮春（1862）等的武装反清事件。
1855年，两广大成国李文茂 事件。

清朝时代，在官方长期的扫荡下，台湾民间对天地会仍然持续暗地而传承

下来。今日在鹿港就建有福灵宫，专为洪门天地会林爽文反清起义事件所设立，其主神位是林爽文的平海大将军“王勋”。另外在台中县沙鹿“福兴宫”，也是崇拜在林爽文事件中，以标榜“反清复明”天地会九龙山的王勋，并尊为主神来祭祀。

会党（社团）与教门

清朝乾隆时，洪门遭多番围攻，加上乾隆重用汉人、广兴文字狱、弗准民众聚会，具规模的反满武装和文学组织难以延续，代之而起的便是地方性的社团和教门。

辛亥革命之始，革命党人说三合会是以“反清复明”而成立的，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需要争取国内的会党及海外的华侨支持，所以可以合作的会党，皆视为洪门组织。由于当时的会党是现成的有势力组织，加上海外的经济支援，同盟会提出“革命排满”来作号召。

清代暗语说：“瓶中太满水须走，青叶红花白莲藕”，即是意指“反对满清的帮会，有青帮、洪门、白莲教三大主力”，又有俗谚说“红花绿叶白莲藕（指洪门、青帮、白莲教），三教原来是一家”。

白莲教
白莲教始见于南宋。清朝中期，由于耕地不足、农民生养艰困，白莲教教徒在四川、陕西和湖北一带以农具反抗清朝地方政府，他们自称“精通神打，刀枪不入”，所以清廷称他们为白门邪教；后期发展到东南亚。又名“二四红宫”、“二四老君”。历时长久洪门实力范围不断广大，白门已面临末期，许多教友私下加入洪门。

青帮与洪门

传说中青帮（又作清帮）是三个参加天地会的水手首创。虽然青帮与洪门有相当之渊源，但洪门讲究结拜兄弟义气，以道教与民间信仰为主，佛教为辅，主要祭拜天公、地母、关帝君等。

青帮信仰罗教，罗教源于禅学，故实行禅宗制度，所以与洪门中互称兄弟不同，青帮组织礼拜释迦如来、达摩祖师、六祖大师教主等，深具佛教风格，道教色彩相对平淡。拜师入帮，会众以师徒相称，崇尚“师徒如父子”。青帮比洪门组织更严密，规矩更复杂，于是也更加秘密。因此有言道：“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

倾向于行会性质的青帮提倡“隐身市井”，并未如洪门般强调反清复明，由于青帮并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所以洪门一度将其当作叛徒，严禁洪门会员转投青帮，称“由青转洪，挂彩披红；由洪转青，剥皮抽筋。”。

但为了避免冲突，两派仍多称“青洪一家”，所谓“红花绿叶白莲藕（指洪门、青帮、白莲教），三教原来是一家”。尤其清末革命党思想勃兴，不少青帮弟子也开始反清，两派逐渐减少敌对。

拜上帝会
1843年由洪秀全成立，是太平天国的前身；有天地会众参与其中。

广东三合会
天地会于乾隆后被列为反清组织，明令禁止，违令者死。其流传之野史被广东洪门组织所承认，因为避满人之猜忌，改名为“三合会”。1848年后，

有关三合会的会簿（洪门会册）传说，据称一福建渔民于海底所获。

两广的洪门组织于太平天国起义后（1851年），互相联络结盟、组织成三合会，曾于琼花会馆的红船中会议，发动两广（特别在大城市，如广州及佛山）的大武术团体中成立堂口，训练洪兵。

得悉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1854年，三合会李文茂及洪兵起义，引起清廷火烧琼花会馆及所有红船。之后三合会则传出火烧南少林寺的传说、说当时的不同南拳门派都源出福建少林寺之少林五老，目的是将原来不团结的武术团体组织一起，共同反清。

两广三合会会簿记录："其时（南）少林寺，武风甚盛，招清廷忌，派兵围捕，攻而不下。适有新科状元陈文维者，邀宠献议，设法勾通寺僧马甯儿等，四处纵火，里应外合，少林寺被毁，僧徒四散。于是至善禅师（洪拳领袖）与白眉道人（白眉派领袖）、五枚师太（咏春拳之祖师）、苗显（广州花拳首领）、冯道德等五人亦分途出走。

上海广东帮派－小刀会

1849年，经营砂糖和茶叶、蚕丝生意的香山人刘丽川，来到上海，建立同乡会广肇会馆，他是著名的小刀会首领。当时广肇帮中以香山人最多，人数有两万多。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焚毁。可见广东帮派传入上海。

其他

天地会流传极广，其他尚有"清水会"、"匕首会"、"哥老会"、"双刀会"、"小刀会"、"红旗会"、"剑仔会"、"八卦会"、"添弟会"、"三合会"、"致公堂"、"红帮"及袍哥会、红枪会等名称。

义和团

原称义和拳之八卦教组织，亦与天地会会众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清朝初期于山东河北一带活动，乾隆时被列为秘密结社，依法被禁。慈禧太后时期，毓贤为山东巡抚，利用民间势力，重组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最终导致1900年之“拳匪之乱”及八国联军。

华记
马来西亚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华记”是“青帮”延伸出来的帮派，历史源远流长。华记年长辈成员有说法华记俗称‘四窿’实是源自中国青帮；有著名派系如十八和四窿仔等等。大约四分之一大马华人黑社会的成员系出华记会员。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93%AE%E6%95%99

白莲教，是跨越多个中国史上朝代的一个秘密民间宗教组织，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包括弥勒教在内的其他组织的内容，但一般认为主源是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的佛教净土宗分支白莲宗。因其教徒禁食葱乳，受持五戒，不杀生不饮酒，其派神职人员不出家，多娶妻生子，常被视为附佛外道和邪教而遭朝廷查禁。白莲教作为一个秘密民间宗教组织，在历史上发动多次民变，屡次受到镇压。

在元朝时，白莲教与明教、红巾军、弥勒信仰有关。元末白莲教和明朝建国的关系亦有专书介绍。在明朝以后，接受了罗清的“无生老母”思想，成为

了罗教系统的秘密宗教。

发展

南宋

茅子元是天台宗门下的弟子，崇慕慧远白莲社之遗风，又受天台宗派观念的影响，因而改造了兴于民间，成员关系松散的在家佛教"莲社"，在庶民中组织起一有师承、有教义，倡导念佛往生的社团。这个团体有出家弘法的僧人，也有在家信徒；并且，为使教法更普及于大众，白莲宗允许在家弟子从事吸纳门徒、宣传教法、化缘建佛堂等，按佛教传统只能由僧人进行的活动，这样便形成了僧、俗两个传法系统。这一组织架构是白莲宗最大的特色，但也与佛教的传统相对立，在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弊端，因此被佛教界所非议。

白莲宗不杀生、不饮酒，禁食葱乳，严守护生之戒，因此宗徒号称"白莲菜"，又称"茹茅阇梨菜"。外人则称之为"吃菜事魔"。茅子元去世后，有小茅阇梨继承茅子元之教，使之盛行南方，由于出家僧众对在家俗众并无强制约束力，对冒称白莲道人触犯刑法者，亦无从管制，又混杂民间信仰，因而日久渐生风俗坏乱之弊，"庶俗僭称活佛如来，妇人擅号佛母大士"，妄谈般若，乱说灾祥。因此常被取缔。也因此流传不广，故影响不大。

而后，在教义上，白莲宗受到弥勒教影响，从崇奉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改信奉兜率内院的"当来下生娑婆世界"的弥勒佛，以净土宗的譬喻"火中生白莲"为象征，并混合了明教的内容。

元朝

白莲宗以弥勒佛将会来救世的传说，作为号召，动辄宣称弥勒佛下生，起兵造反，自然也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江西都昌县杜万一（又名杜可用）号称"杜圣人"，以白莲宗组织发动起事，后

自称“天王”，改元“万乘”。这是白莲宗诞生后策动的第一次民变；但因为白莲宗与白莲教在历史上界定区分并不明确，因此也被认为是白莲教第一次民变。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因皇帝认为此等人物“有妻子，身已不清净”，敕禁白莲社。时有庐山东林寺普度（？—1330年），自承慧远留下的千年正教，致力于复教运动，撰写《庐山莲宗宝鉴》10卷，阐明了子元所倡白莲宗的真义，上奏朝廷。于是白莲宗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得以复教。普度受命为教主，世称优昙宗主。在宗教政策宽松白莲教可以公开传播时期，白莲教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其势力渗透到河南、江淮和长江流域地区。但是，宗门的情弊仍未改善，复有社会反对分子潜入，故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后又遭禁断。

此后该教的僧人渐渐远离“白莲宗”的名号，回归到正统佛教当中，而民间仍在继续流传，并进一步与弥勒教、白云教、明教等相混合，称为白莲教，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白莲教赵丑厮、郭菩萨宣传“弥勒佛当有天下”，聚众起事。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陈州白莲教胡闰儿（棒胡）称弥勒佛已经降生，聚众烧香起事。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江西袁州彭莹玉、周子旺组织白莲教起事。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缺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元末朱元璋依附“明教”起义，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其实也受到白莲教影响。至此，弥勒教正式融入白莲教。

明朝

元朝末年红巾军领袖，韩山童父子便是以家传白莲教聚众起事，宣传口号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后朱元璋亦以“明”为国号。朱元璋成为皇帝之

后，知道白莲教会对其帝国构成威胁，纳李善长之议，多次取缔白莲教，《大明律》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明成祖永乐十八年二月（1420年）山东白莲教女教首唐赛儿发动起义，旋即失败。

成化十八年（1482年），山东即墨军人罗清在北直隶创立了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教义，认为人终究必须回到“无生父母”的身边，而“无生父母”成为最高阶的主神。“无生父母”此一概念，演变为惟一的神“无生老母”，无生老母为白莲教等等教派所接受，几乎皆以“无生老母”为主神，并有三教合流的姿态，宣扬“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下凡拯救世人。

万历年间，有所谓的闻香教，“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座，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千里。……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王森伏诛后，信徒山东巨野的徐鸿儒、北直武邑的于弘志分别发动武装叛乱，均遭明朝镇压。

万历十五年（1587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奏：“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奏称：“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万历四十三年，白莲教发展至高峰，“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醵钱轮会。一名涅槃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

清朝

清兵入关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又与许多民间宗教融合，如老官斋、八卦教，其名目繁多，加上旧有支派，竟高达百余种，教义更加芜杂。清朝的

白莲教徒以反抗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

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到了乾隆后期，清朝国力开始下降，是白莲教鼎盛时期，在东北和南方各省广泛流行，其中又以大乘教流行最广。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水教徒王伦聚众起义。

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颇伤清朝国力，之后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的天理教之乱是最后一次白莲教名义的叛乱，之后逐渐消失于历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义和团之扶清灭洋运动的主要团队、有部分追溯起源于白莲教的分支派八卦教。

影响

直到近代，白莲教仍未消失，但已发生质变现象。根据清末学者劳乃宣考证，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但义和团的信仰主要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宗教信仰，如义和团提出的保“华教”、反“洋教”，华教主要是尊孔教、讲人伦、祀祖宗、尊玉皇、拜关帝、诵观音、念弥陀等这些民间主流的三教合流信仰，但偏激极端，并不全然同于白莲教。但不可否认，包括义和团在内的许多民间宗教与团体，都与白莲教息息相关，他们有着相似的信仰及传说，通常以“无生老母”为主神，以弥勒佛救世为号召。

白莲教在民间流传盛广，出现许多英雄人物，在《聊斋志异》故事里也有反映。

白莲教思想也与后代的许多宗教有渊源关系，如罗教（尊明朝北直隶密云县军人罗清为始祖）、斋教（亦尊罗清为始祖）、在理教（尊清初燕京白云观道人杨来如为始祖）等。

。。。。。。。。

（以下文字引述维基百科“罗教”相关文字，有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6%95%99

罗教，又称无为教、大乘教，中国明清两代流行的民间宗教教派，明代中期由军人罗清创立，以《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六册”为主要经书，主张寻求人心本性的觉悟，反对外在的宗教仪式或造像，适合在家修行，信众以运河水手为主要基础，会堂遍布大江南北，各自为政，信徒诵经、食素，作风平和。在民间，罗清被称为“罗祖”，地位崇高，罗教也常被民众视为佛教的一支，信徒众多，分成多个派系，往往与白莲教并称，在山东一度威胁正统佛教的地位，在清代多次受官府取缔，被指斥为邪教，支派流衍成长生教、青莲教、真空教、斋教等多个教派。

创立

罗教由山东崂山下的即墨县人罗清创立。罗清出身军户，是漕运运粮军人，曾在北京西北方的密云卫服兵役，皈依佛教，退伍后苦求佛理13载，自认悟道于1482年，1509年67岁时终于著书阐释佛法，得到宦官的援助，在漕运船民中传教，也得到大宁和兰风等僧人支持。相传罗清一度在浙江传教，共布教18年。其后大宁在江西传布罗教，弟子甚多，盛行各地；兰风自称已经达到觉悟的境界，晚年住在苏州天池山传道。

经书及教义

罗教主要经典是罗祖所写的五部书，称五部六册，题为宝卷，于1509年刊印，多处引用《金刚科仪》，充斥《金刚经》和《华严经》的词语，弥漫

着空论意识。当中没有无生老母，较少涉及道教名词，也不太着重救主弥勒佛。五部经书名目如下：

《苦功悟道卷》：罗清的精神自传，自述曾拜见明师，请教如何修行，念佛多年，明白“彼国”只是幻想，研究《金刚科仪》3年，亦未能参透，最后终于觉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找到脱离轮回的方法；人人心中都有悟道的能力。

《叹世无为卷》：指出佛创造并主宰世间万物，感叹生命转瞬即逝，哀叹人生的苦难，告诫有罪者终将受到惩罚，呼吁人们悔过，承诺信教者将获永恒的救赎。即使在世间行善，最多只得轮回善道、投生显贵，但仍然是沉沦。劝人斋戒，遵行仪轨，但不应依照世俗的仪式，最重要是个人的觉悟。

《破邪卷》二册：全名《破邪显证钥匙卷》，经中谴责念佛、受戒、禅定、造像、布施、苦行和出家等一般佛教修行，这些修行都是“外相”，不如精神上的觉悟。

《正信宝卷》：全名《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驳斥佛教一般的仪轨和布施，强调正信和斋戒，引入新神祇“无极圣祖”，无极圣祖创造万物，可能是指“过去佛”。经文批评参拜佛像是执著色相，也批判道教和白莲教的修行方式。唯有靠顿悟的工夫，才能达到“空”绝对自由的境界。

《泰山宝卷》：全名《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指出人性及其本来面目是万物之源，是最深层次的自我，永劫长存，真性先于万事万物而存在，批评世人缺乏信仰、哄师欺祖、毁谤佛法；天地的本源是虚空的，修心才能上通本源。

罗教致力于单纯虔敬，行善积德，教义综合禅宗与净土宗，强调净土即人心中的佛性。他批评对经典和偶像等外在物品的崇拜，将禅宗通俗化，强调人心是一切的根源，等同于真空，即万事万物的本质。所有人都有佛性，唯一目标是寻求佛性而获得觉悟。他反驳一般的礼拜方式，认为那是

“有为法”，专注于外在、表象的东西，他则主张向内探求，方法是无为，故教派又称无为教。罗清批评白莲教，也不提及白莲教崇拜的无生老母。

罗教后人继续写造经书，重要的有1639年“明空祖师”所作《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1682年的《三祖行脚因由宝卷》3卷、清末《四世行脚觉性宝卷》。19世纪初有个漕运水手方荣生撰写了六本书，宣扬般若波罗蜜，共130册，但被官府没收，没有流传。《三祖行脚因由宝卷》记述罗祖与7位番僧论道，提倡一不念经、二不供佛、三不烧香、四不供花、五不扬旛、六不做佛事、七没有经堂、八不动响器，九不点灯烛，基本上是要以参考空为名认识佛性。罗教强调与官方的亲善关系，《三祖行脚因由宝卷》讲述罗清在君王面前展现神通，进而受封，获颁御制龙牌和五部经文。

历史

明代

罗祖之后无为教开枝散叶，罗祖子孙与弟子们分成多个派系。从嘉靖到万历年间，罗教迅速发展，以运河水手为基础，以南直隶（今江苏省、安徽省）、浙江为主要根据地，结社信徒众多，大肆招揽民众，信徒包括徽商程氏一族。配置在漕运沿路的镇守太监，多半是罗教信徒。罗祖被画成佛像，受到崇拜，神化为救国民族英雄，拯救中国对抗西藏番僧的阴谋，免受外敌入侵。罗清以后，罗教另一祖师是殷祖殷继南（1531-1582）。殷继南在浙江传教，原籍浙江处州，得处州当地教派领袖卢本师确认为罗清转世，受卢本师转拜为师，奠定殷祖地位。他创作供信徒修练的口诀歌，如〈直指口诀歌〉、〈恳切叹世歌〉等，任命东南各地28位“化师”，道号多以“普”字命名。他秉持罗清思想外，也采纳了部分白莲教的神话，包括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论述。殷继南曾被收监六年，出狱后仍继续传教，几个月间，在缙云度化3700余人，因传道活动过度盛大，再次被捕，被公家收斩，一说死于狱中。死后女弟子处州人琼娘（普福化师）继承法脉。

士大夫和僧人对罗教态度不一。明代后期，罗教信徒为五部六册写了不少评注，包括临济宗第26代传人兰风，撰有《开心法要》，1596年，临济宗第27代传人源静再加补充，他们自称临济宗的嫡裔，又身为民间宗教领袖，得到僧尼的协助，信徒包括少室山的僧人。晚明的许多佛教徒认同罗教是佛教的一个派别，并非外道，部分官员敬重罗祖，如朱之蕃、周如砥，把罗教等同佛教，亦有士大夫加以信奉。罗教在罗清家乡山东势力强大，威胁到佛教寺院的地位，高僧密藏道开和云栖莲池都批评罗教。万历年间起，官员攻击“白莲、无为”，把罗教当作白莲教的一支，主张取缔。1585年、1586年、1587年、1603年、1615年都有大臣上奏主张镇压无为教，1606年，无为教徒刘天绪在凤阳有意举事，自称“无为教主”，说“皇极佛”将出世，聚众讲经说法，向教民募款，企图劫掠官府，其信众包括官兵，因教民自首而败露被捕。南京是罗教的一个中心，1618年南京的衙门下令取缔罗教及其经书。但崇祯年间，南京居士仍注释了五部六册，善信继续捐款刊印罗教宝卷。

明末罗教另一祖师是姚祖姚文宇（1578-1646），自称是殷继南祖师转世，在浙江武义县开堂传教，道法大行，他整合浙西山区与福建的几个教派，包括殷继南传人普福领导的教派，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分支教区命名，所任命的化师分布浙江、福建、江西，最远达湖南，自己则游走于江南，与地方官员亲善，推动修桥整路等慈善互助活动，吸引百姓以追求功德而加入，成为江南实力最雄厚的民间教派。姚文宇法名普善，教派号称龙华会和老官斋，“龙华”是弥勒佛所召的第三次末劫大会，“老官”则是罗教徒互相问候的敬称，是首领之意。姚祖信徒和传人不论男女，都以“普”字为行，奉姚祖为“天上弥勒”、“无极圣祖”。

清代

清代罗教结社在闽浙、两江等地最兴盛，其中庆云和永嘉是罗教圣地，并

由福建传到台湾，沿长江传入四川，四川亦有支派。18世纪，罗教发展达到顶峰，罗教信徒在各处建立斋堂，结社名称各异，在福建称龙华会和老官斋，在江西称大成教和三乘教，在安徽称三乘会，也有称金童教、观音教、大乘门，都奉祀罗祖，也有斋堂挂上“天地君亲师”等牌位让信徒膜拜。清代前期，翁岩、钱坚、潘清三祖把罗教传遍大运河流域的士兵与水手中，三祖负责监造粮船，督理漕河修场工程，广收徒弟，辗转相授。井257罗教成为华东华南运河、河流沿岸地区最流行的教派，各地建立庵堂，供漕运水手在冬季留宿。庵堂里有长居者看守庵产，进行礼拜，亲自耕作维生。来自华北的运粮水手每年来到江南，无处住宿，就投向庵堂、经堂，在当中接受罗教，居住期间，每日支付饭食银4分，等待来年春、夏运粮北上；庵堂亦为年老无依的水手提供退休栖息之地。有水手成为罗教教首，如雍正时的李道人、刘把式。罗祖和翁、钱、潘三祖则被编入慧能以下曹溪禅临济宗的系谱中。

罗教信徒不限漕运水手，也有城市工匠和农民，在家素食、修行，有罗清的五部经及其他多种经书。乾隆时江苏的罗教首领有僧人性海。清朝对异端、邪教大力镇压，罗教多次被检举，官府取缔。雍正帝于1727至1729年发动打击罗教行动，颁布禁教条款，整顿大运河一带的漕运水手，扫荡福建、江西一带的斋堂。1727年，清朝在浙江饬禁罗教，毁去经像，但保留庵堂让水手住宿。1729年，江西巡抚谢旻检举了191名罗教徒，其中有佛教僧侣68人。1734年官府在江西查禁罗教，搜出过千本经书。1748年，福建有一个无为教女巫，法名普少，说弥勒佛要降世，为使入狱教首获释，教唆教徒攻城，战斗两天，兵败，事后当地禁止老官斋。1768年江苏罗教亦遭检举，苏州查出经堂11处。同年浙江巡抚觉罗永德查明当地经堂有70多处，把庵堂改为“公所”，浙江罗教大受打击，因而衰落，部分罗清子孙至此亦不复传教。

清代姚文宇子孙继续在浙江和福建传教，子弟多兼习儒学入仕，姚文宇儿

子姚铎曾为弟子员，并参与平定三藩之乱，子孙皆享有功名，故当地罗教领袖不少为贡生、监生。教主到达斋堂后，当地信徒烧香念经，奉上供养，教主则替信徒取法名，接受香资供养，回赠以染色的熟干糯米，让信徒磨粉加以服用。信徒请他们命名的，要给银三钱三分，以供香火。受清朝镇压罗教所连累，一些姚氏族人受官府严惩，但教派活动未被铲除，道光时，有姚氏子弟出售盖有图章的敕令符咒，作为辗转传教的凭据。19世纪时，罗教已遍布中国大部分地区，与白莲教的教派名称和教义有合流现象。晚清时，浙江无为教道人潘三多（1826-？）重申罗祖无为的教义，不念经不立像，受奉为四祖。

分支

罗教影响了明代后期华北的弘阳教，弘阳教同样反对诵经念佛，呼吁人们悔改，并把罗清当作弘阳教祖师之一。清代罗教衍生多个教派，其中一个支流是无为金丹道，又称青莲教，雍正年间在江西创立，再演变为先天道，流传到华南及东南亚。清代先天道把罗清当作第三劫的救世主，取代弥勒佛的位置。流行于江苏、浙江的长生教，也是罗教支流。同治年间，赣南的廖帝聘创立真空教，属罗教支流，其经书大部分都引自罗祖的五部六册，廖帝聘曾因被指邪教而两度下狱。真空教在民国时成为慈善团体，并传布到东南亚华人社会。青帮亦源自罗教，来自漕运水手中的罗教组织，青帮三祖翁祖、钱祖和潘祖都是罗教弟子，青帮也和一些罗教斋堂一样，拜祭“天地君亲师”牌位。

组织

罗教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结社分布各地，虽奉祀同一创祖罗清，但各自为政，没有共同行动，领袖是世俗和世袭的，罗清的子孙亦世袭为教主，清代雍正年间，教主是罗清第八代孙罗道。罗教经堂以创立者的姓氏命名，在清代浙江，教首的法名以“普”字为行，如普善、普禄、普瑞等。各经堂分立教门，首先效忠本门祖师，教权由师父传给其挑选的弟子，与佛教

寺院相似。罗教信徒在会堂活动，名称不一，如斋堂、经堂、庵堂，在厦门则叫菜堂。管理斋堂的，叫"菜头"，负责祭祀仪式。为了躲避官府取缔，会堂有时要隐藏地点。庵堂平日仅一二人看守，透过看守相联系。福建的老官斋，每月朔望，入会男女各持香烛，到斋堂念经聚会。师父会向弟子讲解经卷，教徒抄写经书，一同吃斋，甚至到患病信徒家诵经驱灾。会众会筹集钱财，修建屋宇，造像印经。1768年，清代官府禁毁庵堂后，水手把会堂转移到粮船上，称"老堂船"或"香火船"，竖有罗祖像的旗帜，同样分立教门，演变成不同的帮派。

清代浙江姚氏一系罗教组织倾向家族化，教主称"相公"，按例皆由姚氏族长自姚文宇后人选出，到处旅行传道，每年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斋堂主持活动。"相公"所处斋堂就是祖堂，故祖堂不只一处。罗教信徒按修行和贡献分不同阶级。浙江龙华会中有三层"工夫"：第一层工夫叫小乘，念28字偈语；第二层工夫叫大乘，念108字偈语；最高层叫上乘，没有偈语，只要打坐。学每层工夫都要向老祖堂送香资。福建的罗教，教徒按修行程度分为9个阶段，最高指导者叫"空空"，第二位"太空"，第三位"清虚"，第四位"书记"，第五位"大引"，第六位"小引"，第七位"三乘"，第八位"大乘"，第九位"小乘"。第八、九位授予初信者，第七位是入教后透过诵经达到某程度的功德而获得的；第五位是授予能给予结社金钱和精神援助，且能守五戒，足以为模楷的信徒；书记担任记录、文书的工作，由"空空"任命。从"小乘"到"书记"都可娶妻，是有俗世职业的在家信徒，上三位的"空空"、"太空"和"清虚"则独身，多半由僧人出任，是专任布教师。

地位

罗教是明清时最重要的民间宗教之一，与白莲教平分秋色，但没有像白莲教一样动员群众，甚少暴力起义，明清两代各有一宗。罗祖经书地位崇高，为明清其他教派采用和改写。1564年佛教徒"金山子"撰写《圆觉宝卷》，仿效罗清五部六册的形式，但内容上则批评罗清打破偶像，不分尊

卑。1573年，北京比丘尼归圆也撰写了“五部六卷”宝卷，模仿罗清的五部六册，多次引用罗祖经书并提到无为道。大约同期的《安养宝卷》大量借用罗清的术语和概念。万历年间，华北的弘阳教称罗祖是“栴檀老祖转世”，修成正果，劝化世人，其经书多处引用罗教经书，把罗祖视为弘阳教自己的祖师之一。民间有女巫采用罗祖的经书为祷文。

罗教被批评为异端邪教。晚明时，罗教威胁正统佛教的地位，受佛教高僧批评为邪教。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莲池，批评罗清所说的“无为”，其实是废弃各种德行，违背了万行即空的道理，心中放不下利害关系，标榜无为而图有为，是假道学的邪教，正统佛教徒应加以攻击。密藏道开则批评罗教经书贪婪淫恶，危害人心，不应留存于世，为害更甚于白莲教。罗教因受到宦官的援助，也被东林党及复社指摘为异端。晚明官员认为罗祖等教名，是已遭镇压的白莲教徒改用，其实都是左道，理应禁止。清代官府指出罗教并无不法情事，但亦指斥为邪教。

+++
+++
+++
+++
+++
+++
++

红灯照、大刀会、小刀会、等等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有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7%87%88%E7%85%A7

红灯照，一作红灯罩，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女性组织之一，其他类似的组织尚有青灯照、蓝灯照、黑灯照、砂锅照等，但以红灯照最为重要著名。

义和团女性组织概况

义和团的组织，是以坛为基层单位，分属于八卦八个团（总坛），各团有老师为首领，而坛有大师兄、二师兄等为其领导。义和团中妇女组织亦类似男性组织，但其独立于男性各团之外，而有自己的坛口，然而经常附属于某个总坛而与之配合，例如黄莲圣母所领导的天津红灯照及张德成的坎字团就是这种关系。团员一般彼此以姐、师妹称呼，其首领称作大师姐、二师姐…等，在天津的红灯照，则称其首领为黄莲圣母、二仙姑。妇女组织的发展以天津城最发达，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地区发展。

义和团中的妇女组织见于记载的有红灯照、青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及砂锅照等。其中红灯照，按当时人记载，“女童习红灯罩”，或说红灯照用“十许岁之女孩”，又说大致上是“取十八岁以下至十二岁以上之闺女”。一般说法是她们全身穿着红色装束，手提红灯笼，故称作红灯照。

相较于红灯照为较年轻的女性，其他的妇女组织如蓝灯照、青灯照、砂锅照等，多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尤其是寡妇所组成，例如有“妇人习蓝灯照”的说法，又一说青灯照是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而黑灯照为一寡妇创办，团员多为青年寡妇。总之这几个组织大致上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尤其是寡妇所组成的，各组织按其装束的颜色作为区分，但这些组织重要性和知名度不如红灯照，几乎不见于文献记载。

红灯照女性的背景

义和团中妇女的出身类似于男性，多来自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例如天津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林黑儿，即本出自船家，曾为妓女，她在天津地区就多召集下层的女子加入红灯照。又如在义和团中地位不低的女性翠云娘，早年是与父亲卖艺江湖为生的。

红灯照女性的训练

义和团为一具民间信仰色彩的武术团体，因此红灯照亦有种种的武术和法术训练，平时在她们师父的领导之下，会练习如挥刀、煽扇子等的功夫。

而据说红灯照女性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练习之后，可步行水上而不湿，并可腾空而飞，又手中扇子一挥，则敌人大炮会不响，或者船舰房屋会自然起火等等。这些法术虽多半为迷信和宣传的幌子，但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女性的加入。

红灯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活动

在义和团运动中，妇女的主要参与包括医疗救护、情报的搜集、实际作战、以及在宣传和团员心理上的支持等。

在医疗方面，红灯照的黄莲圣母可能学过一些中医、草药的道理，自称能医治各种病伤，又宣称能用香灰治枪伤，因此向她求医之人甚多，而且据一些参与义和团运动的老年人的口述，她们真的医治好了不少受伤之人，并且称赞黄莲圣母的医术。

在宣传和心战上，如黄莲圣母到铁铺买螺丝，却自称盗自洋人大炮，又用各种神迹的宣传，使人们相信红灯照都具有神力，一方面使人们敬服，一方面能提振团众的信心及士气。而另外有所谓“踩城”的制度，每隔七到十日出户绕村子跑，边耍刀边喊口号；又有“出风”，即在公共场合练功夫。借着

这些方式，达到对大众宣传的效果。

红灯照组织与妇女地位

具神性的女性

在红灯照中，可看到不少女性因加入而提高了自身地位，获取了权力。如天津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清朝官员裕禄以一品大臣之尊，竟曾经朝拜之，她和其妹三仙姑行走时，皆有大批男子随侍保护，人民敬之为神。而对于红灯照女子，"人民皆焚香跪接，不敢仰视，称为仙姑，拳匪遇之，亦跪伏道旁"。

虽然她们的地位及权力异常地超出一般妇女，甚至更高于义和团中的男性，她们被尊敬甚至崇拜，并非是因为她们女人的身份，而是她们被视为"神"，她们是靠着宗教上的力量，被认为受到神明的附身，具有神性，因此能够得到甚高的地位，因此并不表示妇女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

仍存在的女性歧视

就整体上看来，义和团对于一般的女性是甚为鄙视的，他们认为妇女是污秽的，他们的法术常会因妇女的污物而被破，因此在他们的活动地区，经常禁止妇女出屋。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80%E6%9C%83

大刀会，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团体之一。俗名"金钟罩"亦名"仁义会"。采白莲教支派。其会员以农民为主，包括城乡手工业者，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商贩

等。会员遍布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

会内分坎门和离门两支。离门烧香念咒，不动刀枪；坎门除念咒外，还练习刀枪武功，设立坛场，传授徒弟，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其政治宗旨“以扫清灭洋为帜”经常发动暴乱反对教会。1896年6月，江苏砀山（今属安徽）大刀会首领庞盛选（庞三杰）向山东曹、单等县大刀会求援，以反扰教会。山东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即派彭桂林带领会众千余至砀山，焚毁刘堤头外国教堂。铜山（今属江苏）、丰县、萧县（今属安徽）及山东等地大刀会纷起响应反对教会，被清政府山东及江苏的驻军镇压。次年7月，砀山县大刀会众再次攻打教堂，铜山、丰县会众准备再次起事，旋遭镇压。同年山东大刀会在曹州杀死两名德国教士和众教民，引致德国出兵，清政府战败，割胶州湾。大刀会的反洋教暴乱，是早期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前驱之一。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88%80%E4%BC%9A

小刀会，是中国清朝的一个民间秘密组织，最早记载见于乾隆七年（1742年）。主要在江苏、安徽、福建、台湾等地活动。最初成立是一些平民自备小刀，以求互保，与反清复明无关。例如1783年，发生于台湾的林贵民变即与小刀会有关。道光三十年（1850年），陈庆真在厦门成立作为天地会的一个分支的小刀会，后传入上海等地。成员包括游民、农民、工人及商人。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三年）三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5月，福建

小刀会的首领黄威、黄德美等在海澄率众起义，攻克漳州、同安、厦门、漳浦，击毙清总兵曹三祝。在厦门建立了政权。黄威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名义宣布，在其占领区内免除苛捐杂税；并派人去联系太平天国，计划与之联合，但未成。起义随后遭到清兵反击。于十月十一日退出厦门，又经历了五年的游击战后最终失败。

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对外称为“义兴公司”）发动起义，计划和太平天国相会合。有广肇会馆领袖广东香山县人刘丽川、上海青浦人周立春、周秀英、福建人陈阿林等。起义队伍中，广东人近半数。起义队伍攻进了上海县城，杀死上海县知县袁祖德，释放狱囚，活捉苏松太道（上海道）道台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吴后来在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的帮助下逃脱）。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和周边嘉定、青浦等地，总部设在今上海城隍庙旁豫园内的点春堂。建立“大明国”，刘丽川自任“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后改名“太平天国”，并写信给洪秀全要求接受后者领导。

小刀会声明其目的是反清复明，并没有攻击租界或与洋人为敌；美国、英国、法国于是在小刀会和清廷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租界里的相对太平造成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之前外国人可以在租界居住、经商，但“外人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人”。由于小刀会运动，清政府失去了对租界的控制，外国人在租界内建造给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合法化，再加上太平天国使得江浙乡绅大量到上海逃难，租界内的洋人房地产商大量兴修出租住房和弄堂。由于这很快成了租界最主要的税收来源，租界当局对此鼓励。开始时主要是简易木板房，后来逐渐改成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建造起来的新式住宅：石库门建筑。石库门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独户建筑和西洋的排联式2-3层结构，一幢楼可供多户人家租用，被称作“老石库门”。后来又发展出几进庭院形式的“新石库门”。

+++
+++
+++
+++
+++
+++
++

____

中国的民间宗教特征以及与政府之间、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

【半宗教性质、半秘密社团性质、会道门组织、民间宗教团体、等等的起源、原因、机理】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以及明清时代的古代历史中，我们常常会看见，在中国民间会常有各种各样表现形式的、半宗教性质的、充满许多迷信和愚昧色彩的、半公开半秘密的、民间社团组织，或各种各样的会道门组织。例如，白莲教、罗教、天地会、洪门、青帮、红帮、拜上帝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小刀会、大刀会、义和团、红灯照、哥老会、一贯道、袍哥组织、香港三合会、等等。

在上述的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古代历史中的民间半宗教性质的、常常是神秘兮兮的、会道门组织中，除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是与基督教有关【洪秀全仅仅是道听途说地读到一本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而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一些一知半解、望文生义的印象，就没有再真诚谦卑地继续深入寻求下去，而是自己创立了所谓的拜上帝教，以耶稣为自己的兄弟，甚至还在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仪式，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耶稣，因为耶稣没有儿子】以外，其它的那些会道门组织基本上都与佛教和道教有很深的关系渊源。其中，更以佛教为主。不过，在上述的那些会道门组织中，除了早期的罗教似乎与佛教信仰相对而言稍微接近以外，其他的那些组织虽都是发源于佛教的影响，但却被主流佛教视为“外道”，甚至是邪教。

这些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有时，往往会发展得规模非常庞大、人数众多，甚至会对整个社会、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和动摇作用。在清朝中后期，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组织对于清朝政府与国家时局的打击都曾经非常巨大。

与白莲教的起义反叛相关的川楚之乱，使得嘉庆年间的清朝政府耗费巨额白银军费，并进而导致中国政府更加需要开源节流、减少因鸦片贸易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本来，清朝前半期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出口物资——（长期以来，中国以严禁外贸的强制手段，使得欧洲的、许多中国所没有的物资制品，例如航海造船、纺织、机械、印刷、棉布、农业等方面的商品，无法出口到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政府关心的，只是自己政权的稳定，而不是百姓的惠利；所以，虽然在中国有许多贫民区，有许多衣不蔽体而且时常面临饥饿的广大农村人口，虽然中国市场对那些外国廉价商品有巨

大的潜在性需求，但是，中国百姓根本无法在经贸中得到福祉）——使得中国长期享有大幅贸易顺差。源源不断的白银从西班牙在墨西哥等南美洲地方发现的银矿，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甚至导致中国国内市场通货膨胀。但是，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转为逆差，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从而给清朝政府骤然间增加了巨大的财务税收压力】。这种压力，使得道光皇帝痛下决心、要严禁鸦片、并与腐败的中国南方中下层政府斗争；从而，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而林则徐以生硬手法与英国外商与英方官员发生了激烈的军事性冲突，从而直接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中国政府从此被迫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大幕从此拉开。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中国数以千万计人口死于战火、生灵涂炭。

义和团运动屠杀了数以百计的西方在华宣教士、以及数以几万计的中国基督徒，更在慈禧太后以及清朝保守派高官们的支持和怂恿下，在清朝军队的枪炮帮助下，进攻北京的所有驻华使馆【慈禧太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所有西方各国宣战，并怂恿、许可义和团围攻并试图屠杀所有的外国驻华使团】，并从而直接地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朝政府不得不签订庚子合约、逞办毓贤等“战犯”、巨额赔偿各国。【而这又导致了后来俄罗斯赖在东北不走、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大战俄罗斯、又间接导致1930年代的中日冲突与日本全面侵华。而这又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因中国抗日战争而躲避了灭亡的命运，反而在抗日战争中以消极抗日、悄悄壮大自己、取得苏联援助的方式，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政权。从此，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制暴政铁拳统治之下，处于政治宣传、谎言欺骗、洗脑、心灵桎梏的状态之中，长达七十年之久，直至今日。】

清朝初期，天地会、洪门组织也曾经以非常隐秘的方式，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遍布非常广泛。

甚至，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年的那些会道门组织在香港、台湾都有着很多似隐似现的广泛影响。在香港，曾经与洪门颇有渊源、从中转化而来的三合会等组织，成为近现代香港有组织犯罪形式的主要团体，甚至基本上成为了香港黑社会的主体。在台湾，各种半黑社会组织、半民间宗教社团组织、会道门组织，在民主选举过程中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民进党与国民党争相拉拢的对象。

。。。。

若我们认真地追溯、研究和观察中国近现代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些半宗教性质的会道门组织，在中国的南方各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北方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以及华西、四川等地，时时非常盛行。有时，他们具有强烈的封建愚昧迷信的特征，敬拜许多光怪陆离的偶像，有许多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并具有隐秘的黑社会与社团组织色彩，有着各种金字塔式多层级组织机构的特点。

在它们的起源与成因中，往往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尤其是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佛教与道教文化【尤其是前者】中有着强烈的偶像崇拜形式与内容，因此，这就会很容易在民间成为上述会道门组织的借鉴。

佛教是一种脱胎于印度教的多神主义、泛神主义宗教信仰形式【详情请见《从金刚经说起》】。在佛教信仰中所敬拜、信仰的对象，并非是那样一位创造宇宙天地、赐予人生命的全能、全知、全在、无限智慧、公义圣洁的、无限伟大的造物主；而是，所谓的"万佛万神"。在佛教信仰中，一方面强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另一方面则有许多具体的、名目繁多的、甚至光怪陆离的偶像崇拜的信仰实践行为。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相关文字】

金刚经的主旨就是否定主义，甚至否定的否定主义。简言之就是，无论关于“相”、“非相”、还是关于“法”、“非法”，都不应当执著。

整个佛教思想的总结、内容要点、与根本原则：——佛教的核心，是以佛的教导、以人的悟道为主旨，以修行等为形式，以复杂的关于超自然领域的经书讲说为教义，以“苦”、“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等观念看待人生与世界的本质，以寺庙中许多佛像等为偶像的敬拜对象，等等，——这样的一种结合民间迷信文化传统，与繁杂经书咒语教义等为内容的宗教。

金刚经所述的这种否定主义哲学，正是佛教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并成为佛教教义的最根本原则。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如果说，佛教在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历史中的流行，有什么重要原因，那么，佛教的关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这样的教导，是值得肯定的。

这样的教导，使得人自己至少能够尽量在外在行为层面、在社会层面，不做那些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坏事，或使得人在自己做坏事之前，至少有一定程度上的约束。

然而，以金刚经为核心教义之一的佛教，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方面是错误的；仅举以下几例。

空：从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为入手处，把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实际性在根本上彻底否定掉。

苦：人生命的本质是苦的，是应当摒弃、看破、舍得的。没有看到人生命价值本身的可贵性、高贵性。没有看到人生命价值的真正积极意义。因而，无法有正面的、积极的、热忱的信仰与意义。

罪：没有看到罪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没有针对罪的坚决的、终极性质的斗争。

偶：在信仰实践中，偶像泛滥，对那些人手所作的金像、银像、石像、木像、等等顶礼膜拜，用那些又聋又哑的偶像，取代了全知、全能、全在的永生之神。

悟：佛教强调人的“悟”道；人在信仰中所得到的功德、利益、智慧，等等，是出于人自己的“悟”、“智慧”等等优点、优势、好处；因而，在佛教的信仰中，虽然也看似要人谦卑，但实际上，人却会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最骄傲的人。

修：佛教所强调的“修行”，也会导致与上面相同的一个事实上的结果，就是，那些所谓的有道高僧，却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成了以自己为义的、自高骄傲之人。

义：在佛教教义中，并没有关于正义、真理、公义等概念的终极源泉的阐述。换言之，在佛教中，关于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义、什么是

不义，道德法则的根本基础、来源、根基在于什么，等等这些，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

冗：在佛教经书中，对于超自然的世界，有许多冗长的、细节性的、“活灵活现”的描述。但是，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出于人自己的主观臆想吗？谁又能真正凭着什么合理的证据和根据，而显明那些事情的真实客观性呢？

什么是区别善与恶的标准：——只有在以上天、上帝、造物主为中心的信仰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区别善与恶的根本标准所在。那永生之神自己是道德法则的颁布者，是道德品质行为的终极审判者。上天把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的根本观念放置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并必将终极而公义地审判世上一切的世人。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罪人必将要承受永远的、公义而圣洁的、终极的惩罚。

行善与积德；行善是为了什么：——固然，我们应当在这个世上尽力行一切良善之事；然而，我们行善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一颗良善的心吗？所谓良善，绝非仅仅是看我们的行为如何，而更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行善如果是为了自己积德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自己益处的目的，那么，我们的所谓行善，就并非真的是良善的。

佛教思想的虚无、虚幻元素：——佛教中，把世事、人生等等的本质都看为是虚空、虚无、虚幻的。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正是由于，佛教思想和教义在本质层面而言，是一种泛神主义哲学。这正是佛教思想之错。

正是因为佛教不是以那上天、上帝、造物主为中心，所以，佛教看不见这个

世界是出于那位至善至美、永生之神的创造，更看不见：——我们人的生命是按着造物主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我们才有生命、灵魂、心灵、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

泛神主义——佛教思想之锚：在佛教与泛神主义中，世界的本源，或许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机缘、因果、轮回、佛法，等等，但是，那个本源却是没有位格的，即，那个本源并没有一个“自我”的身份，也更没有一个至善至美、全能的、全知的自由意志。

简言之，在泛神主义者看来，世界的背后，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造物主；世界本身就是神，或世界本身就是自我存在的，或世界本身就是虚空的，等等；主宰世界的，并非是一个有位格的、有无限智慧、能力、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的永生之神，而是一个无知无觉的力量、因果、理、等等。

。。。。。。。。。。。。。。。。。。。。。。。。。。。。。。。。
。。。。。。。。。。。。。。。。。。。。。。。。。。。。。。。。
。。。。。。。。。。。。。。。。。。。。。。。。。。。。。。。。
。。。。。。。。。。。。。。。。。。。。。。。。。。。。。。。。
。。。。。。。。。。。。。。。。。。。。。。。。。。。。。。。。
。。。。。。。。。

第十二品 尊重正教分

原文：

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

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译文：

“还有，须菩提，随时随地只要一宣说此经，那怕只说四句偈语，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包括天、人、阿修罗等，都应供养，好像佛的塔庙所在地那样。更何况有人完全能够受持、读诵。须菩提，你应当知道，此人已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所以这本金刚经的所在地方，等于有佛在那里，我们对修持读诵金刚经的人，要像尊重佛弟子一样。 ”

（第一部分）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佛教中的神与人：——在佛教中，并非是简单的天国、世界、与地狱，而是有非常复杂、甚至冗繁的关于超自然领域的讲述。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冗繁的关于超自然领域的讲述，都仅仅是佛经的一面之词而已，既没有历史的见证和旁征，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根据。那么，谁又能真的知道佛经中所记述的那些事情是真的、而不是出于人自己的主观臆想呢？甚至，佛经自身的历史真实性都无法考证。今天，世人已经根本不能找到那些佛经的印度梵文原本。而且，印度文化本身就是没有详实历史记录的，这完全不同于中国或西方等文明体系中详实历史记录的境况。从历史考据以及内容证据上，佛经与圣经完全不同：——前者没有证据，完全是一面之词；后者不但有详实的历史真实性的考据，而且有逻辑结构完整的神学与教义体系。

佛教中讲述的神，与那创造天地、宇宙以及其中万有的全能之神，那创造人生命的主、那全知、全在、全能、全备的、无限圣洁、至善至美的永生之神，——完全是两码事。佛教中所讲述的神（以及许许多多各种类似名义的、超自然领域中的、存在者、存在体），都不过是一些能力有限、品德有限、智慧有限、所知有限的存在者。究其本质而言，佛教中不但没有那位全能的造物主，而且是坚决反对造物主之存在性的。在佛教的教义中，甚至佛自己也不是那生命之主，而仅仅是一个觉悟者而已。他既不能救人，也不能掌控人生，而仅仅是能够把自己的觉悟告诉人，让人自己去领悟、觉悟、看破世事而已。

因此，若有人说佛是大有能力的救主，那就是错的，是违背佛教教义的。与其说佛是神，不如说佛是一个老师。这是因为，在佛教中所提出的人生观教义，主张认为，人生的问题就本质而言，不是由于人的罪（即，人在良善与罪恶之间拣选了罪恶），而是由于人的无知（即，如果人知道了更多的道理，那么，就会向善、成佛）。所以，佛教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正如金刚经一书所强调的，要悟透世事的虚无性，要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相。

但是，世人犯罪，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呢？说谎的人，难道不知道说谎是错的吗？偷窃、抢夺、劫掠、凶杀、奸淫、放荡、贪婪的人，哪一个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是罪恶的、而才去做那些事情的呢？哪一个不是因为自己心中先有了罪恶的心思意念，而去做那些罪恶之事的呢？人的罪，不是发源于他的头脑、或是由于他的无知，而是发源于他的心灵，是由于他主动地、故意地、或明知错误地，去做那些违背他良心、良知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那位终极的全能者，那位伟大的上天、造物主、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

真正的信仰，不是彻底地消灭、否定“我”，而是要彻底地消灭、否定“罪”。生命本身本应当是美好的，因为那是出于造物主的创造；我们所应当否定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罪的本质、性质、根源与言行。

佛教中的地狱、天界与人界：

——在佛教中的地狱，并非是像基督教信仰中所讲述的地狱那样。圣经中对于地狱的描写仅仅是：“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是刚硬顽梗之罪人所将要受到的永远刑罚之地。圣经中并没有按照人的臆想、想象，去刻意地详细描画地狱的可怕景象，而是，坚定地、毫不动摇地指出了，罪人所将要受到之审判与惩罚的终极性、永远性。

相比之下，佛教中关于地狱有许多绘声绘色、大量细节性的、令人震惊的描写。这些细节的描写，看起来极其恐怖，然而，却往往仅是为了震慑生活在此生中的世人们，因而其内容也是针对此世之人的头脑中的知识与思维习惯。

但是，佛教中的地狱，并非是对于罪人的永远的刑罚之地，而不过是一个临时拘押与酷刑的场所；进入地狱的人，还可以再出来，甚至还能够再成为佛。从圣经与佛经的对比中，或许，我们能够看出，哪一个是出于人自己的臆想与猜测。

这也难怪，在佛教影响下的文明体系中，并没有对于罪的真正畏惧，以至于，在中国古代的刑场上，即将被行刑的罪犯会在死前叫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在世人的心中，存着极深的罪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在佛教地狱的面前，世人仍然想要顽梗地生活在罪中，而没有真正悔改的心。

在佛教中关于天界、净土等等各种名义的超自然领域的讲述中，也与圣经中所讲述的天国在本质上不同。基督教信仰中的天国，是上帝的国度、永生的国度，是无限美好、幸福、永远的国度。但佛教中的各种天界，也是一些非永恒的、非终极的场所。虽然佛经中有许多冗繁的相关叙述，但是，那些都不是指向终极、永恒、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天上国度。

在佛教看来，无论是地狱、还是天界、人界，无论是客观物质世界还是超自然领域，都不过是一些形式、表象，都是虚浮、虚空、虚幻、虚无的，都是应当在终极层面被否定的。因此，佛教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冗长的、繁琐的、绘声绘色的相关超自然描述，但却都看起来与虚构小说无异。在佛教中，那些超自然境界，并不是人生的美好而终极的、无限幸福的归宿；就其最好的程度而言，也仅仅是一些比较好的暂时居所而已。

在佛教中的最终理想境界，是寂灭、涅磐，是不生不灭，是彻底地消失"我"，融入到那永恒的、无知无觉的、浑然的涅磐（涅磐的意思就是寂灭）状态之中。

佛教中的神，与其他宗教中的神（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世人心中的"上天"、生命之主，等等的区别：——佛教中的神，是多神主义的、出于人主观臆想的各种神灵、偶像、超自然能力者，而不是世人心中的"上天"、"老天爷"、"上苍"，更不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主宰一切、创造世人生命的生命之主、全能无限的永生之神。

基督教中的上帝，与伊斯兰教中的真主，都是指的是那位造物主、无限全能

的生命之主、永生之神。两者的区别是，在基督教信仰中，那位全能的上帝，不仅是公义圣洁的、而且是慈爱恩典的，甚至以牺牲的爱，来爱我们，为我们尝清罪债，把救恩赐给每一个愿意寻求他、信靠他、相信和接受他救恩的、愿意真心承认和悔改己罪的罪人。而在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却是只能远远地顶礼膜拜，而不能亲近的神。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一种有着许多繁文缛节的仪式礼节、规条、形式等等的、因人行为称义的宗教信仰。因而，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的人们，虽然憎恨罪，但却往往缺少对于罪人的饶恕与爱。并且，笃信伊斯兰教的人们，往往像圣经福音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以自己为义，在心中自高、傲慢，实际上在内心深处远离那真正圣洁而恩典的神。

多神主义与泛神主义的异同：——多神主义是指，在一个宗教信仰体系中，有许多个神灵；并且，这些神灵之间往往互相争斗、或是各司其职、各管一摊、各掌控人生与社会中的不同方面。比如，有的神灵管人间的灶台，有的神灵管人间的财务，有的神灵管人间的寿数，有的神灵管人间的恋爱嫁娶，有的神灵专长于保佑妇女生子，有的神灵专长于保佑年轻人读书、考学，等等。显然，这些多神主义的观念是错误而荒谬的，是出于人的主观臆想，是经不起认真而严肃的理性与哲学的推敲的。那超自然的世界，如果是真实的，难道就是如同此世人间的翻版吗？那些神灵们，难道就仅仅是像地上的各级政府部门一样，庸俗不堪、甚至彼此争风吃醋吗？在多神主义的信仰中，各种神灵看似繁多，但是，每一个神灵却都是能力有限、品格有限、道德有限、智慧有限的。它们与无限全能的上帝是多么不同！

泛神主义则是以一种更加泛化的、飘渺的观念来看待人生、世界、道德与价值。在泛神主义者的眼中，这个世界并非是被那样一位有着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全能之神、公义圣洁的超然主宰者所创造出来的。而是，泛神主义认

为，这个世界或者本身就是自我存在的，所以这个世界自己就是神；或者，在这个世界之上，是被一种没有位格、没有自我认知、没有自由意志的，无知无觉的，神秘的，力量、能量、能力、规律、因果、轮回、报应、"法"、"道"、等等非位格性的所谓"神"所掌控的。因此，在泛神论主义者与无神论主义者之间，常常仅仅隔着很薄弱的一层分界线。

在泛神主义者的眼中，这个世界往往是虚无、虚幻、虚浮、虚空的，甚至连人自己的生命也是虚无、虚幻、虚浮、虚空的。这种负面主义、否定主义、消极主义的观念，正是由于，在泛神主义观念中，没有那样一位终极的创造者、掌管者、审判者、祝福者；因此，泛神主义看不见世界的恢弘、浩大、瑰丽、奇妙、秩序、意义，也看不见人自己生命的珍贵、隽永、伟大与积极的意义。泛神主义的信仰往往是冷漠、冷淡、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反对执著、缺乏热忱的。

真正的信仰应当是什么【引述基督教护教学书籍】：——真正的信仰，一定是针对那位宇宙天地之主的，一定是以那造物主为中心的。【引述马太亨利序言第一段】

（第二部分）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佛教所信仰的对象，不是上帝、不是神，甚至不是佛（佛仅是觉悟者，是导师、教导者，但却不是所信仰的、终极的对象）。

所谓信仰的对象，是什么意思（终极地倚靠的目标与对象）：——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生命与信仰的根基、基础呢？那根基与基础，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佛教所信仰的对象，是彻悟的智慧（以否定主义为核心，甚至否定这种否定的观念本身）。佛教中所要否认的，就是任何根基与基础。在佛教中，对于一切万事万物万象、甚至人自身生命真实性与意义的否定，正是被看作是这"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这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就是本经书的主旨；但是，这主旨不过是否定一切、拆毁一切的立场。

然而，人在自己的主观意念和臆想中的否定一切、拆毁一切，就真的能够在客观事实中，达到彻悟、否定、拆毁的结果吗？

——这就像是一个人掩耳盗铃一样，难道真的堵上自己的耳朵，主观地认为那声音就不存在，那么，客观世界里面的铃声就真的不存在了吗？任何一个有理性、诚实、谦卑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知道并承认这个问题的答案。

客观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无的，正如我们自己的生命、言语、心思意念、思想、意识、意志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无的。

不但如此，客观世界是有意义的，而我们的生命也更是有意义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不朽的灵魂。我们本应是造物主、上天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本应当指向那永恒的天上国度。在那里，我们的生命中的"我"不是要消失，而是要成为圣洁、无瑕疵。我们的记忆、情感、心志、心思意念，不是要消失，

而是成为高尚、隽永与圣洁。

真理、信仰，与主观臆想、一厢情愿的区别是什么？

真正的真理、信仰，一定是针对人生命中的罪，而不是针对生命本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消灭罪人、而是要拯救罪人。因此，圣经中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也不吹灭。"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救赎与恩典；这生命绝非虚无，而是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世上的许多宗教信仰体系，在出于人意的主观臆想中，往往忽视人自身生命的独特可贵价值。在世人的观念中，人与牲畜甚至蝼蚁，往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宝贵的，而且是被上帝所珍视的，因为我们世人的生命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并且，世人之间本应当同为兄弟姐妹。在这个世界上的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只有基督教信仰是如此阐述人与上天、那公义全能之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

什么是真正的谦卑？至少有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认真思考观察与查考，而不是掩耳盗铃、闭眼不看。

事实上，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并谦卑地放下自己的身段，放弃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想，从客观现象、数据、观察、实验入手，来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掩耳盗铃、或闭眼不看，——这正是四百年前现

代科学开启者们的关键突破口。这也正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信仰为土壤的文明体系中诞生、壮大起来的。

在十六世纪以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前，在圣经被大规模翻译和推广以前，欧洲虽然是有罗马教宗体制的天主教信仰体系，但是，当时人们却普遍地并没有深刻地研读和明白圣经中所教导的内容。天主教体系下的世界观、自然观，仍然是以距今两千多年前、基督教之前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等人的世界观为主体；那是一种主观臆想的世界观体系，比如，相信世界的本源是金、木、等五个元素以及以太等等。

现代科学的开启，在哲学的层面上，归因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例如牛顿、培根、波义耳等等无数现代科学鼻祖们），笃信这个世界是被那样一位伟大、全能的造物主所创造的，因此，宇宙自然中存在着普遍的、一致的、秩序的、并且能够被人所研究和理解的规律（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所创造的）。第二，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相信，认识这个物质世界规律的唯一途径，是从客观的观察开始，是从归纳法体系开始，而不是从主观臆想、罔顾事实根据、闭门造车、人为的、理念系统开始。

大自然世界本身，是上帝对于人的普遍启示的一部分。人只有认真谦卑地仔细聆听、观察、查考，才能够看见和明白真理。

在自然科学中尚且如此，那么，在信仰真理上，岂不是更应当如此吗？信仰的真理，一定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而不是来自于人自己的、没有事实根据的、闭门造车、主观臆想。

若上帝愿意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那么，上帝也一定会把他的启示的证据向我们显明，使任何人都无可推诿，并使任何诚实谦卑的人，都能够欢欣地、敞开心扉地，相信和接受他的启示。

这样的证据，包括神迹与预言；前者是超自然的事件，没有世人能够做成；后者是超自然的预知，也没有人能够事先知道。从圣经的神圣历史中，从圣经新旧约全书中，我们看见无数这样的神迹与预言。这些事情，都是斩钉截铁、毋庸置疑的。这些事情，不是博人眼球、哗众取宠，不是零散、琐碎的；而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与佛经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有着保存完整的原文版本，有着详实的、海量细节的历史记录、历史文献、历史见证；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证据与真实性证据；而后者却根本没有。（关于圣经等相关方面的详情，读者可以参考作者翻译的《基督教的证据》《为基督教信仰之真实性而辩护》《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系列书籍）。

（第三部分）经与佛

此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佛是什么：——佛是一位名叫释迦摩尼的这样一个悟道者、觉悟者、智慧者。他把关于因果轮回、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等等佛经教义，传递给后世。并且，他声称，人应当看透万事、悟道、成佛，这样才能够进入涅磐、寂灭、幸福之地。

佛的超自然性，以及我们的超自然性：——佛声称，他具有超自然性。在佛教的信仰中，佛常常是信众所祷告的对象。佛教徒们常常祈求佛保佑人们免于瘟疫、疾病、患难，并能够生活平安、顺利等等。佛也声称，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成佛，也都能够具有超自然性。佛的目的，就是要度灭我们，让我们脱离人生苦海，到达悟道彼岸。佛对我们的帮助，就是把金刚经这样的经书、教义教导给我们，使我们也都信从其中的理念、教义。而金刚经的核心理念、教义，就是什么理念和教义都没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佛经是佛的教导、话语；此经在，就如同佛在一样。佛是老师，是先导，然而，我们真正所应当信仰的对象，是什么：——根据佛的说法，就是什么信仰的对象都不要有，甚至如来自己，都不是真的有，而仅仅名为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但是，人生的问题，究竟是在于我们没有知识与智慧、失去了良知（因而需要智慧与彻悟），还是在于我们违背了良知（因而需要悔改与生命更新）？

——事实是，人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是因无知、缺少智慧、缺少所谓的彻悟而犯罪，而是因为，我们知法犯法、知罪犯罪。罪，是我们拣选的结果。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严格意义上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所作的事情，那么，罪也就无所谓罪，道德也就无所谓道德。这正如，一个人的呼吸，不是罪恶，也不是高尚。

自由是道德的必需。

信仰的目标，是使我们明白更多的智慧，还是使我们离弃罪恶、归向圣洁的生命之主？

——正如圣经所说：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人的知识与智慧，必须要有一个坚固、坚实的基础、锚。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知道、并相信，那是真理？上帝把浩瀚的宇宙自然摆在我们面前，把许许多多的知识、智慧与法则教导我们；然而，最重要的是，上帝公义地要求我们，应当归向他，遵从他的圣洁道德法则。什么是善？遵从神就是善。什么是恶，背离神就是恶。分别善恶的基础，正是在于那良善的源头，上帝自己。因此，只有当我们的心中真正地敬畏他，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智慧。否则，即使我们的头脑中装着再多的死知识，我们的心灵仍然是愚顽的。

人作恶，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吗？人作恶，是他们无知的结果，还是他们抉择的结果？

——人所作的事情，之所以是恶的，正是因为，人明知道那是错的，例如，撒谎、背信、欺侮、不公、抢劫、偷窃、淫荡、背叛、等等，但却仍然那么去做。

罪的本质：——正是在于，人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以自己为分别善恶的终极

标准。因此，世人才常常是自私、自利、自义、自傲的。人的罪，不是因为“我”的真实性；——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本是真实的、宝贵的，而不是虚幻、虚无、虚空的。人的罪，是因为人不恰当的自爱，以至于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而离弃、悖逆了那创造他生命的主。

良善的本质：——正是在于，人对于造物主、上天的敬拜、谦卑、顺服。只有当一个人在心中敬畏神、热忱地敬拜他、热爱他、遵从上帝，这样的人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以谦卑、温柔、怜恤、饶恕、热忱的心，去爱一切世人。

罪恶与良善之间的本质区别：——正是在于，人在内心深处，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信仰、道德与价值观念。究其根本，是人在内心深处如何看待自己与造物主、那位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关系。如果人把自己看作是天父的儿女，愿意寻求那真理之神，渴慕他的公义，祈求他的恩慈，那么，他就会离弃罪恶、远离罪恶。如果人把自己看作是生活中一切事情的根本，那么，他就会以属世的、属肉体血气的利益为归依，离弃神，沉溺在罪恶之中。

凭什么，我们可以说一件事情是善、或是恶呢？是凭着知识、还是凭着权柄？善与恶之间的区别，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在于什么？

——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并创造了世人的生命。上帝把道德的律法放置在世人的良心之中。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他所创造的，是他伟大的创造之工的结果。他赐予了我们思想、意识、意志的能力，并以他的恩典和慈爱来对待我们；而且，他公义地要求我们，应当以我们的生命来归向他、热爱他、敬畏他。我们对他的敬畏，一个根本的表现就是在于，我们应当以他为分别

善恶的终极标准，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分别善恶的终极标准。我们必须应当承认，只有他才是那良善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善与恶之间的区别，究其终极意义而言，在于是遵从神、还是背离神。分别善恶的权柄，在于神自己。遵从神的，就是善。悖逆神的道德法则的，就是恶。

对于一个信仰体系来说，有没有造物主（全能的主宰者、生命之主，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永生之神，上天、上帝），会导致教义内容在关于上述各项问题之答案的本质不同。若没有造物主，教义中就会贬低生命、人生、良知的意义和价值，并忽视人心中的悖逆、拣选罪恶等等，而强调人的无知、需要智慧、需要知识与彻悟等等。

简而言之，人的问题，人生命中的匮乏，是出于无辜、无知，还是出于拣选、抉择？人能够自辞其咎、为自己的罪恶欺谎而寻找借口吗？

——我们的回答是，人的罪，无可辞咎；人的罪，并非是因为无知，而恰恰是因为，人虽然在良知里明知道那公义的道德法则，却仍然悖逆犯罪。人头脑中的那些主观臆想或故作高深的哲学知识、所谓智慧、彻悟等等，并不能救赎人。人只有彻底地承认自己生命中的罪性，从罪中谦卑悔改，不再自以为义，才有可能看见上帝的救恩，相信和接受上帝的救赎恩典，回到神的面前。

。。。。。。。。。。。。。。。。。。。。。。。。。。。。。。。。

。。。。。。。。。。。。。。。。。。。。。。。。。。。。。。。。

。。。。。。。。。。。。。。。。。。。。。。。。。。。。。。。。

。。。。。。。。。。。。。。。。。。。。。。。。。。。。。。。。
。。。。。。。。。。。。。。。。。。。。。。。。。。。。。。。。
。。。。。。。。

。。。。。。。。。。。。。。。。。。。。。。。。。。。。。。。。。
。。。。。。。。。。。。。。。。。。。。。。。。。。。。。。。。。
。。。。。。。。。。。。。。。。。。。。。。。。。。。。。。。。。
。。。。。。。。。。。。。。。。。。。。。。。。。。。。。。。。。
。。。。。。。。。。。。。。。。。。。。。。。。。。。。。。。。。
。。。。。。。。。。。。。。。。。。。。。。。。。。。。。。。。。
。。。。。。。。。。。。。。。。。。。。。。。。。。。。。。。。。
。。。。。。。。。。。。。。。。。。。。。。。。。。。。。。。。。
。。。。。。。。。。。。。。。。。。。。。。。。。。。。。。。。。
。。。

第十四品 离相寂灭分

原文：

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即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

诸相，即名诸佛。」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译文：

这时，须菩提听佛演说此经，深切明了此中义理，悲伤地流下眼泪，而对佛说："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自从我证得照见一切众生根性的慧眼以来，没有听说过像这样的经典。世尊，如果有人能够听到这部经，信心清净，就发现了无上正等正觉心的真实现象，当知这种人成就了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无上正等正觉心的真实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什么相，所以如来说，只是名叫做实相。世尊，我现在能够听到这样的经典，信解受持，并不为难。如果当来世后五百岁，有众生能够听到此经，就信解受持，这种人就是第一希有。为什么呢？这种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为什么这

样说呢？我相就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非相’。为什么呢？既然我人众生寿者相是‘非相’，离一切诸相就名为诸佛。”

佛告诉须菩提：“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如果有人能够听到此经，不惊讶、不恐怖、不畏惧，当知这种人很希有。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来所说最希有无上的般若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只是名叫做第一波罗蜜。须菩提，以实践忍辱之行，到达不生不灭境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只是名叫做忍辱波罗蜜。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果有我人众生寿者相，就不能名叫忍辱波罗蜜。为什么呢？比如以前，歌利王割宰我的身体，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为什么呢？因为我被歌利王节节支解时，如果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会生起嗔恨心。

须菩提，又念过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在那些时候，我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所以，须菩提，菩萨应当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说真诚话，说实在话，说如实如理的话，不说诳骗话，不说怪异话的。须菩提，如来所证得的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如果菩萨的心住于法，染著法相而行布施，如人走入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如果菩萨的心里不住法而行布施，好比人有眼睛，日光明照，可以看到种种的色相。须菩提，未来世，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如来以佛的智慧，清楚地知道这种人，清楚地看见这种人，都可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第一部分）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怎样才能生实相？根据这里的内容，就是明白了这部金刚经，并有不疑惑的、没有杂念的、清净的信心。

这实相是什么？就是明白，根本不是什么相，也根本没有什么相；只是名义上称为“实相”而已。

根据这里的内容，这样的实相，这样的明白，是成就了第一的、希有的、功德。

然而，真的如此吗？

难道人智慧最高的境界，就是认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智慧，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根本没有什么物质、机理、概念、法则，根本没有什么表象，甚至根本没有生命、心灵和灵魂吗？这的确是最彻底的否定主义；但是，这样的否定主义观念哲学，虽然看似高深，却是没有全面而确定的证据的；它更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验、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及我们对于内在心灵的体验、先天性的直觉、感知、知道，所针锋相对、相矛盾的。

这样的“信心”，的确“希有”、的确“第一”；但是它真的是正确的吗？它真的会与“功德”有什么关系吗？

是的，无可否认的是，佛教思想的确能够使人在品行中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内涵。这是因为，佛教教导人，不要去执著于日常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勾心斗角、自私自利。的确，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自私、贪婪、淫欲、以及许

许多多的罪恶。佛教正确地教导人们，应当摒弃、远离那些自私自利、纵情于肉体血气的罪恶。但是，如果把这个世界比喻为充满了肮脏洗澡水的洗澡盆，那么，佛教所推崇的，就是把这个洗澡盆中的脏水倒空；遗憾的是，在洗澡盆中洗澡的孩子也被倒出去了。

那个"被倒掉的"珍贵的孩子，就仿佛是我们生命本身的可贵，以及这个世界的无价、真实与美丽。

【引述 这是天父世界 的歌词】

这是天父世界

一

这是天父世界，

我要侧耳要听，

字宙歌唱，四围响应，

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

述说天父全能。

二

这是天父世界，

小鸟展翅飞鸣，

清晨明亮，好花美丽，

证明天理精深。

这是天父世界，

他爱普及万千；

风吹之草将他表现，

天父充满世间。

三

这是天父世界，

求主叫我不忘：

罪恶虽然好像得胜，

天父却仍掌管。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作王，天地同唱，

歌声充满万方。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And to my listening ears

All nature sings and round me ring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rest me in the thought

Of rocks and trees

Of skies and seas

His hands the wonders rod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The birds there carols raise

The morning light the lilliy white

Declare their maker's praise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He shines in all thats fare

In rustling grass I hear him pass

He speaks to me everywhere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And to my listening ears

All nature sings and round me ring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

【引述 圣经 诗篇19篇】

19:1（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19:2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19:3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19:4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19:5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19:6 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19:7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19:8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19:9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19:10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19:11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19:12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

的过错。
19:13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19:14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阿，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第二部分）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

在佛的教导中，一切相，包括我、人、众生、寿者相，都是非相；这一切诸相，都应当是被离弃的；都不应当执著于其中。

我本身，我的心灵、头脑、思想、生命、灵魂，都是不存在的；我都要从中解脱。

人也是如此。众生都是如此。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戏，是虚幻的表演，既没有真情实感，也没有真实而隽永的意义；一切都是因果、轮回而已；人只有看透了这些、彻悟了这些（甚至认识到，连自己的“我”，都不是实相；根本没有任何相，是实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实相；所谓实相，就是非相），才能够真正地解脱，进入涅盘与寂灭。然而，世人就这样沉浸在贪嗔痴慢疑之中。

========

这样的说法、理念是对的吗？它之所以有吸引人的力量和效果，是因为它看似有正确的成分。的确，世上与人生之中，风云变化、世事无常、人生无常，我们又能够把握什么、倚靠什么、信赖什么呢？无论是家人、亲情、友情，还是社会、国家、世界，又有什么有着恒常而隽永的意义呢？一切都要归于无有，一切都终有一死。

然而，从上述论点中，我们若得出所谓的"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那么，显然，这是欠缺了审慎思考的结果。

正如，人不可因噎废食，也不可因挫败而颓废，不可因失败而毁灭，不可因恨恶罪而憎恨罪人（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应当爱罪人）；我们更不可因世事人生的不如意、看似无常变幻，而就误认为：世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是应当被离弃的。

所谓佛法，虽然看似高深，一言以蔽之，却是一种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出去的思想；其中的思索与论理，是不谨慎、甚至是粗糙的。

（第三部分）不惊、不怖、不畏

佛告诉须菩提："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如果有人能够听到此经，不惊讶、不恐怖、不畏惧，当知这种人很希有。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来所说最希有无上的般若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只是名叫做第一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

是名第一波罗蜜。

========

对于这样决绝的、负面的（甚至"负面"本身也被否定）、否定主义的哲学与思想观念，我们的态度应是什么？我们应当惊讶、恐怖、畏惧吗？

我们不必畏惧、也不必惊讶、更不必恐怖，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否定主义哲学与思想观念，是泛神主义者的必然思想产物。

为什么这么说？——

在任何信仰、思想、哲学、理念体系中，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甚至必须聚焦于，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深刻观念问题：

我们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观）
我们人生的本质、意义、价值、归依、内涵等等是什么？（人生观）
道德本质、来源、内容、价值、权柄、范围、深度、广度等等是什么？（道德观）
一切万事万物，以及一切社会与人生，究其本质与终极的层面而言，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价值？什么样的价值？谁来评判？权柄的来源是什么？（价值观）
信仰是什么？信仰的目的、目标、内容、影响、动机等等，应当是什么？（信仰观）

========

在泛神主义者（即，他们虽然承认并追求超自然的事物、价值与意义，但

是，却不承认、不相信在这宇宙世界之上，有那样一位全能的、终极的、无限的、智慧、圣洁的造物主）的眼中，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从根本性的角度而言，都一定会是消极、否定、以虚无主义或否定主义为特征的。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那创造生命之主、无限全能之上帝以外，人能够到哪里去寻求终极的、真正的、积极的、热忱的、恒常的、隽永的意义呢？

泛神主义的弊端：——看不到那创造宇宙世界、创造生命、掌管万有的全能的造物主。

虚无主义的弊端：——看不到世事与人生之中的积极、隽永、通向永恒的价值与意义。

否定主义的弊端：——把人生的问题，归因于生命的存在性本身；把世界的问题，归因于世界的存在性本身；把一切问题，归因于问题的存在性本身；——可是，难道医治病人的方法，就是要把病人杀死、消灭吗？

（第四部分）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关于忍辱的智慧与哲学：——面对世事与艰难，我们的确应当忍耐。然而，我们忍耐的原因、基石、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当忍耐，尤其是忍耐羞辱、苦难、逼迫、迫害等等？

苦难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苦难？

在忍耐哲学中，为什么会有智慧？

——的确，当身处患难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放弃盼望；在指望中，应当不忘记喜乐。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倚靠的终极对象真正是什么，我们的盼望的终极目标真正在于何处，——我们才能够有勇气、有力量、有智慧，以坚韧不拔、忍耐的心，度过眼前的患难与困境。

我们所倚靠的终极对象，是造物主自己。我们的盼望的终极目标，是属天的、上帝的国度。天地都将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话语却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

我们在忍耐中所倚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与智慧，而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力量与智慧。我们所仰仗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可以胜过死亡、痛苦与患难。我们所仰赖的，是上帝的救赎恩典。

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它；那能把身体与灵魂都投在地狱里的，你正要怕他。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对于上帝的敬畏，那么，就不必畏惧任何受造之物。

（第五部分）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

应当如何对待罪：——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当我面对罪人的残酷与罪恶的时候，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应当报仇雪恨？还是应当忍辱负重、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为自己申冤，一切听凭主怒，因为主说：申冤在我，复仇在我。圣经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5章38-48节】

然而请注意，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不能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而自卫；或是，当别人的生命受到他人迫害的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为了帮助保护他们的生命而见义勇为、与罪恶之人斗争。

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爱罪人，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应当爱罪人的罪，或是对于罪人的罪就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进行属灵的争战。我们争战的对象，就是罪人的罪，也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罪。

面对苦难、侮辱、迫害的忍耐：——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忍耐，是因为我们在心中所倚靠的，不是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而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生命的永生之神自己。

然而，我们却不是像佛教所教导的这样，对于罪人之罪恶的忍耐，仅仅是凭着内心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的阿Q式自我安慰的心理方法。

面对别人的罪恶、面对苦难，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种无视罪恶、无视罪人之罪的立场，不仅是无益的，而且还会纵容罪人更加刚硬顽梗地、有恃无恐地、沉浸在自己的罪恶行为，更不知畏惧与悔改。

罪、以及刚硬顽梗的罪人，将要面临什么：——任何罪人，若一直刚硬顽梗、而不悔改、寻求神、归向神、渴慕神的公义、圣洁、恩慈、救赎，那么，就必将面临那永生而全能之神的、终极而圣洁公义的、审判与永远的惩罚。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地狱永刑，绝非佛教中所说的暂时拘押犯人、给犯人施以酷刑的恐怖场所，而是那永生的上帝对于罪人与撒旦的永恒惩罚之地。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那里，罪人必将永远地哀哭切齿。

什么是公义：——只有一位是公义、良善的，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的、无限智慧的、圣洁的、上天、上帝、造物主。世人只有在那永生之神那里，才能寻找到公义与圣洁。只有他，才是良善的源头。

泛神主义者的观念中，由于没有这样一位无限圣洁与公义的、全能的造物主，所以，泛神主义者在面临罪恶的时候，或是拍案而起、"替天行道"、为己复仇；或是像金刚经这里一样，用"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来化解、看空、无视：——罪恶，以及罪恶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应当恨吗？应当恨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应当爱罪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圣经也告诉我们，不

可含怒到日落。但是，圣经并没有对我们说，“恨”本身是不对的；圣经也没有说，“怒”本身是错误的。事实上，上帝自己正是如此。

一方面，他爱我们每一个罪人，甚至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清罪债，使我们每一个愿意谦卑地、真心地承认和悔改己罪、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人，能够得到赦罪、永生，并进入那永远的、无限美好的天国，与上帝永远地同在。上帝爱我们；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

另一方面，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他憎恨罪人的罪。罪，就像是污秽之物一样，就像是大麻风病人的麻风病一样，是可憎的，是令人生恨、令人厌烦的。

因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憎恨罪，但却爱罪人。我们应当以我们的生命而进行那属灵的争战；我们争战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骨肉同胞，不是任何世人；而是，我们应当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罪恶言行、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罪，为我们争战的敌人。我们应当恨恶罪、除灭罪、离弃罪。我们的属灵争战，必须是要紧紧地倚靠我们的救主、永生的神。

是什么使我们有勇气面对罪恶、忍耐罪恶？

——在罪恶、患难、困苦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勇气直面它们，能够有勇气和毅力忍受罪恶与患难，是因为，我们心中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之上，究竟是谁在终极地掌管。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个被罪恶所充满的世界上，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

我们知道，那永生、全能、圣洁、公义之神的主权，必将在全地彰显。我们知道，这世上一切罪人的罪，终将要大白于天下，终将要面临神的公义而终极的审判。那一切刚硬不悔改的罪人，终将要面临永刑。那一切自义、自傲、自私、自利的罪人，是何等可鄙、可悲。

因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软弱，但无所畏惧，因为我们知道那救赎我们的生命之主，是何等地大能、何等地圣洁公义。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生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死，并非是我们生命的终局。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那能够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就是罪人、魔鬼），你不要怕他。那能够把灵魂与身体都投在地狱里的（就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他必将审判全地的世人），你正要怕他。

若我们真正明白生死的意义，若我们真正明白这世界的主人是谁，若我们谦卑地寻求神、归向他、倚靠他的救恩，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所畏惧。

什么是真正的无我？无我的价值与意义？（其中的合理部分，以及谬误部分；关键不是在于是不是无我，而是在于，我们是以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为依归，还是以那永生之神为依归）：

——“我”的存在性本身，既不是虚无，也不是一件罪恶的事情。

事实上，“我”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正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赐生命给我们，使我们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理智、理性、情感、意识、意愿等等能力。生命的存在性本身，是美好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够否认，生命是一件何等甜美、何等奇妙的事情。

所谓的“无我”的观念，若有任何正面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就不应当是否认我们生命的存在性本身，不应当否认生命的美好性、积极性本身，而是，应当针对、否定，人在内心中的错误的自私、自利、自义、自傲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生命本是美好而甜蜜的；追求幸福，这本身并非是错误。错误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在内心中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而忘记了那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忘记了他的道德法则，并且，在内心中背离他、悖逆那良善、圣洁、公义的源头。

“无我”精神的价值与意义，不是要否定我们自己生命的真实性、珍贵价值、重大意义，而是要否定，那种自私、自义的自我中心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灵归依何处：——我们的心灵归依于我们自己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的、属世的、属肉体血气的利益与价值？还是归依于，那位创造我们的主、那圣洁的道德与良善的泉源？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根本不必怕它；那能够把身体与灵魂都投在地狱里的，才是我们所应当敬畏的对象。前者，是引诱人犯罪的魔鬼撒旦。后

者，是圣洁公义的永生之神。前者，只能够引诱试探人犯罪，但却并没有能力真正地毁灭人，或是强迫人、迫害人、给人带来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损害。如果我们始终紧紧地倚靠神，持守在圣洁的道德之中，持守在圣洁的、敬虔信仰之中，那么，撒旦、魔鬼、或一切罪恶的势力，就并不能够真的侵害我们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幸福而平安的。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将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那永远的、无限美好的幸福与永生，并必将在神的国度中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

应当恐惧颤抖的，是那些作恶的人；因为他们的结局是终极的、灾祸的、悲惨的。恶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可鄙、可悲的，被万人所憎恨唾弃，甚至被自己的家人、亲人而憎恶。恶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他人没有爱，也得不到他人的爱。

恶人若不在此生悔改，就必将在死后承受无限公义圣洁之上帝的终极审判与永远刑罚。在那永远的世界中，在那永远的地狱惩罚之中，恶人必将哀哭切齿。他们的结局、际遇，将会何其悲惨、可憎！

（第六部分）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

执著，与表象：——佛教思想中，对于万事万物之表象的反对与否定，是正确的吗？固然，我们看待世事不应当肤浅地被其表象所迷惑，而是要仔细全面地观察分析与思考；但是，若我们一概否认任何感官、知识、观察、体验、经历，那么，这种虚无主义、否定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极其错误的。

就终极的角度而言，我们应当“有所住”，还是“无所住”？应当有所执著、依归，还是应当离弃一切，无所住、无所依归？

——我们的信仰的关键问题，不是要无所住，而是要住于何处。那种断然地、一概地否定任何“住”，是错误的。我们的信仰，应当是执著的、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热忱、坚毅的，而不是看空、冷淡、无可无不可、软弱的。

我们在信仰中，所应当执著的，是爱：——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应当热忱地、勤勉努力地去积极生活，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做好一切当作的事，见证上帝的恩典、救赎与福音，进行那属灵的争战，胜过罪恶、离弃罪恶，执著于真理、正义、公义、圣洁的法则。

那种离弃一切、无所住、无所依归的世界观、信仰观是错误的。这种虚无主义是泛神论信仰者的典型特征，因为他们看不到世界与人生是来自于那公义而伟大的造物主，所看不见在世界与人生中本应当有的隽永价值和巨大意义。

现象、观察、感知、认识、思想、情感、认知、心灵之间的关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心灵与这个世界之间互动着；我们通过感官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并能够发现、观察、思考、追寻真理。宇宙自然世界，就如同一本巨大的教科书。那公义、无限智慧、全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在这本教科书中，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大能与智慧，讲述了公理与正义的法则。上帝更在道德世界中，在人类社会中，在我们的心灵世界中，把道德的法则告诉我

们，让我们寻求他、信靠他、归向他，并为我们存留那更美好的、通向永生的救赎恩典。

在我们里面，有一颗宝贵的心灵，有一个珍贵的灵魂与生命，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的能力。只有这样的存在体，才能够真正地懂得爱，也才能够真正地去全身心爱一个对象。爱，是生命的真正涵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就是爱。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美好！热爱神、敬畏他的人，是多么有福！我们在上帝之救恩中所得的爱与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明白的，是那些沉浸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属肉体血气的人所不能懂得的，也是那些抛弃、看空、否定这个世界乃至人生命本身的泛神主义者们所不能懂得的。

我们应当以什么为依归：——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作高深的智慧，也不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否定主义、虚无主义，而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的盼望、信念、仰赖、倚靠、信仰的对象，是什么？是谁？在于何处？——我们所信靠的，是那位全能的永生之神。他是我们的盼望、倚靠。我们在他里面所得的盼望与救赎，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

这，与我们的道德、品德、生命、思想、灵魂、观念，有什么关系？——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真正根基、锚、盼望是在于何处，我们才会真正地明白，道德、美德、生命、思想、灵魂的隽永价值在于什么。

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应当是我们自己的什么观念、行为、礼佛、供养、彻悟、看空，而是在于，上帝自己对我们的启示、救赎、恩典。

【引用圣经有关论述 在沙子上面建筑房屋的人】

马太福音7章

24“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盘石上。25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盘石上。26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27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现象是可以把握的吗？

——现象虽然是变化的，不是恒常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中看见造物主的永能和神性。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引述“基督教护教学”中关于上帝之存在性的阐述，从创造、智慧设计、道德价值等角度】

（以下引述《从金刚经说起》第一品）

“造物主”的意思是什么

“造物主”的意思是：那位终极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他是公义圣洁的，是慈爱恩典的；他把生命赐给人，把

阳光雨露以及地上丰富的物产赐给人；他是道德律法的给予者，是道德世界的终极审判者。他把道德法则先天性地放在人的良知之中，使每一个世人都在内心深处知道诚实、公义、公平、正直等等道德品格的含义。

____

他创造了宇宙天地以及其中的万有，更创造了世人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听、看、思想，使他们有理性、智慧、道德与情感的能力。

他创造了人的耳朵和口舌，使他们有语言表达和理解的能力；他自己更能够把自己的旨意向世人显明出来。

他使人能够听见和明白话语的声音；他自己更能够听见世人的呼求和祈祷。

他使人有眼睛能够看见光明；他自己更能够鉴察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人内心的一切真实光景与境地。

他使人有思想、智慧的能力；他自己更有着无限的智慧、思想、意志。

他是有“位格”的，即，他有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过去、现在、未来所作的一切事情，以及为什么作这些事情。在他的一切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都有着无限智慧、圣洁的旨意与目的。

他把智慧与思想的能力赐给人，更把生命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即，使每一个世人也成为有位格的存在体；使他们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的能力；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作的事情、所说的话语；使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常常包含着智慧的设计，以及道德的属性。

因此，人在这个世上与其他一切动植物、花花草草、鸡犬牲畜都存在着本质上深刻的不同。一株树木，虽然高大、参天、美丽，但是，却不能说话，更不能表达自己的任何感受与思想；在它的里面，没有"位格"，即，它没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换言之，在它的里面没有一颗真正的灵魂。

____

就严格意义而言，对于生命的真正定义，正是在此。一个无知无觉的存在体，就像是一个数学公式、或是科学研究中的黑盒子一样，在给定了输入信号与输入条件、系统状态的情况下，只会有确实的、不变的、一致的、死板的、甚至可观测研究的输出信号或是反应方式。换言之，在它的内部，没有一种驱动机制，使它可以自己自由地、自主地决定，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去内在性地选择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自由的意志与自我的认知与意识，只有人才会有，正如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可以想要举手、或是不举手，或可以想要计划做一件事情、或是计划不做一件事情一样。

这种意识、意志的能力，在这宇宙世界中，是人所特有的。我们如果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就越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深邃而奇妙。这世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是由"死"的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所组成的；所有的物体与粒子，都按着牛顿运动定律等科学法则而运行；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它们都只能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死"的；它们不可能有意识、自我认知，也不可能有意志、自由意愿。（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正是以造物主为中心的信仰与世上那些万物有灵、盲目迷信等等世俗宗教之间的重要分水岭；这也正是现代科学之所以诞生于基督教信仰为文化中心的欧洲的根本原因。我们将会在其它书籍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人却不是如此。虽然，人生活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受到各样有限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资源、健康等等的限制；但是，在人的里面，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与灵魂。人的心思意念能够不受时空的限制，“飞”到遥远的天边；人的情感与思念能够遥“寄”给远方的亲人；人的心能够在复杂纷繁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深刻的思考、抉择，计划自己的行动目标，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世人的里面，都普遍地有一种追寻真相、追求真理、寻找信仰、倚靠精神支柱的强烈倾向与信念。这些，都往往是人生命中最珍贵、最伟大、最高尚的组成成分。

从宗教、哲学意义而言，人因着这些极其特殊而宝贵的品性、属性，而被我们在这里定义为“生命”。生命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活的、有内在生命的存在体，才能够谈得上去“爱”一个对象；这正如，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对他而言，道德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会审判菜刀或是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刑罚那使用菜刀或手枪的人；——因为工具本身是“死”的，是无知无觉的，所以它们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一个有自由的、有生命的主体，才会具有道德的性质。

这样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宇宙世界中无中生有出来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是，我们回答说，这样的生命，正是来自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主宰，来自那位创造生命、把生命赐给世人的上天，来自那位全能、智慧、有无限权柄的造物主。

____

虽然，在人的生命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罪恶，甚至，人的生命从本质上就犯罪背离了神；

虽然，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人的生命是如此渺小而短暂；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人的身上，想见那位无限全能之造物主、永生之神的品格与属性；

这正如，我们能够从这个浩瀚宇宙的本身之中，能够看见那位全能、全知、全在、全备之上天、造物主的能力与属性一样。

____

任何人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从社会与人类的历史，从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中，从对于我们生命自省的过程中，都能够明白、理解、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物体、存在体，其背后都有导致其存在的因素、原因、作用力、机制、法则或导因。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浩瀚的宇宙，以及其中如此浩大、纷繁、复杂、美丽、奇妙的万事万物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在这些所有事情、事物、事件的背后，一定有那样一位极大能力、极其智慧、极其伟大、高尚圣洁的造物主。

宇宙是浩瀚无限的，因此，那位造物主就必然更是无限的，有着无穷的力量，更是生命的永远泉源。

虽然人是有限的，然而，由于人的生命有认知、意志，有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意愿、管理、恩慈、公义等等有限的能力或属性，从而，我们从人的生命中也能够知道，那位创造人生命的造物主，更有着意识、意志、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旨意、管理、恩慈、公义等等至善至美的能力与良善属性。

他掌管全地，鉴察人心，颁布道德法则，赏善罚恶，赐人生命，以公义和恩

典待人，把救恩赐给万民。他是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是喜爱良善之人的全能者，是公义圣洁的审判官；他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人的真诚、敬虔与谦卑，不喜爱人的虚伪、亵渎与傲慢、自义。

那造耳朵的，自己岂不能听见呢？

那造眼睛的，自己岂不能看见呢？

那赐人心灵与头脑的，自己岂没有思想、情感与意志呢？

他喜爱公义与良善，并将要终极地、公义圣洁地审判与惩罚世上的一切罪恶以及刚硬不悔改的罪人。

____

他创造的宇宙世界，何其浩瀚而美丽。如果，我们在夏天夜晚，凝视那清澈的星空，仔细地眺望那悬挂在夜空中的无数璀璨的星体；如果，我们在清晨的海边，看朝阳破晓，从天边磅礴而出的绚丽霞光；如果，我们俯视金色的麦田与浩渺的大地，或是遥望那雄伟翠丽的高山峻岭，或是奔流的大河之中的滔滔江水；——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惊叹于那位全能之造物主的创造之工是何其伟大而奇妙。

____

关于造物主之存在性的辩论

从一些基督教护教学书籍以及一般性哲学书籍中，比如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述，或甚至是从中国古人的书籍比如诗经、甚至论语（尽管孔子并不愿意接

受关于超自然信仰的思想理念，但是，孔子仍然在论语中时常提到上天）中，我们都会看到对于上天、那位超越一切之上、眷顾世人之造物主的论述。

一般而言，那些相信造物主、上天、上帝之存在性的信仰者的思辨性论述，可以简单粗略地举例如下。

————————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包括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终极的意义，而仅仅成了一个属肉体血气的存在体；在这个宇宙世间，人的生命就既不是可贵的，也不值得珍惜；人生命的意义，就仅仅成了或是虚无主义、或是弱肉强食的存在体而已。

————————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心灵与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盼望，因为必将面临死亡而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就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属肉体血气的社会中活着，并不得不面对冰冷的坟墓。

————————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间社会的道德，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坚实的根基与权柄的源泉。所谓道德，就仅仅是怎样维持社会秩序与运转的、功利主义的、伦理体系，而没有其内在的、终极层面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样的体系下，道德的力量是苍白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____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世界的起源。有人说，这个宇宙世界是自我存在的，从亘古就是如此。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经过谨慎严格的哲学思考与逻辑思索。一个认真深思的人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被造的，而是亘古以来就是如此自我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从无限远的过去就一定早已演化完结而进入彻底的寂灭。

____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通过理性而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普遍的、一致的、确定的、规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之所以能够被数理以及逻辑的科学体系所研究，之所以是秩序的、而不是混乱的，正是因为，它是被这样一位智慧而全能之造物主所创造的。

____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宇宙世界中观察到如此浩瀚而庞杂的、美丽而奇妙的、精确地调制的现象。比如，宇宙中有大约十个左右的基本物理常数，例如万有引力系数，电磁力常数，等等。这些常数直接影响到分子之间、原子之间、以及万物之间的各种作用力的大小。这些常数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于现在的数值，那么，这个宇宙中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此瑰丽的星空、数量巨大的星系，也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更不可能有我们这个美丽奇妙的蓝色星球。

（1.A.5）

佛教所信仰的神佛，究竟是怎样的神佛

然而，在佛教里面所信仰的神佛，却不是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造物主，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上天、上帝、永生之神。

事实上，正如《世界佛教共识宣言》中所说的，也正如几乎每一本佛教经典中的思想核心所表达的，——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这样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终极的造物主。

毋庸置疑，佛教是一个关于超自然信仰的宗教信仰体系，其中也谈到了许多关于世界本质、生命本质等等的问题。但是，佛教信仰的重点，在于每一个人的彻悟、看破、修行、成佛、等等；——关于世界与生命，佛教中谈到了许多复杂的、归纳性的、分门别类性质、甚至臆想性的纲目、条款，——究其实质，虽然其中有众多的神灵、以及各种各样称呼的超自然存在者，然而，他们却并非是那样一位全能、全在、全在、全知、全备、永生的造物主。虽然他们或许在某些方面看似具有造物主的部分能力、品格与性质（比如，有超自然的看见、知识、能力、生命，等等），但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是那样一位有无限能力的、终极的、公义圣洁的、至善的创造生命之主。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智者、悟者、导师、引领者，可是，他们并非是创造生命之主，也不是那有着无限权柄的、生命的源泉、智慧的源泉、能力的源泉。

从广义的角度说，佛教思想属于泛神主义思想体系，其中也包含了多神主义内容与思想。粗略来说，佛教认为外部世界是客体，内在世界是主体，而神

佛则是那些彻悟者；神灵与世界的关系，如同智者与房屋的关系，或是智者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因为智慧与彻悟，而不受后者的羁绊与搅扰。而这种智慧与彻悟，主要聚焦于否定主义，——即：既否定客体（外部世界）的实体性、本质性，也否定主体（内在世界）的实体性、本质性，而强调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等等；而这种否定主义，甚至否定“否定”本身，即：无实无虚，等等。

佛教的这种没有造物主、上天、上帝、无限全能之神的宗教信仰思想体系，与世上多数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直接影响到，佛教体系中对于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等许多问题领域中的观念、理论、理念、看法。

事实上，佛教因着历史文化的原因，脱胎于印度古宗教，与今天的印度教在哲学层面，在关于“没有造物主”这一本质特点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关系；两者都可以粗略地被看作是属于泛神主义哲学理念。

——————————————————————————

（1.B）

这与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有什么本质而深刻的关系

由于在佛教中没有造物主、或不相信有造物主，因而，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理念与观点。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往往是泛神主义哲学所共有的。

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观上，它们往往把世界看作是无

珍贵价值、无隽永意义的，而不是把世界看为瑰丽、奇妙、意义深刻的。它们往往强调，世事无常，人不应当被世事羁绊，而是应当醒悟，看清世界与世事的虚空性、欺谎性等等。在人生观上，它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心灵、位格等等看作是并无深刻价值意义的。

这种泛神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没有造物主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总是会指出，物质世界的虚浮性、不可倚靠性。然而，即使，这样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错，并且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缺失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们不能看见世界被造的奇妙性、美丽性、智慧性，也看不见世人生命的珍贵与独特、心灵的奇妙、思想的可贵。人的这种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是宇宙世界中一种最为独特、奇妙、珍贵的能力与品质，是来自于造物主、创造生命之主自己的无限能力与完美品质；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正是道德的基础，是爱的根源。

总而言之，它们把人生、世事、价值等等，往往都看为羁绊人的东西，提倡要离弃、舍得、放下，而不是要有满腔热忱的、执著的向往、盼望与信念。

究其原因，无论是人们在思考世界观、还是在思考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世界就是冰冷、荒芜、混乱、无意义、虚浮的，而人生也就是荒谬、困惑、荒诞、虚空的；甚至道德也往往成了虚浮的、欺骗人的符号与把戏；因而，根据泛神主义哲学，这些就都应当被看破、看空、舍弃，放弃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在评析本书《金刚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晰地看见上述特征。

（第七部分）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

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即，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心里面有所依归、执著，那么，心就不是真的安定了下来。

所以佛说，即使行善、布施，也不应当拘泥于具体的方式方法、表象与形式。

这样说有道理吗？

有道理的成分：——灵活、因地制宜的必要性和优点：——的确，任何良善之事，都不应当是形式主义的，而是应当注重事情的本质、实质内容。任何良善之事，都应当是真心真意的，而不应当是表面、机械的、固定僵化的程式或死板的规条。

错谬的成分：——但是，丧失原则、丧失法则基准的严重后果：——否定"坚持原则"，否定"任何执著"，等等的否定主义哲学，对于行良善之事来说，是极其谬误的，并必会带来严重的害处。

行善，不但需要决心、意愿，更需要坚毅、果敢、持之以恒的执著。这种执著的精神，并非是僵化死板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是真挚心意、热忱态度的表现。这种执著精神，不但不应当被否定，反而，应当被称赞、肯定、效法。

（第八部分）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

这里的意思是说：——
诸相（一切表象、形式、方式方法、具体内容）都不是实的。
众生也本来都没有什么众生。

========

这样的认识，是有利于众生吗？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主流人群、大众都持守着这样的虚无主义、否定主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本来无一物，何处生尘埃；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那么，这个社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样的社会，会渐渐地变成一个慵懒、平淡、乏味、冷漠、没有激情与热忱，更没有真挚与敬虔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执著与热情，会不断地被否定、舍弃。甚至，连家庭、亲情也会被逐渐看为虚无、没有真实隽永的涵义。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也会缺少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与罪恶做生死搏斗的精神与勇气。即使偶尔有这样的勇士，或是偶尔有一些愿意执著地追求真理、上下求索、苦苦思考、真心求问的人，也会被他人所轻看。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对于我们的社会与国家来说，对于我们的心灵与灵魂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利益？是消灭我们的身份、认识到一切尽皆非实、尽皆虚无、虚空、否定一切之存在的实际性吗？

——任何世人的真正利益，不是在于消灭他的“我”，而是在于他的里面、他的灵魂中真正的利益。我们的财宝，不是地上的那些财物；那些属世的财宝，会被人偷、被人抢、被虫子咬；但是，我们积攒在天上的财宝，就是道德、灵魂的圣洁，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是与我们的永生紧紧相连的。人的谦卑，是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于何处。

如果人以此世的利益为自己真正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贪婪、自私、自利、自义、自傲。但是，如果人以自己在属神国度的利益为自己的真正利益，那么，他就会谦卑地承认自己在生命中的罪，并愿意悔改自己的罪，谦卑地渴慕、祈求、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

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泛神主义者的回答，与敬畏上帝者的回答：——

泛神主义者对此的回答就是，并没有真实的利益，因为“我”、“人”、“众生”、“寿者”都是虚无、虚空、虚幻、虚浮的。泛神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断灭了“我”的观念，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利益，就是涅磐与寂灭，即，“我”将要彻底消失、融化在那永恒无边的幸福海洋之中。

敬畏上帝者的回答是，人的真正利益，在于他的灵魂，在于他的生命归依于上帝那里，在于：人在属神国度中的永生、无限美好的幸福。因此，我们对他人行善，绝不仅仅是眷顾对方身体、物质方面的好处和利益，而更是，使

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敬畏上帝的全能，归向上帝的恩典；是在属灵的层面，使他得到真正而永恒的利益。

（第九部分）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我们怎么知道一本宗教信仰中的经书的历史真实性？仅仅是凭着对方自己所声称的、所标榜的话语吗？我们又怎么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中的教义、理念体系，是正确的，是真理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书里的内容，是当时历史上的人物所真实地说的话？我们有什么证据和旁证吗？

我们又怎么知道那些话语的内容都是真理呢？都是真实的事实呢？

信心与理性的关系应当是什么？

我们凭着什么，而知道一个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难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难道是心诚则灵吗？难道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吗？

我们有什么客观的根据呢？

（关于信仰的证据，以及上天的启示与同情怜悯）

——在宗教信仰以及教义上，一方面，我们应当追寻真理，并真诚地、纯洁地，凭着信心，而相信、接受那信仰中的真理；另一方面，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违背理性的，而是，应当从理性中，从客观现实世界的证据中，得到佐证、旁征，从而确信，我们所信仰的内容，的确是真实的、可信的、合理的、正确的。

关于信仰之真理方面的证据，应当包含内在性的证据与外在性的证据。

内在性的证据是指，信仰之真理中的教义内容本身，应当是合乎理性、合乎我们良知的。

这是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关于道德法则的知识，也有着关于上帝、上天的重要品质的认知。一个信仰，如果其教义是与我们内心良知中的这些先天性的“知道”相违背的，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个教义并非是真理。例如，若一个信仰教导我们去杀人、放火、偷窃，或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败坏的、而不是圣洁公义的，或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有限的、而不是智慧与全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理性与良知中知道，那样的教义一定不是真理。

但是，我们每一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心灵、生命之中，我们常常犯罪、违背我们的良知，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常常昏暗，甚至

以善为恶，以恶为善。

所以，信仰之真理的外在性证据，也非常重要。

外在性证据是指，关于一个宗教信仰的经书或教义，在历史性、客观世界性、结果性等方面的证据。外在性证据能够向我们显明，信仰之真理的正确性、真实性，是清楚而毋庸置疑的。

真正的信仰，绝非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而是客观性的、事实性的、真理性的。

【引述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马太福音7章
15“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蒺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17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19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20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引述 旧约 怎么知道先知的话是真的呢？】
申命记18章
21如果你心里说：‘耶和华没有说过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22一位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如果那话不成就，也不应验，这话就不是耶和华说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外在性的证据包括，历史性、文献性质的考证、证据、旁征、佐证，等等。

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考据工作，必须是全面、客观、平衡、诚实、认真、一丝不苟、谦卑的，而不能马虎大意、更不能以偏概全、自傲自义。【读者可以参考作者所翻译的书籍，例如，《辩护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菲利叔叔的谈话》等】

外在性的证据还包括，一个宗教信仰在现实世界中所结出的果实。即，这个宗教信仰在世界中为我们所做出的见证：——它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改变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的考察工作，必须是全面、诚实、没有诡诈的，必须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片面、扭曲，而是要在大量的事实与史实中，认真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在纷繁复杂的头绪中，看到事物的本质、真相。【读者可以参考作者所翻译的书籍，例如，《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

更主要的是，外在性的证据还包括另外两个重要核心的方面，就是：预言，与神迹。

真正的预言，与真正的神迹，都是超自然的，是超出世人的能力与智慧之外的。真正的预言与神迹，一定不是人以讹传讹的谎言，或是人主观臆想出来的虚构之事。真正的预言与神迹，一定有充足的证据支撑其历史真实性，使后人无可置疑、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都是曾经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前人的虚构，或是后人的虚谎或添油加醋。

真正的预言所说的事情，往往是指向极其遥远的后世时代，往往是在说预言的时候、在当时世人看起来极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正的预言，一定包含着许多真实的语言、没有任何含糊其辞、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详细信息内容。真正的预言，绝非是像世上许多算卦、或是胡乱猜测等的人所说的话。真正的预言是可以考证的，是大量的，是详实的，是斩钉截铁的事实。这

样，在后世、当预言成就、实现的时候，后人就会清晰地知道，那些预言，一定是来自于神自己的启示，而不可能是人的胡猜、瞎蒙、乱讲。

关于真正的神迹的文字记录，一定是发生在距离神迹的发生时间并不久远的时间；这些神迹往往是公开地发生在许许多多众人的眼前。这样的文字记录，并不是关于遥远过去的时代，或是关于一个距离遥远的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这些文字记录所记载的，正是在当时的当世，那时的人们所广泛地、熟悉地知道的神迹奇事。因此，后人在考证的时候，就可以确信那些神迹历史的真实性，因为，若那些事情不是真的，那么，在那些文字记载的当世，那时的世人就不会相信、不会信服那些文字记录中所讲述的事实、神迹、教义、真理。

真正的预言与神迹，一定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博人眼球、无谓地制造一些人为的轰动效应。真正的预言与神迹，一定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一个信仰之真理的真实性、真理性、事实性。真正的预言与神迹，一定是出于良善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人的心唤醒，使人的道德变为纯洁、圣洁，使人的心灵寻求真理、渴慕公义、归向神、祈求神的救恩。【读者可以参考本书作者所翻译的《基督教的证据》《为基督教信仰之真实性而辩护》《基督教信仰的证据》《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

但是，与基督教信仰相比，与圣经相比，佛经不仅在内在性的证据方面，正如本书前文所述，在许多内容上是违背世人的良知与理性的；而且，佛经在外在性的证据方面，更几乎完全是空白。

第一，佛经仅存于中文翻译等译本中；——其印度梵文原文的原本信息，以及其成书时代准确信息、传播人群、最初信众的历史追朔与历史考据，等等相关信息，都早已完全地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天已经无法可考。事实上，印度文化中的古代历史、详细信息方面的记录，本身就是残缺不全、支离破碎、无法考证的。

或许，这对于笃信佛教教义的人们来说，这种历史考据的缺失，完全不是问题；——既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我们又何必为那些陈年旧事的琐碎而较真呢？

但是，迷信与真正信仰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盲信、没有根据的，后者不仅是合乎理智与良知、并超越于我们世人所知之上的，而且，更是能够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推敲、能够经得起察验与查考的真理。

第二，佛经的教义与内容，基本上都是一面之词的断言；读者或者相信、全盘接受，或者不相信、不接受。在信与不信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共同的平台与共识，来彼此进行交流与对话。这是因为，佛经中关于超自然的各种说法，都是主观的、论断式的，而没有伴随的历史证据等等客观世界的证据。因此，无论是信佛的，还是不信佛的，都是出于主观的判断，而没有客观的事实作为支撑。没有人能够证明“我”不存在，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众生”真的在终极层面上是虚无的。

第三，在佛教中，也会时常讲到神迹。但是，那些神迹，比如有的信佛之人身体不坏，或是身体缩小，等等，都与佛教教义本身的核心内容并没有直接关系。换言之，那些神迹无论是真是假，都不能证明、或是证伪佛教教义本身的真理性、事实性。并且，那些神迹往往是关于遥远时代、遥远地区的人的故事，而不是发生在当世、公开地发生在众人面前的事情。因此，与其说那些神迹是真实的故事，不如说是匪夷所思的神话、俗语，是口口相传的、

添油加醋、甚至充满欺谎的民间传说而已。

第四，在佛经、佛教教义中，既没有关于历史方面的任何真实内容，也没有关于历史等等方面的预言（即，应当是包含着精确细节的、不可能凭着世人所预先猜测出的任何详细信息的；而不是泛泛的、八卦性质的一般性言辞）。事实上，佛经本身的内容，与历史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固然，这种详细历史信息的缺失，并不影响佛经教义本身的表达；但问题是，读者怎能够相信那些话语是真实的呢？怎能相信那些话真的是佛说的呢？怎能相信佛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理呢？难道，仅仅凭着，像金刚经这里所说的一样，只要相信佛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妄语”，就可以了吗？那么，这样的信仰，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究竟是真理还是臆想呢？

固然，我们应当全身心地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的启示一定是真理、绝无虚谎；然而，因着神对我们的怜悯、恩典、慈爱，他若真的是那超越宇宙天地之上的、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么，他就一定不会不给我们显明证据与见证，使我们能够确信，那真的是他的话语、启示。

【引述 圣经 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约翰福音10章
27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

（第十部分）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

否定主义的极致，就是否定“否定”本身。这有点类似于《老子》中开宗明义所说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大道，如果被表达出来，就已经不是恒常之道、永恒之道、至理之道了。

佛在这里说，真正的佛法，不是实的，也不是虚的。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否定和拆毁任何成型的、固定的、恒常的、终极性的法与道。

并且，佛教的声称是，只有真的明白这一点，只有真的明白其实万有皆无、连“无”都是“无”，人才能真正地悟道、成佛、彻悟。

=======

至理，真的如此吗？不是的。真理，不是终极的否定主义，不是拆毁、否定，而是建立、兴起。真理，一定不是虚无的、虚空的、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肯定的。真理一定是实的。真正的至理，一定包含着无限的丰富，引向无限的圣洁与幸福；并且，真正的至理，一定不是消灭我们的生命、否定我们的位格，而是建立我们、引导我们，并赐我们永远的生命。

【引述 申命记 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心里
引述 使徒行传 17章
】
申命记30章
11“其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诫命，对你并不太难，离你也不太远。12这诫命不是在天上，以致你说：‘谁替我们上到天上去，为我们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13也不是在海外，以致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去，为

我们取回来，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14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使徒行传17章

22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各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敬畏鬼神。23我走路的时候，仔细看你们所敬拜的，发现有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24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　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25也不受人手的服事，好象他缺少甚么；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26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27要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28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就如你们有些诗人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29我们既然是　神的子孙，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是好象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30过去那无知的时代，　神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31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作一个可信的凭据。”

（第十一部分）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不住于法的优点——灵活、有创意、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不住于法的缺点——丧失原则、缺乏韧性与执著，容易使人懒惰懈怠。

住于法的优点——坚持、热忱、执著。

住于法的缺点——固执、教条主义、僵化、迂腐、事倍功半。

怎样才能既灵活、有创意、因地制宜，又不丧失——原则、韧性、持之以恒、执著精神、热忱的态度；积极勤勉，不懒惰懈怠，不滥竽充数、敷衍形式，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怎样才能不固执、不教条主义、不僵化、不迂腐、不顽梗，又同时执著热忱、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精诚求索？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而不是因行为称义的信仰。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一丝一毫的优点，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所舍的身体，因着他为我们的死，使我们得到救赎与永生。

我们的生命品格与行为，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救恩之中的信心的必然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是热忱的，我们的行为是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僵化规条的，而是热情、充满激情与创意的。我们所倚靠的，不是任何世事、任何被造之物，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能力，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是真诚的，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在生命中原本是没有盼望的罪人；如今，我们是靠着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而有了那美好而确据的盼望。这样的信仰，使我们在内心深处谦卑，不执拗于任何被造之物与形式规条，而是真挚地、热忱地、出死入生地，在这个世界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见证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应当是怎样的？——敬拜上帝的热忱信仰，与看空一切的佛教，有什么不同？在谦卑、放手的方面，有什么异同？在执著、求索、热忱的方面，有什么异同？

——真正的信仰，应当以道德价值为中心，以超越生死的、超自然的内容为主旨，讲述人生命的终极意义，以及世界的本质。真正的信仰，应当使我们真心地、由内而外地谦卑而诚实。这样的谦卑，不是一种刻意谦虚、不诚实的态度；也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观念，不是要否定自我生命之隽永价值与巨大意义。

真正的信仰，不应当是负面主义、消极主义、否定主义，不是使我们看透万事、看空自己、失去激情与热忱，而是恰恰相反，使我们的内心仿佛爱火在燃烧，以炽热的、敬虔的、谦卑的情感，去爱神、爱人。

一个人，只有在对于上帝的信仰中，在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信靠之中，——才会真正地、终极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罪人，若靠着自己的才智、能力与优点，那么，将会是何等可鄙、可悲、没有盼望；——才会真正地谦卑，才会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甜蜜；——才会真正地在内心中燃起圣洁而热忱的信仰，才会积极地、充满热情地、开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以巨大的执著精神，以百折不回的决心与毅力，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勤勉和努力，在这个世界上荣神益人，见证神的恩典与救赎。

虽然，在基督教与佛教中，都强调谦卑舍己，但是，它们的内容、教义与主旨却完全不同、存在着天壤之别。后者所强调的，是要否定实相、执著，是

要让人在内心深处放下一切挚爱、牵挂、热忱、坚持，是要否定一切正面的价值与意义，是要让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佛教虽然也劝人向善，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但是，因着否定主义的核心教义的影响，这些劝人行善、布施等等教义，就都具有临时性的、表面性、肤浅性的特征，而不是令人舍生忘死、为了追求真理与公义、为了与罪恶针锋相对地斗争而甘洒热血。这样的信仰，往往是冷淡、冷漠、淡然、超脱的，而不是热忱、执著的。

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与佛教信仰之间会有这些不同？泛神主义与基于上帝的信仰的本质性区别与表现是什么？

——在泛神主义信仰中，人的生命，与牲畜、野兽、花鸟鱼虫、树木花草的生命相比，虽然或许有高低之分，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人看不见那造物主、生命之主、上天、上帝的时候，从终极的层面讲，人的个体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真实的、隽永的、能够存到永远的价值和意义。当人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人生命中的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就没有什么稀罕、珍贵之处；人的灵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甚至，许多世人常常认为，人的生命仅仅是体现在身体上，而不是体现在心灵与灵魂的道德价值上。

于是，在泛神主义看来，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仅仅是短暂的、虚浮的、虚无的、虚幻的，那么，对人行善、以怜恤和恩慈待人，以及，在这个世上寻求以公正、公义、公平待人，等等，——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是不好的，但却并不具有本质性的、隽永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也不需要为那些事情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甘洒热血、舍生忘死。

因此，若我们比较泛神主义信仰与基于上帝的信仰，就往往会发现，前者容易使人淡漠，后者则会使一个真诚的敬虔信仰者内心热忱似火、谦卑舍己。

（第十二部分）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佛的超自然性：——根据佛教，虽然佛不是那位全知、全能、全在、全备的造物主、那位无限智慧与公义的上天、上帝，但是，佛也具有很多方面的超自然性。例如，他在一些方面能够一般性地（而非具体性地）预知后世的事情。他还能保佑信众在世上生活的各样平安等等。

佛与上帝之间的异同：——上帝既有着超然性、也有着内在性，即，上帝超越于这个宇宙之上，但又是内在于宇宙之中；因此，他是无所不在的，并且是无所不知的。他不仅知道现在、过去、将来的事情，也知道一切隐藏的事情，可能的事情，以及事情的前因后果等等。上帝有着无限的知识与智慧，更有着完全的圣洁道德品质。他是至善至美的。但佛却不是那样一位无限的神。佛既不是造物主，也不是创造生命的主，更不是宇宙世界中的完全主宰者。佛是一个觉悟者、悟道者、智慧者；佛的智慧，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是虚无的、虚空的、虚乏的、虚幻的；不但如此，而且，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佛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佛教，佛并非是人的创造者，也不是人的救赎者（以恩典和权柄，把人从罪恶中终极地救赎出来），而是人的教导者、启发者。佛所要告诉人的，就是一切皆为虚无，甚至连“无”本身也是没有的，连“否定”本身也是应当被否定的。佛声称，只有当人明白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法、也无非法，人才能够彻悟；并且，彻悟的人也能成佛。

我们怎样来到佛的面前？我们怎样来到上帝的面前？

——根据佛教，人只有通过彻悟和修行，才能够成为佛。佛教中所说的恩典（佛在人属世生活上、各样具体属世利益方面的保佑；在教义教导方面的引导和启发），与基督教信仰中所说的恩典（神在人属灵方面的拯救、赦罪、饶恕、代罪、救赎；以及在生命方面的引领、眷顾、护佑）是涵义完全不同的。基督徒只有倚靠神的救恩，而不能依靠自己的任何工作或优点。佛教徒则必须依靠自己的修行、彻悟与功德。前者关乎人的信心，却无关乎人的任何优点（任何人都无法在神的面前邀功、自夸）。后者关乎人的优点和功绩（任何人都可以像佛那样有超然智慧与能力）。哪种信仰能够让人在内心深处更加谦卑呢？

因信称义：——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因着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而得以在神面前称义。

【罗马书3章】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22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

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因行为称义：——人因着自己的行为、功德、优点、业绩、所作的事情，而在神灵面前称义；即，这样的信仰体系所强调的是，人外在的行为表现、工作、成就，而不是内在的心灵真实景况。

因智慧称义：——人因着自己的领悟、彻悟、所得的知识、智慧，等等，而在神灵面前称义；即，这样的信仰体系强调的是，人头脑中所明白的、悟到的高深、深奥道理。

因发愿称义：——人因着自己在内心中所产生的、在口中所表达的心愿、志愿，而在神灵面前称义；即，这样的信仰体系所强调的是，人自己心中的意识、志向、动机。

因称呼名号而称义：——人因着口称“阿弥陀佛”等称呼口号，而得以进入净土世界；即，这样的信仰体系所强调的是，人们在口头上的念经、敲木鱼等外在的形式、行为、言语等等。

在上述不同的信仰体系所强调的重点中，哪一个能够使人在内心真正谦卑、但却满心热忱、充满挚情呢？——我们的回答是：那以圣经为根基的、以耶稣基督救恩为核心的、因信称义的信仰。这信仰，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启示，是出于上帝的权柄、恩慈、圣洁与公义。

到底哪一个是真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的真理。圣经是上帝全备的启示与话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不但不是虚无、虚幻的，反而是极其宝贵、被上帝所珍惜的；道德的权柄与源头，在于上帝自己；世界是上帝所造的，显明了上帝无限的权柄、智慧与能力；一切价值的终极源头，是出于神；我们的信仰，应当单单地以他为中心、为对象、为倚靠。

我们的良知与历史的见证：——【读者可以参考作者翻译的《基督教信仰的内在理由》《基督教的证据》《基督教的果实》等等】

上帝的启示与圣灵在人心中的动工：——【引述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 那在你们心中动工的，必要成就那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以及古代历史中，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与佛教、道教等中国文化之间的渊源。

在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以《论语》为核心的四书五经、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在晚清洋务运动以前的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一直实行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民间学子通过寒窗苦读，进入科举考试；成绩优异者因此可以出将入相，担任国家政府组织内的各级官员职务，甚至

担任国家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务。而科举考试的书籍内容，以及千千万万民间学子们寒窗苦读的书籍内容，不是繁冗复杂的佛经，也不是虚无缥缈、“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庄子》，——而是脚踏实地、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详情请见《关于论语的联想》】。

儒家思想与伦理哲学理念，在中国秦汉以来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都是处于核心地位，是璀璨的中华文化的最强音。相对而言，佛教文化【有时道教文化也是处于如此类似地位】，虽然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一定的重要影响地位，但却从来都不是显性的主流文化，而仅仅是一种亚文化、甚至常常是一种被中国主流读书人所严重轻视、蔑视的文化思想体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例如苏轼等人）对形而上哲学化、虚空主义的所谓“佛学”（泛神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等方面的哲学思辨）表现出一些浓厚兴趣；但是，佛教的主要信众，历史上往往是广大贫苦中下层百姓、教育程度不高的、许多普罗大众，——这样的佛教形式，包含着许多偶像崇拜、多神主义、万物有灵、迷信愚昧、名目繁冗、等等色彩。】

——之所以如此，有复杂的原因。例如，佛教的“出家”“割亲”观念曾经使得极其重视孝道等伦常理念的儒生们激烈反对佛教。又例如，儒家理念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观念，都与佛教信仰实践中的多神主义、神秘主义、名目繁冗的超自然主义、万物有灵迷信主义、等等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与深刻矛盾之处。

但是，以《论语》等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所谓儒教，并非是一个以超自然信仰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体系，而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以“此世之事务”为中心的、世俗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为表现形式的价值伦理体系。

所有人都会面对死亡，也都会不得不思考关乎死亡之事；所有人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去思考世界的起源、归宿、人生的终极意义等问题。这些关乎死亡、生命、永远等等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都会求索的问题，但却不是儒家伦理体系能够提供答案的问题【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倾向于空灵主义的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却无法回答任何一个普通世人内心深处的、这样的卑微求问——关于生与死、关于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之终极意义的问题】。

这正是为什么，佛教虽然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亚文化的弱势地位，但却同时又一直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社会中下层的、许多普罗大众的百姓生活中。一方面，中国的自古官场科举制度，只谈四书五经，以儒家经典为国学；佛学在中国古代一直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显学【直到近现代以后，随着儒学的衰落，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台湾香港等地，——佛教文化才被港台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重新复兴起来，——有意无意之间，作为中国文化对于基督教信仰文化思想体系之挑战的回应（例如南怀瑾等人传播佛学的言论著作等等）；本书后文将会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分析】。另一方面，江南与华南等广大地区，以及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河南嵩山等地区，自古以来就寺庙云集、香火不断。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中，尤其是在明清年代，很多民间半宗教性质的会道门组织都与佛教（或者有时是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与关系。

一方面，普通世人有着强烈的渴望，想要寻求关于生与死、生命之终极意义、命运前途道路等等问题。另一方面，在普通大众的心里，有着强烈的偶像崇拜的倾向，以及喜欢——迷信、万物有灵、神秘主义等等色彩的东西。正是这样的普遍存在于世人心中的内在性倾向，使得普通人们很容易在心中倾情地拥抱多神主义、泛神主义、神秘主义等佛教元素。并且，那些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型人物，通过利用这些多神主义、偶像崇拜的宗教形式，很容易聚集起、建立起民间的会道门组织机构，成为半公开、半地下、半宗教、半政治化的社会组织，甚至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掀起巨大的波澜。

在乱世，当国家社会处于激烈变革与动荡的时候，正如十九世纪下半叶、晚清慈禧太后所推动或领导下的洋务运动的时代，这种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就往往会演变得更加暴力化，例如1898年-1900年的义和团暴民运动一样【或是在义和团一百多年前的白莲教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其虽然在表面的名目上似乎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有关，但是实际上，其中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多神主义、迷信主义、等等，并与佛教数百年以来在华南与江南地区的深刻民间影响和文化土壤有着一定的关系）、或是明末清初的华南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天地会、洪门组织、等等】。

而在和平年代，当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这些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则会蜷缩在社会的底层角落，聚集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贫困的百

姓、尤其是年轻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往往就会有半公开、半地下、半黑社会组织的性质，例如香港的三合会组织、台湾的一些底层民间半宗教性质的结社组织以及黑社会，以及东南亚、越南、金三角等地的一些民间组织一样。

在这些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内部，那些起主导作用的领袖人物或各级领导人物，那些崭露头角、呼风唤雨的人物，往往是一些蛮横专制、手腕高超、好勇斗狠之辈。而多数老实巴交、诚恳做事做人的人，或是头脑简单、凡事随大流、没有独立思考习惯的人，则常常处于底层、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因而，这些半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有时常常会表现出好勇斗狠、宗教狂热、迷信愚昧、偶像敬拜【即敬拜那些人手所造的金银石木偶像等等】、对于领袖的人身依附或个人崇拜、或是黑社会化的倾向。

【对于中国社会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史或古代历史中，这种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对于中国国家社会而言，既有时有正面的积极作用、正面意义的作用，也很多时候会有负面的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从国家政府而言，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民间会道门组织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打压，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于统治机构的威胁，也因为它们与主流儒家伦理体系之间常常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与矛盾。不过，有的时候，它们也会受到国家政府机构中某些方面的利用和教唆怂恿【例如义和团、红灯照、等等受到慈禧太后等晚清政治势力的利用和挑唆与纵容】；或者，会受到后世政府机构的正面肯定【例如义和团、小刀会、大刀会、太平天国、白莲教起义等，被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及中共主流史学界看作是正面的、阶级斗争性质的、被压迫人民对于

统治阶级的合理反抗运动等】。

在一定程度上，在历史中，它们的确起到了在民间打击土匪恶霸、反抗压迫阶级、或是维持法律秩序、伸张正义的积极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团结了底层百姓、或是给许多普通世人心灵中带来了暂时的抚慰与慰藉。

但是，在它们与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有时，它们自己也逐渐地由于好勇斗狠的行为文化，而成为了恶势力本身。

同时，它们在脱胎于佛教文化、或是道教元素的过程中，使得怪力乱神的特征更加显著；常常充斥着神秘主义、神秘兮兮的多神主义、"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快显灵"的迷信主义、万物有灵主义、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是充满着谎言、诡计、愚昧、狡诈、欺瞒、狂热、煽动、偏激、甚至暴力倾向、等等败坏之事、以及各样败坏的情绪。

####

究其根本原因，它们的这些缺陷或缺点，与数百年以上的佛教（或是更久以来的道教）作为中国中下层人民生活中的亚文化宗教信仰（相对于主流的儒家文明而言），在中国民间产生的许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特征，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第一，虽然佛教与道教也常会推崇宽容大度、退一步海阔天空、容让天下

事、等等，但是，佛教道教的核心主旨，却并非是像基督教信仰那样——以上帝对于罪人的本质性饶恕、救赎恩典为中心教义。因此，在佛教道教影响下的文化土壤中，就常常会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对于罪恶之事的没有底线的容让；另一种是，对于敌方的彻底无情的打击。换言之，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所产生出的、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当它们面临世人、世事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各种争议与不平之事的时候，——常常会，或是陷入激烈争斗、好勇斗狠、狂热偏执、崇尚武力的极端状态之中；或是会处于消极遁世、看空万物万事的无为状态之中、而无法与罪恶之事长久地、韧性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属灵的争战。

第二，在佛教中，虽然常常提倡“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但是实际上，对于究竟什么是罪、什么是善，并没有真正的、本质性的教义与阐述【我们在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之教义中能够明白，真正的分别善与恶的标准，正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中的最本质的权柄与基准所在；什么是善？遵从神、上天、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造物主，那位无限全能、全知、全在、至善、圣洁、公义的上帝，就是善；什么是恶？背离神就是恶；敬畏神（这并非是佛教中所说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万神万佛”，而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造物主），是人智慧的开端】；而是，它们仅仅是强调人的修行、悟道、积德、自义等等。从而，基于佛教道教这样的教义与信仰主旨的文化土壤，往往会导致人们在内心深处的、有时隐藏很深的一种自高、自以为义；而不是，真正地在内心深处、谦卑悔改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是的罪人、一个需要救赎恩典的罪人、一个必须要从罪中悔改的罪人。

人的圣洁生命，不是在于外在的光环与荣耀，不是在于外在的成败、成就、业绩、功德、或是威势，而是在于内心深处的谦卑、悔改、敬虔、真

挚。

第三，作为泛神主义观念体系【即，否认、忽视、或无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而是，——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运作、来源、起源、动力、等等，是在于因果、道、气、理、等等没有位格的东西；所谓“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即，否认上天、那位无限伟大的造物主本身是有着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的、是有位格的、是能听能看的、等等】，佛教与道教文化所产生的土壤【请注意，这种土壤本身，并不一定是佛道本身的教导，而是在它们的间接影响之下，正如白莲教、义和团、洪门、三合会等等】，一方面在认识论、信仰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都强烈地具有“看空”、“消极”、“无所住”等特征；另一方面，则有时常常会体现出缺乏——谦卑、柔和、认真、真挚、执著于是非真相【详情请见《从金刚经说起》《剖析老子》】、等特点。

第四，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后的所谓“基督教新教”，都是以同样的一本《圣经新旧约全书》为正典经书；在核心教义与教导方面，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为中心的信仰上，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却非如此。佛教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典体系的、经书的书籍体系。首先，佛经的原文主要是以印度梵文所写成的；但是，那些印度梵文原本佛经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根本无处可考。其次，相对而言，佛经是一个开放的集合【而不是像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圣经新旧约全书》那样、到《启示录》为止，上帝的启示、话语、旨意已经完全地显明；而以后的世人不能在其上进行任何增添或删减的工作】，因而，在后世当中，不断有人在其中添加上新的书作，甚至在汉传佛教中，也有中国人所书写的佛教经书、被列在正统佛经之中。

尽管，后人可以根据各本佛经的内容，考察其中的内容是否彼此一致，从而可以仍然使得历史上的佛教的教义和教导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一致性；——但是，佛经正典的这种非完整性、非闭合性，就必然导致了，在各地之间的佛教中，会存在着经书教义层面上的各种差异【相比之下，尽管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之间，在信仰实践、教会组织方面有很多不同，但在圣经正典、核心教义上，却是彼此完全相同的】，例如，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日本佛教）、东南亚缅甸泰国等佛教之间【所谓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或小乘佛教等等】，都有着一些各自不同的佛教经书。——佛教经书集合的这种非完整性、非闭合性的特征，更进而间接地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中，有许多依附于、或是脱胎于佛教信仰体系的所谓"外道"、"邪教"、或是各种半宗教性质的、人为发挥的、各种民间会道门组织，例如白莲教、罗教、义和团、大刀会、甚至中国当代的法轮功组织等等。它们在佛教既有经书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发挥、增加、删减、或是不同的强调、阐释、应用、转述、等等。

####

【这些半宗教性质、或是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会道门组织、社团组织的正面与负面的意义】

当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斗争、试图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正是广东、华南一带的洪门组织，对孙中山给以巨大的帮助。当1989年64运动以后，正是香港的这种地下帮会组织，帮助许多参加北京

民主运动的大学生领袖，通过香港逃到了西方。

在中国近现代与古代历史中，当政府官员腐败横行、欺压人民的时候，或是当社会上喧嚣混乱、土匪恶霸横行的时候，或是当社会更迭变化、激烈变革的时候，正是这样的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把贫苦的百姓团结起来，努力地匡扶正义。

然而，有时，在中国近现代与古代历史中，它们也常常具有负面的意义、带来负面的后果。甚至，它们会使得整个社会充满疯狂的、无理性的排外与仇外情绪，使得社会与文化充满暴戾气氛，乃至引发大规模的民变与生灵涂炭。最重要的是，它们并不能够把世人真正地带入信仰、真理、敬虔、谦卑、圣洁生命之中；它们更不能把世人带入到对那位无限伟大之上天的敬虔、敬拜、遵从、寻求、敬畏之中。

####

【关于结社】

在中国近现代、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之所以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生命力很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们满足了百姓们结社、团结、联合的内在心灵需求。

在中国的佛教、道教信仰体系，都基本上是出世的、遁世的，强调“空即是

色、色即是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生尘埃”、“无为而无不为”、等等。因此，它们往往并没有完整统一的、把信众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结社、社团、组织等等。往往，它们仅仅是在人迹罕至的山野、郊外，建立塔寺庙宇，刻意地与普通人的社会与人们的普通生活拉开距离。

所以，佛教、道教，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补充儒家伦理的一种重要的亚文化成分，虽然在超自然信仰和教义、理念、形而上哲学方面，对于孔子哲学、四书五经进行了某种必要的补充；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填补普通百姓的结社、联接、团结、互帮互助的内在需求。因而，这种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层出不穷的、依附于或是脱胎于佛教道教的各种：——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社团组织等等。并且，这种组织有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极大的规模，包含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的成员数量、涵盖整个中国的许多地区【例如白莲教、义和团、一贯道、大刀会、乃至现代的法轮功等等】。

############

【中西方的对比】

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体系是一种与佛教道教体系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在圣经中，上帝之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在于，上帝的国度、基督的国度、神的子民、基督的教会。对此，整本圣经中都有许多记述，并且体现在圣经旧约中的许多预表之事上【例如，挪亚的方舟，摩西的会

幕以及其中器皿物件等等的制作与布置，逾越节，大卫的国度，先知书的预言与预表，等等】。教会，是上帝之启示、救恩、作为、心意、计划、旨意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所谓天国，是属神子民的集合，是一切信靠基督救恩、谦卑悔改之人的归宿，是上帝儿女的集合；地上的基督教会，正是对那天国、圣洁之民的预表、实现与见证。

【引述圣经：基督是教会的头。。。
挪亚方舟、里外涂上松香、
启示录，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那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

诗篇27篇
大卫的诗。 1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
我还惧谁呢？
2那些作恶的，就是我的敌人、我的仇敌，
他们逼近我，要吃我肉的时候，
就绊跌仆倒。
3虽有军兵扎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发动战争攻击我，
我仍旧安稳。
4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寻求；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

5因为在我遭难的日子，

他必把我藏在他的帐棚里，

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

又把我高举在盘石上。

6现在，我可以抬起头来，

高过我四周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献上欢呼的祭；

我要歌唱，颂赞耶和华。

7耶和华啊！我发声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

求你恩待我，应允我。

8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的心对你说：

"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9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赶逐你的仆人，

你一向是帮助我的。

拯救我的　神啊！

求你不要撇下我，也不要离弃我。

10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却收留我。

11耶和华啊！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

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12求你不要照着我敌人的心愿，把我交给他们，

因为有作假见证的人起来攻击我，

并且口出凶暴的话。

13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

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
14你要等候耶和华，
要刚强，要坚定你的心，
要等候耶和华。

以弗所书1章

15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16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18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19　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20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作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22　神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赐他给教会作万有的元首。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

哥林多前书12章

1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2你们知道，你们还是教外人的时候，总是受迷惑被引诱，去拜那不能说话的偶像。3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　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
4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5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6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但仍是一位　神，是他在众人里面作成一切。7圣灵显现在各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8有人借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9又有人因

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还有人因着这位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10另有人可以行神迹，另有人可以讲道，另有人可以辨别诸灵，也有人能说各种的方言，也有人能翻译方言。11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作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地分给各人。

12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13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作奴隶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饮了那一位圣灵。14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15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16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17假如整个身体只是眼睛，怎样听呢？假如整个身体只是耳朵，怎样闻味呢？18但现在　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19假如所有的只是一个肢体，怎能算是身体呢？20但现在肢体虽然很多，身体却只是一个。21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22相反地，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23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大体面的部分，就更加要把它装饰得体面；不大美观的部分，就更加要使它美观。24我们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这样了。但　神却这样把身体组成了：格外地把体面加给比较有缺欠的肢体，25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26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作肢体的。28　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再其次是有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各种方言的。29难道都是使徒吗？都是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是行神迹的吗？30都是有医病恩赐的吗？都是说方言的吗？都是翻译方言的吗？31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

启示录21章

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　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象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作他们的　神。4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5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6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7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儿子。8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分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

9拿着七个盛满着末后七灾的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走来对我说："你来！我要把新娘，就是羊羔的妻子，指示你。"10我在灵里被那天使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他把从天上由　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11这城有　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好象极贵的宝石，又像晶莹的碧玉。12有高大的城墙，有十二个门，门口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13东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14城墙有十二座根基，根基上有羊羔的十二使徒的名字。
15那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一根金的芦苇，要量那城、城门和城墙。16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二千四百公里，城的长、宽、高都一样；17又量了城墙，约有六十公尺。天使用的标准，就是人量度的标准。18城墙是用碧玉做的，城是用明净像玻璃的纯金做的。19城墙

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座根基是碧玉，第二座是蓝宝石，第三座是玛瑙，第四座是绿宝石，20第五座是红玛瑙，第六座是红宝石，第七座是黄璧玺，第八座是水苍玉，第九座是红璧玺，第十座是翡翠，第十一座是紫玛瑙，第十二座是紫晶。21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是用一颗珍珠做的。城里的街道是纯金的，好象透明的玻璃。
22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 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23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 神的荣耀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24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25城门白天决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26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27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决不可以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

以弗所书5章
22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象顺服主一样，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象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象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作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甚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象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象基督对教会一样，30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31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象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

————继续讲述，中西方之间的相应对比。

在上述圣经文字中，我们都能够看见，圣经中对于基督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基督教会的神圣性，都有非常重要的强调。

虽然，在某些很少例外的情况下，例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或是俄罗斯的某些少数地区，也会有那种民间黑社会帮派性质的组织；但是，总体来说，在西方的过去一千多年历史中，很少会有上文所述这样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古代历史中的民间帮派组织、尤其是那种半宗教性质的、类似于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罗教、小刀会、洪门、法轮功等这样的民间组织；而仅仅是，往往有一些行业协会，例如印刷师协会、面包师协会、银行家协会、等等。

这恰恰正是因为，在西方的漫长历史中，在民间社会基础结构、民间社团等等方面，基督教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督教会，把社会里面的中下层人民团结起来，使他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联合、结社、成为互相关爱的圣洁团体。

所以，一般而言，在西方社会中，那种愚昧迷信、甚至有时候会表现为疯狂形式的、半宗教性质的民间社会团体，很难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一点，与充斥着冥想打坐的佛道信仰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恰恰是由于佛道这一类所谓信仰，以“出世”为其主要特征，因而，在中国近现代与

古代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民间社团发展的巨大真空，所以，常常会被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士们利用，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动荡与危害。

事实上，在基督教信仰体系影响下的社会中，常常，——相对而言，——越是那些基督教信仰薄弱、淡漠、形式主义为主、而没有真挚热忱敬虔的真正信仰的地区，例如——南美洲的墨西哥等地，或是纽约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这些地方，往往是以天主教信仰为主要形式。天主教虽然也属于基督教信仰体系之中，但是，常常封闭圣经、而仅仅是充斥着：许多繁文缛节的外在形式主义以及一些错误偏颇、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越容易会盛行黑社会性质、黑手党、半地下帮派组织等等；另外，在东正教盛行的俄罗斯、或是美国的俄罗斯移民中间，也往往会有这样类似的帮派组织。究其原因，往往都是因为天主教或东正教的信仰实践，在很多的时候，常以冷漠、不冷不热、形式主义、教会与人心的脱节、等，为其特征。

####

【义气与信仰】

在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或是香港三合会、等等这样的民间社团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以所谓的“哥们义气”为彼此连接的纽带。这种基于“义气”的人际关系，代替了人内心中对于上天的敬虔信仰。

圣经中告诉我们，第一，应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

的确，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友爱相待，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应当彼此之间是弟兄姐妹的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建基于对于上帝的信仰，才可能彼此真正地团结、包容、饶恕、相爱。

当人在内心深处背离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造物主的时候，人就会以世上的被造之物【例如：金银财宝、名誉、地位、利益、等等】、或是其他被造之人【例如：领袖、上级、君主、大佬、等等】为自己心灵的归依和倚靠。

圣经罗马书1章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

【心灵的空虚与填补】

在中国近现代与古代历史中，这种类似于白莲教、罗教、义和团、大刀会、小刀会、红灯照、太平天国、天地会、洪门、香港三合会、法轮功、一贯道、等等半宗教性质的民间会道门组织，之所以能够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并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取得极大规模的发展、甚至遍布全国许多地区，——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因为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

信仰层面的空虚、以及对于民间结社团体的潜在巨大心理需求。

在世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在人的里面，有一颗寻求生命意义的心灵，一颗指向永远的灵魂。正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永生）放在人的心中。人在这个宇宙天地、自然世界之中是最特殊的存在体，因为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有着心灵与灵魂，有着寻求真理与永生的盼望。圣经中说道，我们是按着上帝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本应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世人，都应当在内心中向我们的天父上帝真诚地祷告祈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赐我们今日的饮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然而，世人却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自从亚当夏娃犯罪、背离神以后，人就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世人在内心深处失去了那圣洁纯真的情感，失去了与天父上帝亲密的交通与关系，失去了敬虔热忱的信仰与生命。

圣经罗马书3章相关经节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罗马书1章相关经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

所以，当世人在内心深处背离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以后，人就会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树立起各种各样的偶像，并对他们或它们顶礼膜拜。这些偶像，或许是那些可见的有形之物、有形之人，或许是那些不可见的属世利益、地位、理念、势利、等等【例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群体主义、乡土主义、领袖情结、物质性财富、名利、人的自义与骄傲、以及出于自义与骄傲的臆想与玄学，等等等等】。世人把那些东西当作是自己心灵的偶像【这偶像，正如那些人手所造的各样金银石木的雕像一样，不过是一些哑巴、虚谎之物，是人在内心中自欺欺人、自我中

心、自我满足、自以为义、自高自傲、或是自我清高的产物】，当作是生命与灵魂的归依，当作是自己生命的终极意义与倚靠。

。。。。

另外，在世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着与他人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渴望着爱与被爱。但是，当人的心灵远离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造物主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在根本的层面上失去了真诚、宽容、饶恕、热忱、执著的亲密情感的真正基础。因此，一方面，世人就会在各种民间社会团体、或家族部落中寻找社交关系与心灵的慰藉，以之为自己心底深处的归依；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就会不断地处于彼此猜忌、背叛、相互利用、背信弃义的关系之中。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

哥林多前书13章
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
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
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

【只要有一点与自己所需要的契合，就会接受其全部，好像没有是非辨别能力一样】

在中国近现代与古代历史中，类似于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大刀会、小刀会、罗教、一贯道、红灯照、法轮功、天地会、洪门、三合会、青红帮、以及台湾各种帮会组织等等具有半宗教性质、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社会团体，——之所以能够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社会生命力极强，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极大规模的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在对待各种民间宗教信仰或是组织教义的时候，往往觉得只要有其中一点与自己所需要的契合，就会接受其全部，——哪怕其中包含着许多荒诞、谬误、乃至疯狂、迷信、欺谎、等等成分，——就好像人们都没有是非辨别能力一样。

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在心中普遍地对于信仰、真理、灵魂之事，并没有认真、真挚、热忱、执著的求索，而仅仅是半真半假地敷衍、自欺欺人地参加、三心二意地信从、自以为义地跟随。

在这样的人心中，并没有真正的、敬虔、火热、谦卑、柔和、热忱、挚情的信仰。

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的信仰应当是全身心的；我们的爱应当是真诚而纯洁的。第一，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罗马书12章

所以弟兄们，我凭着　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作圣洁而蒙　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奉。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各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　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

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

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作肢体。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

服事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事；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

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

善的要乐意。

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

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

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事主；

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

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要热诚地款待。

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

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不可自以为聪明。

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

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

亲爱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忿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相反地，“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作，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

只有真诚的、完全的信仰，只有那来自于上帝自己所启示的信仰与真理，只有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和旨意，只有上帝圣灵自己的大能，只有那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才能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从罪中谦卑悔改，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才能够使我们得到那真正的幸福与永生，才能够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真正地相爱；才能使我们有一颗纯洁、热忱、谦卑的心灵。

圣经启示录3章

“你要写信给在撒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　神七灵和七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

你要警醒，把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　神面前是不完全的。

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应该遵守，也应该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就要像贼来到一样。我什么时候来到你那里，你决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身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上的。

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决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还要在我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在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拿着大卫的钥匙......没有人能开的”引自赛 22:22），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

看哪！从撒但的一党，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的人中，我要使他们一些人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且知道我已经爱了你。

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的圣所里作柱子，他决不再出去，我也要把我　神的名，和我　神的城的名，就是那从天上、从我　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写在他身上。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在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

神创造万有的根源，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会显露出来；也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

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

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

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

。。。。。。。。。。。。。。。。。。。。。。。。。。。。。。。。

。。。。。。。。。。。。。。。。。。。。。。。。。。。。。。。。

。。。。。。。。。。。。。。。。。。。。。。。。。。。。。。。。

。。。。。。。。。。。。。。。。。。。。。。。。。。。。。。。。

。。。。。。。。。。。。。。。。。。。。。。。。。。

香港、广东、厦门、澳门、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

自从1840年至今的一百八十年中，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毋庸置疑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所生活的物质

经济文化环境，与1840年以前的环境状态相比，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经过时间的隧道、“穿越”回到1840年、或是更早时间以前的中国，那么，我们在中华大地上，一定会很容易地看到，处处是许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苦百姓【正是因此，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或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常常会有许许多多的民变、造反，例如张献忠、李自成、白莲教、洪秀全、川楚之乱、等等】。今天，无论是在人均收入、食品、衣物、识字率、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等等无数方面，现代人的生活远远地都好于1840年以前古代人的生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归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启，以及大规模贸易的普及与巨大发展。

而在全中国范围内，香港、广东、厦门、澳门、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尤为引人注目。

在1840年以前，香港、澳门、上海，还基本上是人烟稀少的荒岛、沼泽地、或海滩；其中只有很少的一点渔民。澳门虽然自从十六世纪就处于葡萄牙人的掌控之下，但是，其经济与人口规模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

然而今日，它们早已从无到有地变成了人口极其稠密、经济极其发达的国际化都市。今天香港地区具有七百万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上海地区具有大约两千万人口，是整个中国的重要经济发展中心和发动机。自从1840年以来，上海的发展以令人震惊的规模不断扩张，在1949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中国长期经济停滞的年代，上海凭借着建国以前的雄厚工业基础、经济人才与文化基础，其GDP在1949年

以后曾经长期占据全国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全国经济发展中，上海更是对全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无可否认的是，1840年以后至今的香港、广东、厦门、澳门、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口岸、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经济贸易体系成果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开放、开明的人文心态、以基本上友善的态度看待和接受西方文明体系的原因。

。。。。

让我们在此再次重申，当我们思考、考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比较的时候，必须应当注意的两点——

【引述 《美国故事》 相关文字】

不过，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

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

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1840-1900的中国经济发展，同光中兴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85%89%E4%B8%AD%E5%85%B4

同光中兴，又称同治中兴，是指清朝晚期同治、光绪年间，慈安、慈禧两宫听政期间（1862年至189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并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现代史学家芮玛丽所著《同治中兴》里面对“中兴”的定义如下:
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措施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利益及传统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组织湘、淮团练，平定造成极大人口和经济损失的同治回变、太平天国之乱和捻军起义。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洪秀全的落第儒生出现。

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极力与西方列强维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影响

中兴之君主主要是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她们在统治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位期间重用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中兴的功臣，让洋务运动顺利推行。

中兴之功臣主要是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平定内乱方面发挥了很大功用，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用人唯才：分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为汉人，说明慈安、慈禧理事用人，不以八旗考量，确有"卫国保民"务实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革新，必表现在"用人唯才"。

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同光中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兴，在甲午海战的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后，时局较难再与中兴一词相匹配。同光中兴的局面直到甲午战败之前一度得到较多人的肯定，原因在于清廷的确在这一时期内连续取得成绩。1861年开始洋务运动，1864年完成镇压太平天国，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至1880年曾纪泽奔赴沙俄谈判完成收复伊犁，在这一时期

内，政治较为清明，国内逐渐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工业得到了发展，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北洋海军的崛起甚至一度令西方国家相信清廷有能力控制东亚海域。但是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及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兴的局面戛然而止。

。。。。

基本上，晚清的同光中兴的历史时期与洋务运动的历史时期是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主因。

正是由于晚清的同治光绪时期，清朝政府愿意实行开放贸易、政经改革、以开明的心态接受西方政经体制中的一些成分，才使得十九世纪下半叶期间，晚清政府取得了同光中兴的政治经济文化效果。但是，晚清的改革是有限的、局部的、不协调平衡的；最重要的是，在晚清改革之中，有着许多腐败、不公、不义之事。所谓洋务运动，仅仅是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并没有谦卑己心、戒骄戒躁、励精图治、以恳切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明体系、对待中国之政经改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折服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这些中国留洋学生，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新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中城市里院校的毕业生们，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无数从事政治、干革命、深深

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代史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从西方所引进介绍的斗争哲学、进化论思想、等等“现代人类科学文明与先进思想”；——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出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百度百科）

<u>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中，在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梦想中，其实在道德意义上，他们从未真正重视、了解和尊敬过西方文明。</u>

<u>*之所以如此，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但却非常复杂的深刻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往往好坏参杂；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肯定；有的则有深刻的错误，需要清楚地指出。*</u>

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深刻思想传承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思想文明体系。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是一个坚定而稳固的思想文明政治体系。欧洲则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众多小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称外国人为“夷人”，正如古罗马帝国称北方民族为“蛮族”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外交政治，因为中国的那些邻国、外国，在政治经济影响上，在人民文明与富裕程度上，都是中国人眼中所谓的蕞尔小国。自古以来，华夏汉族自视为中央帝国，而外族都是前来朝拜、万国来朝的、偏远地区的、尚未完全开化的百姓而已。

中国有着光辉的思想文字历史，有着像《论语》《老子》《周易》《诗经》那样古老的、深邃的、明哲的人生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传承。这些古代文字所代表的深刻思想，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孝敬、忠诚、诚实、顺服、忍耐、坚韧等等精神，对于社会、家国、人间道德社会的纲常秩序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显然的、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这些古代文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人生思考的重要助益，在人类历史上，绝不亚于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托勒密等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它们的重要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教益，就人类整体历史而言，仅仅次于圣经本身。

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是像西方文字那样是字母拼写文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辗转数千里，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方言，甚至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市、隔着大山的不同村落，都有自己的口音方言，但是，却“书同文、车同轨”。相比之下，西方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由于都是以字母拼写为形式，因此逐渐地，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平等的语言、邦国、文化体系。

中文的表意文字，相比于西方的拼写文字，虽然对于孩童来说更加艰深难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高文盲率，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文字出版和印刷自动化更加困难复杂，但是，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这个纽带使得整个大中华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断开的思想文化整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力极强的文化传承体系。

力量与真理

第二，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大量的碰撞、摩擦、互动过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与变化；但是，其实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未进行过真理层面的、坦诚的、直接的冲突与对话。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曾经多次是西方军事的手下败将，甚至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学生”、日本的手下败将，但是，恰恰因此，那些复杂的中国

近现代政治军事历史，没有导致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尊敬、重视西方文明，反而是，更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乃至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心态。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日之战、以及一系列的被迫开放国门的条约，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等等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内心伤痛、满怀屈辱。

这些复杂的、许多因素缠绕其中的、饱受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一方面让中国人对于当年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腐败官员、糊涂政治决策等等痛恨得咬牙切齿，另一方面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明治维新之后“以西方为师”的日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

今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见识过外面世界、内心诚实而开放的普通中国人心中，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很难调和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思想体系是璀璨的、是博大精深的，是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的，是文明的。看起来，西方文明中包含着很多好的“哲学”，很多好的思想、内容、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等等。因此，许多功成名就的家庭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常青藤大学去留学、接受深造，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可能忘记那些屈辱的近代历史，不可能忘记那些窝囊的战役、羞辱的条款，更不可能忘记，中国的大门正是被洋人的枪炮所打开的。换言之，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从道德意义层面而言，中国文明从未曾真正地被西方文明打败过。那曾经打败中国的，仅仅是枪炮与科技而已。这正如，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是华夏文明败于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败于满清八旗军队的时代，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因为蛮夷人有更高的文明、有更温良恭谦让的仁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野蛮而已。

虽然，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常常在表面上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良心深处中都知道，其实，强权、力量、武力，绝不简简单单地等于真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认为，中国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从未曾被真理打败过，而仅仅是被强权、力量、武力打败过。这样的历史，既绝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不好，也绝不能够说明西方文明好。恰恰相反，对于许多重视民族主义、有强烈家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好，西方文明不好。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分析所谓鸦片战争的复杂来龙去脉，也不必去探讨八国联军侵华的起源，而仅仅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探索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西方怀有敌意或蔑视，以及，这样的心态正确在何处，错误在何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第三，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当思考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文明体制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但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却从未曾认真地想到过、反思过、辩论过，在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泊、以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很少去认真思想，所谓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常常大而化之地以为，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就是那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些内心开放的中国人，还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律、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也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但一般而言，这就仅此而已了。

而关于西方文明的糟泊，中国人则常常误以为是，自由散漫、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吃苦，或者从更深层意义说，也包括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宗教专制、封建愚昧等等。在这方面，很多现代中国年轻人追随、仰慕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个人解放，甚至性解放、性自由等等。

简言之，中国人很少去深刻地、公道地、客观地研究，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甚至，中国人大多数虽然都听说过、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意义，但是，却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了解极少、乃至不知所云。

这固然是由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有机体，而绝非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内容一致的铁板一块；但也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历史的局限、现实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局限性等等原因，从而导致了，那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认知，还没有、或很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隔阂状态，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如此，即使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和台湾，也往往是如此。例如，我们从现代著名文化人南怀瑾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仍然有着很多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想，与实际的西方现状、文明状况等等，有着很大差异。

中国古代文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错

<u>第四，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来往等等过程中，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错。</u>

当清朝灭亡以后，很快就爆发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白话文书面语言的正式诞生与系统性普及。五四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要砸烂孔家店，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精髓，反对以孔子论语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思想。清末民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孔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实在痛恨和反感清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政治专制、政策愚蠢的局面。人们常常把这些专制弊端归因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但是，这种反孔子、反传统的情绪是肤浅的、也是短暂的；很快，到了1920年代以后，社会上就重新兴起了对于曾国藩等传统儒士著作以及整个儒释道中华思想传统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系统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们在切身生活感受上，仍然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把儿女送到海外留学的父母们，也不希望儿女因抛弃了传统价值，而失去了顺服、听话、孝敬、尊老爱幼等等品德。

人们在国家凝聚力上，仍然深刻地、警惕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加强和强调传统价值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在西方文明面前，抱以重视和尊敬的态度；反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而特别地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伟大意义。

凭什么因为需要尊敬别人的技术、需要学习那些技术，所以就要尊敬和学习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第五，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需要认真、勤奋、扎实、痛下决心地尊敬和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很少有中国人会怀疑。但是，很不显然的却是，凭什么因为要尊敬别人的技术，所以就也要尊敬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这正如，汉人在历史上曾经要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技术，但是，汉人却从来没有必要学习胡人的什么思想体系。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思想体系，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深邃，要远远地胜过胡人的思想文化传统。

换言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技术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学习和效法先进的技术，绝不等于要学习和效法别人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常识来说，都显然是正确的思路。正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深刻，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仍然刻下深深的烙印；——尽管，我们今天或许很少直接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们对待西方时的想法与政策方针。

对于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技术与科学是一回事，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之间并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联系不可。不但如此，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是那些不文明、野蛮的民族和国家，才往往长于技术，尤其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军事技术；而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和国家，则看起来，往往是和平的、是与世无争的；——至少，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眼中，就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都认识到、都同意，需要认真而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因此而重视和尊敬西方文明，——尤其是关乎道德意义上的文明而言。

凭什么一定要服气

<u>第六，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羞辱、挫折、失落，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们凭什么就要因此而在心灵里投降、就要因此而在西方文明面前俯身膜拜、就要因此而服气呢？</u>

难道，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没有坚强的脊梁吗？我们岂能有奶就是娘呢？我们固然可以接受和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科学、甚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管理经验等等，但是，难道我们接受西方，就等于要摒弃文明老祖宗的光辉而璀璨的文明礼制、思想传统吗？

如果说，当面对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当摒弃我们自己的文明思想体系传统，反而应当更加坚持和发扬那些古老的文明与悠久的思想、品德、信仰；——那么，这难道不就正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西方文明面前卑躬屈膝，也不需要在道德意义上重视他们、尊敬他们。

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

第七，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虽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深远而伟大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也很少有人同意、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科学技术与西方思想体系本身之间有着什么深刻的根源性关系。

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因此，若有人说，在科学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甚至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根源性的关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

所以，当人们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类的、对待西方文明体系所应当采取的策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点头称是。但是，当听说"现代科学的开启与爆炸性发展，与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深刻的本源性关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说道：——中国古代也曾经有非常璀璨的科学技术历史，并且，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信仰正是压制科学技术诞生的重大阻碍因素。

不卑不亢，亦或是应当俯视还是仰视？

<u>第八，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常常是有两种极端态度，而很少有中肯的、平衡的、不卑不亢、实事求是的、公道公平的态度。这两种极端态度分别是，主流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对西方文明抱着俯视的态度；而少部分中国人则抱着崇洋媚外、甚至试图要全盘西化的态度。</u>

一般而言，那些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体系熟悉并深感骄傲的人们，就越会以鄙视的态度、俯视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文明，甚至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反之，那些越是想要崇拜武力、喜欢时髦、看重力量、喜好外在物质的人们，则就越会以仰视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明，而把自己的中华文化看得一无是处。

上述两种立场，其实都不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明哲的心态。他们两者，也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在说什么。

直至今日，许多中国人都肤浅地把所谓西方文明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骑士精神、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百花齐放、自由烂漫等等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西方的那些故作高深的哲学，还有的

人喜欢西方的竞争与创新，更多的人则仅仅是把西方看作是物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已。

至于圣经、基督教信仰，很多中国人或是对此完全无视、忽视，或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息资源去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外延、历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演化有着什么深刻而内在的关系。还有的人，则简单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划上等号，大而化之地把西方文明体系看为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用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熟悉的那种念经敲木鱼的宗教观念，去看待和揣摩基督教信仰，甚至鄙夷地把基督教信仰看作仅仅是洋教而已，等等。

涉及到现实民主政治与权力斗争

<u>第九，在过去大约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重视、不尊重、不了解西方文明体系内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历着自古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动荡的政治现实与权力斗争，阻碍了知识分子们深刻思考历史、反思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u>

过去的一百八十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在专制政权的环境下，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本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性，为此，许多政治宣传内容就是有意识地进行反西方

的信息灌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对人思想的毒害影响至深，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事实与世界的真相。

麦子与稗子

第十，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家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

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

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

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洕、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

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

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人的罪

第十一，毋庸置疑的是，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骄傲自义、自私自利等等各样的罪性与罪行。因此，当人所属的原有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本能性地抗拒、排斥、反抗。

在人的心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自以为义；即，人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所属的团队是好的、正义的，包括自己的家庭、社群、祖国、思想传统等等。当人遭遇失败、挫折、落于下风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而很少会反思自己；甚至，人常常会迁怒于外界各样的因素；以仇恨、苦毒、猥琐、自私、自义、心骄气傲的心理去看待世界。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挫折和失败。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痛苦的反思与深省。

地上的国与神的国

第十二，当人的心背离上天、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系于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世人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圣洁国度和地上的国一样，充满外在的虚浮样式。

因此，这就往往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常常会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政治混为一谈；而且，会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些缺陷、不完美、不好的地方当作借口，对基督教信仰嗤之以鼻；并且，不但如此，反过来也对西方文明抱着蔑视的态度。

===
===
===
===
===
===
===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是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同的、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原则和战略战术。直至今天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没有去认真、谦卑、诚

实地去思想，西方人的长技究竟在于什么，其背后的原因、起源在于什么。

不但如此，直至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莫须有地、不实事求是地、不认真考察地、主观臆想地认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一股反对中国人的强大势力。【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在西方人反对中国人的历史中，固然有许多错误和弊端，但是，西方人往往并非是——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反对中国人，而是因为针对对方各样的错误言行而反对。】

因而，一百八十年以来，虽然屡败屡战，但是，中国人的战略出发点、战略原则、战略目标，从骨子里就一直是想要怎样制夷，——怎样打败、制服、压过那些西方来的“野蛮人”。

如果，中国人不深刻地、不真诚而诚实地面对客观事实（尽管客观事实或许非常复杂），那么，即使《大学》中所说的心诚、格物、致知，也必将令中国人羞愧。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结果是什么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进入了类似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改革开放运动。其中的主旨，仍然是类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

夷；只不过这一次在很多名义上都换了称呼，号称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然而，在骨子里面，中国仍然是抱着对于西方所谓亡我之心不死的、莫须有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出于当政者的政治私利而导致的政治性宣传和欺骗，也实际上与普罗大众的骄傲和排外情绪深有关系），在国内进行信息资讯的封锁与政治宣传，使中国人在内心思想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敌意越来越深。这样的罔顾事实、缺乏公正与公道的集体心态，必将把中国政治又一次带入崩溃与混乱之中，重蹈百年前的秩序崩塌的覆辙。

一战与二战的背景和起因；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争竞；（后起与先发之间的争竞；英美之间的和平争竞；英德之间的武力争竞）；法兰西共和国的动荡历史；等等

我们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在整体上就是无可指责、没有瑕疵的。事实上，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固然在过去几百年中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消除了很多地区与人民的饥饿、贫穷以及许许多多的疾病，给全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的清明政治；但是，在西方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许多麦子与稗子的人和事。

从十七世纪开始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革命，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如火

如荼的程度。然而同时，很多西方人在这样的科技革命运动中，开始变得不那么谦卑，而是变得盲目乐观、自信、自傲、自义。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都开始隐隐然处于一种非常骄傲自豪的情绪之中。首届世界博览会在维多利亚女王丈夫的推动下，在伦敦开幕。此时的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而欧洲的德国，则处于急起直追的状态。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人民自豪感情绪高涨。法国的人文主义哲学、甚至享乐主义，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张力，崩得越来越紧，谁也不服谁。

这样的状态与冲突，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原有的秩序世界被很大程度地改变。战败的德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欧各国的裂痕越来越深；这种局面终于在几十年后促成了希特勒这样人物的上台，并导致了规模更大、毁灭性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罗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并使得后来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深深影响了东亚、南美等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以及西方国家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关于西方国家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展、影响与现状，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中继续介绍和讨论）。

一战与二战的历史，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国家既非铁板一块，也非纯洁无瑕；而是，在西方世界中存在着复杂的元素、张力以及善与恶的成分。固然，我们必须要清晰地看到，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与人民文化中，有着大量的、美好的、良善的成分，并且这些因素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祝福【这些因素，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果实，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国家政治与人民文化中的缺点、缺陷、罪恶的成分【关于

这些缺点、缺陷、罪恶成分的复杂起因、机理，我们不应当主观臆断、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而是要仔细分析、谨慎鉴察、认真剖析】。

限于本书的篇幅与题材范畴，我们不在这里对那些各个方面的成分与元素一一进行展开阐述。

公义，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道德意义而言，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哲学的最大盲点就是，它几乎彻底地无视、忽视、甚至否定了公义。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下，真理变成了强权的丫鬟，道德变成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附属品；真理、公义、道德失去了绝对的、超越生死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思想观念，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政治面貌的发展是危害巨大的。这样的观念，不仅对于西方政治与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意义深远、危害巨大，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危害和影响也都非常巨大。这样的思想观念，多年以前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民，并产生出了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口号；直到今天，这样的思想仍然在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深深地毒害着我们的灵魂。

正义、力量、输赢、争竞、道德、与信仰

若我们仔细地观察与分析西方历史和现状，就会看见，在欧洲各国中同时包含着许多善恶、好坏、麦子稗子参杂的情况。那些善、好、“麦子”的方面，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些有益的、良善的影响，遍及世界，尤其是在过去四百年来给整个人类都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这些益处如此深远，以至于今天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得益于这些良善的影响，尤其是表现在科学与民主所带来的生活、教育、工程、交通、职业、平等、人权等等方面的改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许多恶、坏、“稗子”、杂草的方面。这些方面正是由于那普遍地存在于世人心中、也包括存在于欧洲人心中的罪。我们在欧洲的近现代历史中，能够清楚地看见，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之中，在英国的人文学术界中，常常会出现那种偏重于力量、输赢、争竞、好勇斗狠的文化。在欧洲内部，这种文化构成一种明显的张力，与正义、道德、信仰的力量，彼此进行拉锯战。正是由于这种坏的方面，导致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中的达尔文进化哲学，导致了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放荡奢侈的文化，导致了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土壤，导致了今天弥漫在欧洲的无神主义文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很多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时候，仍然把那些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混为一谈；或者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同倒掉、因噎废食；或者是，想要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甚至，以坏为好，以好为坏，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效法西方文明中的糟泊，丢弃西方文明中的精华。这就常常是过去一百八十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互动的历

史。这是多么令人遗憾、令人可叹。

当我们在口中喊着“取其精华、去其糟泊”的时候，最好要俯身、谦卑、低肩负重、认认真真地好好研究、深刻思索，真正地明白西方文明的历史、脉络、本质、与详尽而公正的全面信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泊，而不要望文生义、想当然、人云亦云，否则，结果就一定会南辕北辙，变成了“取其糟泊、去其精华”。

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固然在于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等等，在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更在于公义、正义、道德、基督教信仰。（西方的基督教会本身，尤其是天主教、东正教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关于“麦子”与“稗子”的人和事）。

而西方文明中的糟泊，则在于无神论思想和文化，在于人文主义中的进化哲学、达尔文哲学、存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否认个人的自由、尊严、以及个体生命本质中的高贵意义，否认人的心灵、灵魂、精神、超自然信仰的重大意义，否认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并应当真诚地寻求、敬拜、归向上帝】等等，在于好勇斗狠的争竞，在于功利主义、成败论英雄、自私自利主义，等等。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西方，以及西方的文明体系？我们既要谦卑而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从大局、全局、主流、以及其中的机理、机制、体系去

看，同时也要儆醒、谨慎、小心地从支流、细枝末节、各个方面、各个侧面、好坏兼有地去看。这样，我们才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才能够公道中肯，才能够真正从中得益。

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个巨大的麦田，那么，其中既有麦子，也有稗子。而我们应当怎样呢？是把麦子当作稗子吗？还是把稗子当作麦子呢？我们应当怎样认情本质、分辨主流与支流，分辨良善与罪恶呢？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西方社会文明体系整体呢？

我们所应当寻求、信靠、倚靠的对象，应当单单地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之主，应当是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赐我们永生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不应当以这世上任何被造之物、受造之人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所敬拜、寻求、倚靠的对象，而应当单单敬拜事奉我们的主。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并应当爱人如己。

信仰的见证，麦子与稗子，买椟与还珠

“买椟还珠”的故事是说，一个人去买珠宝，但是在珠宝商那里看见，那个包装珠宝的盒子看似很精美，但珠宝本身却看似朴实无华，于是，他把珠宝盒子留下，把珠宝还给了珠宝商。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这世上，有很多人并不认真地、深刻地、谦卑真诚地思考，而仅仅是看重事物的表面现象，仅仅是注重外在的华丽与虚浮，从而常常犯下非常荒谬的错误，以次为好，以好为次，有眼不识那重价的珍宝。

难道，在过去一百八十年的历史中，在我们面对西方文明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的固有思维模式中，我们所犯的，不正是这样的“买椟还珠”的错误吗？我们许多人仅仅是看见了那些船坚炮利的虚浮表面现象，就心生羡慕；我们看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物质文化，就急起直追；并且，在小有成就以后，就往往容易沾沾自喜、俾倪天下。——但是，我们不过就像是那个买椟还珠的人，以为自己已经买到了天下最华丽珍贵的东西，甚至骄傲自满、内心自高、自义；——然而，我们所作的，仅仅是愚蠢地把盒子当成了珠宝，却把珠宝弃之如蔽履。

固然，基督徒们的信仰见证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绝不应当把基督徒们的信仰见证，尤其是那种好坏参杂的、并不百分之百纯洁的见证，误认为是基督教信仰本身。我们应当仔细地分辨麦子与稗子，仔细地看清主流与支流，看清楚全局、大局、本质，也应当看清噪音、杂音、杂草。我们应当内心谦卑、诚实、求索，这样，我们才会有公道而公正的心；否则，我们的眼睛就会欺骗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就会被自己的诡诈、欺谎、私利、偏邪所绊倒。敬畏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

什么是我们应当想要的麦子，什么是我们不应当想要的稗子

麦子，就是那些关乎敬虔、真诚、恩慈、仁爱、喜乐、和平、圣洁、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有是来自于那真正的、真挚的、真理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只有是来自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上帝自己的启示。

稗子，就是那些关乎亵渎、亵玩、私利、暴戾、凶恶、残忍、不公不义、欺压、强迫、强权即真理、贪婪、好勇斗狠、为私利而争竞、等等的事情。这些事情，正是出于人生命与心灵中的罪性与罪行。这些事情，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毁坏；不是良善与幸福，而是死亡与战争。

信仰与功利主义

真正的信仰，不是心系于这个被造世界中的属世之利，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真正的信仰，不是人在心中自以为义，不是功德主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单单地因信称义；因为，人只有靠着上帝的白白恩典、救赎，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些以功利主义看待世事的人，一定会沉沦在自私自利的世界观体系中。真正的成功与幸福，一定是与圣洁紧密相连的。但是，人如果以为，看一件事情是否是正确，取决于这件事情在短暂的此世之中的成败输赢，那么，这样的人生观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人生观中，人看不见道德的隽永价值和真正意义，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与公义圣洁；这样的人，必将在这个世界中沉浸在罪恶深渊里，必将会在罪恶与暴戾中碰得头破血流。

想要得到什么，却失去了它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追逐成功与幸福，但是，他们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却常常是失去了成功与幸福。他们急功近利、功利主义、以成败论英雄、以力量论输赢、以力量论真理、以力量为价值判断的基准和出发点。然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与真理渐行渐远，与成功与幸福渐行渐远。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那根本、本质的事情，看不到道德的隽永价值，看不到信仰的珍贵意义。

目标与手段之间，可以割裂吗（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说开去）

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生之中，在许多事情上，尤其是在关乎真理的思想体系上，目标与手段是不可割裂的。否则，人们就会常常欲速不达，甚至南辕北辙。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如果是内心诚实、谨慎、谦卑的，如果愿意对这个问题仔细地深思咀嚼，那么，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想要得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采取的手段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的手段是正当、有效、正确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会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买椟还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关于如何看待西方文明的“两段论”】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

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

。。。。。。。。。。。。。。。。。。。。。。。。。。。。。。。。

。。。。。。。。。。。。。。。。。。。。。。。。。。。。。。。。

。。。。。。。。。。。。。。。。。。。。。。。。。。。。。。。。

。。。。。。。。。。。。。。。。。。。。。。。。。。。。。。。。

。

亚当斯密的经典自由贸易主义思想

以下引述http://www.ctaxnews.com.cn/2019-09/12/content_954805.html

亚当·斯密和《国富论》

2019年09月12日 来源：中国税务报
吴洁蕙

《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正式诞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除了反对重商主义学派和重农主义学派的观点，斯密在该书中还指出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并提出税收四原则。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生于1723年6月5日，卒于1790年7月17日，享年67岁，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亚当·斯密幼年敏而好学。1737年，年仅14岁的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学习期间，他对著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有着浓厚兴趣，这位老师的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对斯密影响巨大。1740年，斯密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被推荐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751年，他回到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任职期间，斯密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1762年，他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764年，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成为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此后，斯密陪同年轻的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3年的旅行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知名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的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阁对他影响很大。1767年，斯密结束了3年的欧洲之行，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开始潜心研究并撰写经济学著作，完成了《国民财富

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3月该书正式出版。

1787年，他正式担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1790年7月，这位终身未娶的伟大学者与世长辞。

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经典之作

斯密一生奉献的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好评如潮，它的出版使亚当·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

《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正式诞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著作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还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的内容，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评价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出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学理论——重商主义理论和重农主义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建立的道德体系为前提的。斯密的理论体系不但影响了马歇尔、凯恩斯等经济学学派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还启发了一些经济学家采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这位印度经济学家在著述中反复阐明了斯密的贡献。在经济学界，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经济学家。自2007年开始，亚当·斯密的头像出现在英

国20镑面值的钞票上。

《国富论》的主要观点

十八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阶段，特别是在斯密出生的英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其财富增长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变化。

批判重商主义学派。《国富论》为人们描述了当时欧洲主要富国的财富增长途径，针对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大量储备贵金属的重商主义政策进行了经典的反驳，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重商主义强调“贸易逆差是亡国之兆”，而斯密却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其生产长期不能满足消费，才是真正的衰亡之源。在未来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因重视工业革命，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获取大量殖民地成为世界霸主，而曾经的殖民枭雄西班牙和葡萄牙因储备大量金银的政策而抑制其农业、制造业发展，导致两国逐步落后。

批判重农主义学派。斯密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不赞成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高度重视，明确提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斯密认为四种不同的资本运动方法都可以推动生产性劳动，并能增加国民财富。其中，农业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最强，其次为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一国的富裕程度与其产业结构紧密相关，而产业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要素的流动，特别是资本的流向。斯密对于18世纪的中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国富论》中，他多次提到中国，并指出当时的中国因为过度重视农业而忽视开拓海外市场，因而制造业的生产力大大受到限制。对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各国市场较小，大多致力于对外贸易，其制造业和商业较为繁荣。

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约束，实际上却是由“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进而造福整个社会。据说，斯密曾在《国富论》的扉页上写过：“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只做一个守夜人。”斯密认为国家的作用应在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建设并维持公共事业和某些公共设施，保护国民不受其他国家侵犯以及教育国民。后世许多国家建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权，都受到斯密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扮演“守夜人”思想的深刻影响。

支持自由贸易政策。斯密认为，由于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作用，重商主义政策并不能有效留住财富。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国家之间各取所需，才能促使财富真正持续稳定地增长。他指出，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可能过分强调某种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而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事实上，通过国家分工和自由竞争，让资源自然流动，让资本自由配置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斯密还首次论述了汇率的波动和结汇币种会对贸易收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后人形成了极大的启发。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国际贸易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并带来全球财富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国富论》功不可没。

提出税收四原则。财政问题对每个国家而言都称得上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斯密对国家财政的相关论述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一是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原则，提出国家的职能。二是反对因为公共债务的增长而增加税赋，担心因国家税赋过重而导致商人及工厂主将货币资本转移到国外而对本国造成危害。三是认为偿还国债及维持政府日常开支需筹措资金，其主要来源是赋税。并提出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广泛推崇。其具体内容如下：

1. 平等原则。斯密在书中写到，一切公民，必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缴纳赋税，以维持政府。这里突出的是纵向公平，按能课税。他主张税收“中立”，政府少干预经济，多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2. 确定原则。斯密主张国家不能随意改动课税规则，应按照法定原则，明确税收征收制度。在他看来，税收不明确给公民带来的危害远大于税收不公平所带来的危害。

3. 便利原则。斯密认为，税收的征纳手续应该简便，特别是在缴纳时间、地点及缴纳形式上，都应尽量为纳税人提供便利。如缴纳时间应选择在纳税人收入丰裕的时候，缴纳地点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缴纳方式可采用货币形式，以避免纳税人因运输货物而增加额外负担。

4. 经济原则。即税务行政效率原则。斯密提出，一切赋税的征收，应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得的收入。

（引文结束）

。。。

亚当斯密的盲点

在亚当斯密的贸易经济思想中的本质是，人类应当、也可以通过相互协作、分工合作、社会化大分工，来共同增进富裕程度。这种思想，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基础和精髓，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性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世人心中，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地、没有嫉恨地、彼此信任、通商贸易，彼此平等地互相对待、相互合作、共同富裕。

如果这个假设性前提条件不成立，那么，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贸易法规环境，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互通有无、进行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

自由贸易必须需要一个公正、成熟、稳定、可预期的、透明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如果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剑拔弩张、发动战争、互相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那么，从根本上说、从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就不可能进行。

而显然，这种公平正义而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唯有是建基于世人心中的公义、正义、平等、诚实、信实，以及对于法律、秩序、规则的遵守和敬畏。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政治法律环境往往是在民主制度的政治框架下所提供的。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法律规则秩序环境，从长期而言，唯有是建基于整个国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境况、以及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如果人们在信仰中是虚伪的、轻轻忽忽的、玩世不恭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羡慕嫉妒恨；如果人们藐视规则与秩序，既贪婪、又喜欢偷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蔑视那些说话算数、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人们凡事都用计策，不是三十六计，就是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如果世人的心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虔的信仰，信奉"人至贱则无敌"；如果在人间道德世界中，真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所谓的自由贸易，不但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反而，会激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仇恨甚至战争，进而导致生灵涂炭的灾难。

在现代经济学理念中，人常常被看作是自私的、为了谋求自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动物。

但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国际的层面而言，上述现代经济学理念却存在

着一个重要的盲点，即，它看不到，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待在秩序规则的笼子里面，以诚实守法的辛勤劳动、以宁可吃亏也不说谎的诚信态度，来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不是以狂野不羁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见缝插针的方式，来取得财富。

在一个秩序规则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中，或许，那些狂野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行为，会很快受到惩罚；因而，这样的犯规行为并不常见。

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随着秩序法规越来越疏于坚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社会中许多人信仰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虚伪、徒有其表，终有一日，秩序规则体系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崩解，从而，自由贸易也会随之消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或是在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敬虔信仰、没有对于法律规则秩序的遵守和敬畏、没有诚信与真挚的道德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就不会有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式的自由贸易机制。

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环境中，从国家、社会、国际层面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深刻地尊重两点。

第一点是，人们必须由衷地、从心底深处，真诚地尊重、遵守、敬畏秩序规则体系，而不是——处处喜欢要小聪明，把别人的诚实和诚信，当作是愚蠢；把自己的诡诈，当作是智慧。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应当是如此。

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从根本层面、终极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应当把人类世界看作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主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世界，而应当是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公义、正直、恩慈的世界。

第二点是，在国际关系之间、国家内部关系等等之中，大多数人们必须有一颗诚实的、信实的、“爱人如己”的心灵。

所谓“爱人如己”是指，在人类中间，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有博爱的心。这种博爱的情感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中应当关爱他人，就像关爱自己一样。

请注意这里，并非是否定、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而是强调，我们应当关爱别人，正如同我们关爱自己。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始之处所引用的圣经话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

6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甚么呢？

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

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7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

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8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甚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马太福音22章：

37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38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40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上述两点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
++
++

当我们思考亚当斯密思想以及自由贸易理念的时候，尽管我们应当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理念可以导致社会化大分工、人类社会之间彼此增进密切协作、互通有无、交换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得人类社会整体真正财富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我们也应当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思想和理念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它既不一定是促进：基督教信仰与道德良善，也不一定是损害：信仰、敬虔与良善。

因而，当英美等西方国家人士面对自由贸易这样的一般性理念、试图大幅度促进自由贸易的经济活动的时候，无论是社会中第一种组成部分、还是第二种组成部分、亦或是第三种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全体往往都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的共识。

信仰敬虔的人，对于自由贸易乐观其成，因为看到了其中能够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富裕安定以及对于贫困人口的纾解。没有敬虔信仰、甚至唯利是图的人，也愿意投身于自由贸易，在其中获取丰厚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当英国国会针对关于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法案进行投票的时候，国会最终以极为微弱的优势结果通过了开战决议。

第一，鸦片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仅仅是被当成一种产自东方的止痛或麻醉药剂，但其危害却还没有被人广泛知道。只有少数的、曾经对中国内地人的生活有熟悉了解的西方人，才会亲眼看见或亲身经历地知道，鸦片对于人身体和精神的损害性。而在当时，由于清朝的基本上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因而，外国人不能与中国人密切来往，不能学习中文，更不能进入中国内地，所以，在英国等西方国家，社会上除了很少数人知道鸦片是一种止痛剂以外，绝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鸦片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

【这种状态，随着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逐渐开放口岸经商的政策，随着自由贸易的进一步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并开始熟悉广大普通中国人民的生活，西方人对于鸦片的危害性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直接了解。】

【因此，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的鸦片种植、生产、贸易的强烈反对呼声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英国商人们所转卖贩运的这些鸦片商品越来越少。】

【但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鸦片贸易在清朝政府被合法化，所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经商人士们种植鸦片、以及在东南亚购置鸦片、贩运到中国国内。到二十世纪满清灭亡以后，在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华东时期，鸦片贸易在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内，被控制和减少。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铁拳统治之下，中国的鸦片贸易才得以彻底清除。】

第二，鸦片战争【以及后来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战争和争执，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为反击慈禧太后与西方各国无缘无故的宣战、反击义和团围攻杀害西方驻北京外交使团等等而侵入并占领北京，等等】对于英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最主要的并非是关于鸦片这种具体商品的贸易问题【英国政府官方从未曾把中英鸦片战争称为是“鸦片战争”；在英国官方的眼中，以及中英双方所进行的一切谈判中、和所签订的所有协议中，此次战争的焦点都是在于，怎样能够使得中国改变其闭关锁国、封闭贸易的做法，而与西方实行开放、自由、平等、公平的贸易政策】，而最主要、最根本地是关于中国一般性地拒绝开放贸易、或是缺乏公正司法体制等等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即使在林则徐禁烟、硝烟运动中，虽然其行动的主旨、动机、行为、后果等等是正当的、正义的，但是，林则徐作为饱读四书五经的科举儒生，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做事方式，并非是法律程序的正义、司法审判与控辩双方的公平与公义性，而是充满了自义、把自己当成正义化身、把对方当作是小人、或十恶不赦的罪大恶极之徒，用颐指气使、铁腕镇压的政治治理方式来处理问题，而缺乏韧性、周全与智慧。林则徐的根本思想动机，首先是从自义、忠君、维护统治政权与统治阶级利益而出发的。林则徐正确地看到了鸦片贸易的巨大危害，但是却没有看到、或是故意忽视了，一般性开放贸易所能够带给黎民百姓生活的巨大益处（例如，丝绸、茶叶、陶瓷贸易对于福建、江浙、江西相关产业人民的巨大益处，以及西方机械技术、制造技术等等、如果进口到中国市场来以后，对于中国百姓的潜在巨大益处等）。林则徐固然认识到，鸦片贸易极大地损害了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他或许更加在意的，是鸦片贸易使得中国政府失去了大量白银（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以丝绸、茶叶、陶瓷贸易等赚进大量的银钱），而不利于清朝政府的政权统治。】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清朝政府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在1840年以前的一两个世纪中，从来没有考虑过扩大贸易、促进贸易、鼓励贸易、增进黎民百姓

生活等等问题。在中国的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在中国两千年儒家政治伦理的框架下，在中国的消极、出世的佛道世界观、信仰观的间接影响下，——中国政府所考虑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根本动机，就是怎样维护政府、政权、官员们的地位和统治稳定性，而不是普通人、尤其是贫困百姓阶层的利益。

第三，那么，在鸦片战争中，哪一方是正义的呢？还是都不是正义的？为什么？不正义在何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人应当总结和领悟到什么？应当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应当怎样看待西方？应当把我们的心灵系于何处？我们的精神、信仰、盼望、真理，应当在于什么？

鸦片战争所代表的，是一场东西方之间由于极其复杂原因而导致的冲突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显然，双方都有不义之处。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涉及到双方之间不同的价值理念、政治体制观念、正义观念、利益观念、平等观念、等等。

英国一方的不义之处是，英国内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在互相角力过程中，在唯利是图的不良商人的游说影响下，以激进好战的态度处理对外事务的政治力量占了上风。从而，英国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开战的决议。很多英国国会议员们没有深思和仔细考察鸦片贸易的是非曲直，没有认真地谋定而后动。

英国的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平等贸易的主张和诉求，本来是有着正义的、合理的、合情的重要成分；并且，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即使对于整

个世界而言，自由公平平等的贸易诉求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自由而开放的贸易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潜在的利益【事实上，1840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序幕正式拉开；中国正式地进入了近现代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转型与变革的阵痛，但是，我们今天抚今追昔、回顾过去180年历史的时候，任何有着良知与诚实态度的中国人都应当认识到、并承认，近现代化历程所带给中国的，好处大于坏处，利益大于弊端，进步大于退步，福祉大于灾祸。这些变化，从中国医疗条件的改善、总人口的巨大幅度增加、人均寿命的增长、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教育与识字率的极大提高、婴儿夭折率的极大降低，等等等等，都能够清晰地显明。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因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的大幅度发展，而使得中国能够不断地消化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医疗技术、与生产管理等先进知识的成果、收益、福利、等等等等】。

但是，英国对中国所展开的鸦片战争，却包含着重要的不义成分。历史已经清晰地显明，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对于人的精神与身体都有着巨大的危害。在1949年以前的一两百年中，鸦片摧毁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与家庭。清朝政府的禁烟运动，固然有着控制白银外流等现实原因和动机；但至少在政府官方文件上，早在鸦片战争几十年以前，清朝政府就正确地指出了，鸦片作为毒品（所谓“娱乐消费品”），是有害于人的，因此应当禁绝。从这个角度而言，毋庸置疑的是，林则徐的立场、禁烟的政治政策，是正义的。

如果，英国政府在中英关于鸦片贸易的冲突中没有袒护那些唯利是图的、经营鸦片贸易的英国不良商人（例如怡和洋行的创办人）；如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是发生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时间与场合下，是纯粹关

于贸易的公平性、公正性等原因本身（并且假设中国政府毁坏的英国商人私有财产，不是鸦片这种东西，而是其他中性无害的商品）；如果，鸦片不是一种害人至深、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的商品；如果，英国在战争中的动机和出发点，仅仅是为了保护合法正当、公平合理、有益于人的贸易诉求与商业利益；——那么，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或许——就会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近现代史观念，就会轻易地认识到英国与西方文明体制的先进性，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清朝政府的腐朽衰败性，等等。

然而，真实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没有假设。

从这真实的、但复杂的历史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一方面，英国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与科技文化等等许多理念的背后，尤其是在其正面的、文明的、精神信仰的内核中，的确有值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应当认真虚心学习的重要之处；另一方面，我们也更应当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心灵所倚靠的对象，我们所应当寻求和归向的信仰、真理、精神、灵魂，不是什么盲目的、纯粹的"崇洋媚外"，而是——真诚、热忱、谦卑、诚实地来到那宇宙天地之主面前，来到那创造了世界以及我们生命的造物主面前，来到那全能、公义、至善、恩慈的上天、上帝面前，寻求他、倚靠他、敬畏他。在这世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世人生命与灵魂的造物主自己；我们所仰赖和寻求的，不应当是世上的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而是那把生命赐予人的上天自己。是他，以阳光雨露和草木万物，养育了一切西方人与东方人；是他，把公义与良知放在我们每一个世人的心中；更是他，把无尽的公义良善与慈爱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并能够有理性的思想、诚挚的情感、敬虔的信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 马太福音5章】

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

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

大。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
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
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
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
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
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

让他打；
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
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
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
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1840年至1900年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正向我们显明了，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基石、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原理，并非是我们所应当寻求和倚靠的终极真理。

固然，自由贸易理论，如果是在适当的政经社会环境中运行，那么，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物质性财富、给世人带来许多物质性的福利；——但是，我们的心灵，只有在天父上帝那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之中、在圣经、上帝的话语、旨意和启示中，才能够寻求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才能够明白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真理。

自由经济贸易本身，固然不一定会阻碍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但是，也并不一定会促进基督教信仰的见证与传播。

。。。。。。。。。。。。。。。。。。。。。。。。。。。。。。。。
。。。。。。。。。。。。。。。。。。。。。。。。。。。。。。。。
。。。。。。。。。。。。。。。。。。。。。。。。。。。。。。。。
。。。。。。。。。。。。。。。。。。。。。。。。。。。。。。。。
。。。。。。。。。。。。。。。。。。。。。。。。。。。。。。。。
。。。。。。。。。。。。。。。。。。。。。。。。。。。。。。。。
。。。。。。。。。。。。。。。。。。。。。。。。。。。。。。。。
。。。。。。

在此期间，孟德斯鸠、卢梭、约翰洛克、伏尔泰、雨果、培根、牛顿、波义耳、清教徒、敬虔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等等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诸多西欧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影响

自从1840年，中国开始被迫地开放了国门与通商口岸。从此，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大幕开始掀起。从此，西方世界体系的科学、技术、理念、经济、贸易，如同潮水一般地涌入了中国。在这其中，泥沙俱下，好坏参杂，精华与糟粕并存，良善与罪恶的事情同时显现在世人的眼前。

与此同时，从十七至十九世纪，西方世界本身也在经历着飞速的发展、巨大的动荡、深刻的变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约翰洛克《论政府》，为现代西方政治机制与法律体系奠定了理论性的、革命性的基础。培根《大变革与大复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波义耳《怀疑派化学家》开启了现代科学体系诞生之序幕。清教徒运动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与兴旺发展，催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君主立宪政治制度改革。在马丁路德、加尔文等领导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的巨大影响下，欧洲兴起了敬虔主义；许许多多的基督教改革宗的宣教士们走遍天涯海角、全球各地，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福音传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

然而同时，在欧洲大陆，也不断地兴起着背离神、背离信仰、背离圣经、背离敬虔信仰的一波又一波风潮。以伏尔泰、雨果等一大批文士为代表的、以世俗化情感为导向的、高举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文艺复兴、理性主义等等大旗的、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成为了后来所谓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运动的先锋。他们是今天西方世界中所谓“白左（白人左派）”的鼻祖。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包括法国与德国在内的各个欧洲国家经历了许多政治动荡、暴乱；许许多多的欧洲人在人文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大旗下，成为了自然神主义者、泛神主义者、怀疑论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乃至赤裸裸的无神论主义者。逐渐地，他们离开上帝、离开圣经、离弃基督救恩，越来越远。

同时，在西方各个国家之间、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各个不同的种族之间、各个不同的地区之间，不断地充斥着此消彼长的政治角力、甚至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战争。无神论主义、达尔文进化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战乱与风暴，不断地侵蚀着世人的心灵，使世人的心灵远离圣经、上帝的话语，远离敬虔的信仰。

这种信仰层面的角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张力、争战，一直在西方世界持续，直至今日。甚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连续发生了两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详情请见《论民主》《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美国故事》等书籍）

。。

人权与公义

1840年至1900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百味交集的历史。一方面，从这个历史阶段开始，中国人的思想开始缓慢地进入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民贵君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另一方面，在这个历史期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经历了极其严重的挫败、屈辱、失丧、动乱、风暴。中国就像是一艘又老又破的大船，在疾风暴雨中，摇摇欲坠。

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泥沙俱下，好坏参杂，精华与糟粕并存，良善与罪

恶的事情同时显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个时代，让许多普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人权、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让无数中国人饥渴地寻求公义、真理；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广袤的世界与环宇。

。。。。

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在每一个人的良知之中，都知道、并且渴望那些公平、公正、公义、正义的事情；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渴望寻求意义与真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的灵魂与生命，都是来自于那位无限伟大的造物主的创造和赐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常常背离那伟大的造物主、生命之主，不愿意寻求那伟大的上天、那圣洁的天父、那无限伟大、至善至美、公义与恩典的上帝。

罗马书1章相关经节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罗马书10章

弟兄们，我心里切切盼望的，并且为以色列人向　神祈求的，是要他们得救。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对　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见识；
他们既然不明白　神的义，而又企图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　神的义了。
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
论到出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
但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领下来，）
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
然而那出于信心的义还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信息。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
经上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失望。"
其实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厚待所有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然而，人还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
如果没有蒙差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多么美！"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但是我要说，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的确听见了，如经上所记："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说：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吗？首先，摩西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不是子民的生嫉妒，对那无知的民族起忿怒。"
后来，以赛亚也放胆地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
论到以色列人，他却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子民伸开双手。"

。。。。。。。。。。。。。。。。。。。。。。。。。。。。。。。。

。。。。。。。。。。。。。。。。。。。。。。。。。。。。。。。。

。。。。。。。。。。。。。。。。。。。。。。。。。。。。。。。。

。。。。。。。。。。。。。。。。。。。。。。。。。。。。。。。。

。。。。。。。。。。

基督教信仰在此期间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5%90%91%E5%89%8D%E8%BF%88%E8%BF%9B-%E4%B8%AD%E5%9B%BD%E5%AE%A3%E9%81%93%E4%BC%9F%E4%BA%BA%E9%A9%AC%E7%A4%BC%E9%80%8A/）

“向前迈进!”：中国宣道伟人 — 马礼逊
(A)　　顽石为主开!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石头啊! 石头啊! 石头啊! 你几时才为我主开放呢?” 这是意大利大主教耶稣会(Jesuit)东方监督华理南(Valignani)于1606年间在澳门去世之前,遥望着中国大陆而发出的呼声. 远在他之前半个世纪, 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因不得进入广州而同样痛心疾首,卒至老死于海滨一个孤岛上(上川岛). 一直以来, 中国是不开放门户给世界人士的.[1] 然而, 住在这封闭排外的万里长城之内的, 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 他们失丧的灵魂也是主所宝贵和珍爱的! 为了拯救他们, 主派遣一位比铜墙铁柱更硬的人, 将此“顽石”破开, 使内中的人得见福音的亮光.
此人就是基督福音宣道事业的开山鼻祖 —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B)　　童年与得救

马礼逊于1782年1月5日, 生于英国的诺森伯兰郡(另译“那森伯兰”, Northumberland), 据说出生地点是在温盖村(Wingates). 父亲本是务农

的，但由于一只脚患病，便全家迁居纽卡斯尔(另译“纽卡素”，New Castle)，改行当撑靴器的工匠，生活相当清苦. 童年时期的马礼逊与许多当代小孩一般，每日上课时间极少. 他早年须跟父亲学习工艺来帮补家用. 虽然他不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学生，但他十分勤勉，苦心攻读，以致勤能补拙. 他的记忆力非常之强；年仅12，就能背诵旧约最长的诗篇 — 第119篇(共176节)，且一字不差. 马礼逊也是一个精于观察的孩子，透过与人相处，与自然交往，获得不少学识.[2]

约在15岁时，马礼逊真正悔改，归主得救. 他描述当时的心情：“恐惧死亡的心情，把我重重围困了，我向上帝痛哭大呼，祈求赦免我的罪孽,使我心灵得到更新.罪孽已成为一种负担了. 就在那时我经历了生命的变化，相信也是心灵的变化. 我立即与一班闲散放荡的同伴疏远了，而自己投入于读书、默想及祈祷，使上帝喜悦. 将他的圣子显明给我，那时我亲尝‘幼年的恩爱和婚姻的爱情’的经验.”(注：指与主相爱如同沐浴爱河般的甜蜜)[3]

(C) 宣道的呼召

早在马礼逊年青时，海外宣道的迫切需求已深入心中. 17岁时，他因读到《传道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另译《宣道杂志》)和《宣道杂志》(The Missionary Magazine，另译《传教杂志》)而大受感动，立即告诉父母他宣道的渴望. 不过，母亲不舍得她最宠爱的这个幼子远赴异国. 基于家庭关系和对奉养母亲的责任，马礼逊答应在母亲有生之日不作远行，直到年老母亲于1802年离世，他都留在母亲身旁，早晚服侍.

无论如何，1800年底，马礼逊开始对将来的生活计划重新作出检讨. 他慎重考虑献身事奉主，为神的教会服务，所以便对于自我教育和装备作出较有系统的准备. 自1801年6月起，他开始向黎德罗牧师(Adam Laidlaw)学习拉丁文，学费全由微少的工资积蓄而来. 关于这时的学业，他记载道：“我

不知道结局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上帝喜欢我在世上生存的话，等到有他所赐的机会，我愿意为基督的福音服务．”[4] 分别为圣和装备自己，是蒙神使用的第一步！

1802年11月24日，马礼逊的母亲去世不久，他正式向鹤士敦学院(Hoxton Academy)申请入学，准备接受传道训练，以献身于宣道事业．在这之前，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志愿书，向自己提出种种自省的问题．他在书中提到：“我真的有细心考虑前途如何吗？抑或盲目前进、冒冒然担此大任呢？我思想过为人牧者的性质是什么？自己将来成为代表基督的大使吗？… 我将来不因责骂、迫害、饥饿、赤裸，甚至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而生出悔意，中途退缩吗？… 我将来会不单永远归从基督，且为耶稣的名而死吗?”[5] 这些都是每一位立志献身全时间宣道的信徒所当发出的关键问题．

马礼逊被录取后，于21岁生日的第二天抵达伦敦．隔天，立刻入学上课．上课之余，他也在伦敦巡回传道会(另译“伦敦巡行播道会”，The London Itinerant Society)安排下，常到郊外村落传道．在这学院两年期间，虽然亲友纷纷请他打消宣道念头，他却这样记述：“耶稣啊！ 我已舍弃自己为你事奉了．不过，我的问题是：我要往哪里服事你呢？我知道你曾教众门徒去天下万国传福音．主啊！我愿意前去最需要这种工作的地方．也许有些地方比较艰难的．无论到哪里去，我自觉都是不合适的．然而，若得到你加我力量，我便感到没有不能办得到的事了．主啊！对于这事求你引导我啊！请令我能够估计代价，得个决定，然后坚毅实行．”[6]

1804年5月27日，马礼逊向“伦敦宣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另译“伦敦会”)申请成为海外宣道士．在申请之前，他写了一封有力动人，且真情洋溢的家书给反对他海外宣道的年老父亲，大意是说：“父亲啊！我既然舍弃自己而成为主的仆人，我应当热诚从事于任何工作 — 甚至最危险的亦不畏惧．希望你能同意我的看法．我不怕什么，只怕

违背主的心意.”[7]

(D) 宣道的禾场

在很短的时间内, 马礼逊的申请被接受了. 他随即被派到戈斯波特(或译“高士坡”, Gosport; 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市)的宣道学院(The Missionary Academy)受训. 他在那里住了14个月, 觉得非洲与中国均是可能事奉的区域. 最初, 他是偏向非洲. 他本希望加入帕氏(Mungo Park)这个团体, 参与他们第二次远赴非洲的旅程. 可是这个团体在途中遇险, 马礼逊逃过大难. 其后, 有许多事件显示中国乃是上帝特别为他选择的宣道禾场.[8]

在1798年3月7日, 有位名叫莫塞莱(另译“莫士理”, William Mosley)的牧师印发通讯, 发起“设立一个会社, 以东方人口众多那民族的文字翻译圣经”. 他也在这之前写了有些文章, 强调“翻译及印行中文圣经之重要”. 其中一份文章就落到戈斯波特(Gosport)宣道学院的院长濮固博士(Dr. Bogue)的手中. 他深受感动, 写信给莫塞莱表示赞同他的建议, 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应当首先开拓的地区. 濮固博士较后向马礼逊表示他是赴华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在濮固博士的影响和多方的祷告后, 马礼逊看清中国乃是上帝预备给他的宣道禾场, 便坦然顺服主的旨意.[9]

1805年, 莫塞莱与马礼逊会面. 他们同去造访一位名叫容三德的中国青年. 彼此商讨后, 容君答应迁居到马礼逊家中, 教授中文. 两人合力抄录博物馆的全部圣经译稿, 另行抄录由皇家学会借来的中文字典稿件. 马礼逊把要学习的中文字写在一块铅板上, 可随意抹去, 随时再写.[10] 他勤奋刻苦地学习中文, 盼望有朝一日能将整本圣经译成中文, 使千万中国人能明白真道.

(E) 到中国开荒

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终于由盖里港(Craresend)启程，先到美国纽约的港口，再转航前往中国. 途中船上失火，因为有些盛满硫磺的瓶爆开了. 幸好其他船员即时将那些瓶子推入海中，全船才得免于难. 马礼逊饱尝了8个月多的艰苦航程，终于在1807年9月7日(星期日)安全抵达中国广州.[11]

马礼逊抵达广州那天，美国洋行的大班兼驻广州美国领事贺灵敦(Carrington)立刻请他住在自己的寓所中. 但马礼逊觉得住在豪华的寓所不符他俭朴的本性，所以决定搬出，独自住在一个小房间里. 他在日记上写道:“我知大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金钱也是属于他的，不过我尽自己所能，希望不需要浪费而能传播福音.”米怜后来所著的《开首十年之回忆》描写道:“最初，他吃中国饭菜，与他的中文教师一同用膳. 他的生活方式异常俭朴. 晚上所用的只是一盏瓦制的油灯. 而树立另一本书在灯旁用来挡风. … 他留长指甲，一如中国人. 他脑后垂辫，进食则用筷子. 他穿上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街道上行走.”[12]

1808年，英国派遣大队军舰驻守澳门，广州当局强烈抗议，停止供应伙食，结果英国人被迫离开广州前往澳门，马礼逊也不得不随行. 他到澳门后结识了莫顿博士(或译“莫敦”，Morton)和他的家人. 马礼逊与莫顿博士的女儿玛丽(Mary Morton)情投意合，互相眷恋. 1809年2月20日，马礼逊在澳门与玛丽结婚，并在同一日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请 — 聘他为公司的翻译员，年薪5百元. 但严厉的考验接踵而来. 因工作的需要，马礼逊每年得离开澳门约6个月，留下爱妻独在澳门，心中必是非常难过. 不久，玛丽怀孕，但有病在身，马礼逊的长子一出世便夭折了. 面对丧子之痛的马礼逊还遭到当地华人反对他安葬亡儿，经过几番商讨，才在澳门极北的山峰上找到一块安葬之地[13]

不仅如此，他还得经历同工的误会之痛. 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的消息传到

伦敦后，误会及谣言四起 — 说他放弃了宣道大业. 其实马礼逊之前已向伦敦宣道会清楚解释他受职的理由：(1)他可以安全居留中国，有公司名义的掩护；(2)这职务(翻译员)对他学习中文大有帮助；(3)所得的薪金可以减轻英国教会对宣道工作的经济负担；(4)可以灵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再仇视传教士(宣道士)，因为他们看到传教士现为公司服务. 马礼逊举出理由后，也请伦敦宣道会董事们行使职权，“取消或承认他受职的事”.
[14]

马礼逊结果留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直到1815年左右才离开这公司. 除了执行公司翻译员和各种繁忙事务，他在其他时间都致力于宣道重任，勤学中文，翻译圣经与其他书籍，甚至编著文法和字典等.[15] 虽然公司董事和同事们对他个人热心于传道事工而诸多批评，加上中国政府持有仇视态度，然而，他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 引用他自己的话，他“向前迈进”，具有如米怜所说“不容征服的耐心，从不疲惫的勤奋，战战兢兢的谨慎”.[16]

马礼逊无法像一些伟大的布道家如英国的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或美国的慕迪(D. L. Moody, 1837-1899)一般，借着公开布道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信基督. 由于政治和宗教因素的限制，马礼逊在中国只能私下传讲福音，以生命来见证基督. 然而，他默默耕耘所结出了果子，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中国首位华人基督徒蔡高(又名“蔡亚高”)就是常听马礼逊的讲道而深受感动，悔改归主. 马礼逊也于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的一个溪流中，为这位当印务监工的信徒施洗.[17] 此外，马礼逊也栽培了中国第一位传道人梁发. 他于1810年在蔡兴(蔡高的长兄)的印刷所任职雕板工人，由此认识马礼逊，也因此听信福音. 1815年5月，梁发随米怜到马六甲协助印刷工作，并于1816年11月3日由米怜施洗. 马礼逊于1823年12月回英国前，按立梁发为宣道士(牧师)，所以梁发被认为是中国首位华人宣道士和牧师.[18]

当马礼逊在澳门的日子，天主教教士因反对基督信仰而不许中国人教他中文，并暗中左右亲天主教的葡萄牙总督反对基督徒宣道士. 不久，因着惧怕葡萄牙人和清朝官吏(当时澳门是中国与葡萄牙共同管治的)，他的教师、助手及仆人都逐渐离他而去，他只好终日幽居自读，却毫不沮丧. 他在写给伦敦宣道会的书信中写道："我知道，古时上帝的仆人在幽暗牢狱中的种种工作，照亮了后代. 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些效用. 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虽有时候感到失意、孤寂，马礼逊仍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向前迈进.[19]

因着清朝官吏、天主教和葡萄牙政府的反对，马礼逊无法自由地在公开场合宣扬福音，传讲真道. 但这一切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这种敌视的环境逼使马礼逊的事奉着重于翻译、书写和印行书籍的工作. 马礼逊发现这方面的文字事奉决不逊于口传事奉. 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识字读书的人民，以印刷品宣扬基督教(基督信仰)知识的功效等于口头的演讲. 而且在世上许多地方，用这个方法较为容易. 只须几位教师，借印刷所帮助，即可以传播知识到远方，就等于许多的教师而无印刷品一般."[20] 他孜孜不倦地默默耕耘，终于成功在1819年译完整本新旧约全书.

1821年，马礼逊的爱妻去世.[21] 马礼逊在马六甲的好友同工米怜也于隔年(1822年)离世，这无疑给他双重的打击. 然而，米怜在离世数星期前写了一封信鼓励马礼逊. 内容提到："借上帝的帮助，您已经做了一件大事，是中国一切的帝国(朝代)、官吏、祭司、文士与人民所永不能打倒、毁灭及终止的，而且必会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及拯救许多人的灵魂. 亲爱的朋友啊！切勿灰心失意啊！试想有多少忠诚事奉的人，在他们撒手归天之际，竟不能享受现在十分一的荣耀哩. 愿永恒神的膀臂呵护您."[22] 面对丧妻丧友之痛，马礼逊依然"向前迈进"！马礼逊在中国事奉主长达27年，虽然他在这些年间仅给10多人施洗，但他预料在100年后，要有1千人领洗. 不料神的恩典奇妙，100年后在中国竟有30

多万基督徒.[23]

(F)　　一生的贡献

(F.1)　翻译中文圣经

在翻译中文圣经的工作上，不少学者主张圣经的文体应该模仿中国的经典，采用经典式的文体(即深奥文言)，但马礼逊因有远见而力排众议，坚持要使圣经成为通俗的民众读物，所以决定采用《三国志》的文体(即浅白通顺的文言)．这项决定是明智的，有助于圣经的流通和广传．决定了文体后，他即开始翻译圣经．1810年9月，他将三本新印好的《使徒行传》寄回祖国．1811年9月，他又把译好的一本《路加福音》和所印的一份宣道小册寄回去．此外，他也致力于编著《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及《英华字典》等书.[24]

在关于刻印所翻译的书籍，马礼逊遇到最可怕的困难．早于1812年间，清朝政府已有严令："凡刻印中文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刑部奉皇谕颁令："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洗礼)，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洗礼)，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至黑龙江)."然而，马礼逊并不畏惧停歇，继续照常译经，并进行印刷．基于印刷基督教书籍是危险的，中国印刷工人用尽种种巧计来避开侦查及刑罚；例如印刷《使徒行传》时，他们以一条假的题签黏在封面，以作掩饰.[25]

马礼逊与翻译圣经的事工

靠着神的恩典，马礼逊于1813年出版新约全书，并在1819年11月25日把整本新旧约圣经译成中文,[26] 经过细心修订后，于1823年在马六甲印刷. 1824年5月，马礼逊亲自把印好的中文圣经在“圣书公会年会”上献上. 美国历史学者濮友真教授(Eugene P. Boardman)认为马礼逊的译本是第一部中文圣经(新旧约全书)，而马礼逊是第一位中文圣经翻译者.[27] 在翻译的工作上，马礼逊自己提出的两大翻译原则：(1)忠于原著者的意思及精神；(2)文字上，务求诚信、明达及雅典.（后者即是中国翻译名家严复所订定的“信、达、雅”三字诀，大概前者即包括于“信”字中.）马礼逊提出的翻译原则，无疑是翻译工作的金科玉律.[28]

(F.2)　提倡中文研究

1817年，即马礼逊在中国宣道10周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承认他的中文工作之价值，特别赠予神学博士名誉学位. 1832年，马礼逊到中国已有25年了. 他写了一篇报告书，书中提到：“25年前的今日，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宣道士)独自来到人地生疏的中国. … 初时，人人都以为学习中文是不可能克服的难事. 这难事现在已成过去了. 我终能学懂中文，而且知道可借其他方法继续学习. … 字典、文法、字汇的编著及种种翻译,[29] 都已完成及印行了. 外界的中文学者在国内国外已日渐增加，或为世俗或为宗教的目的. 从今以后，中文将不再让人轻弃了.”[30]

1823年12月，马礼逊离开广州归回祖国，并于1824年3月20日抵达英国. 他为着推动设立东方语文学校而延期回华. 在社会名流赞助下，这一所学校终于可以开办. 此外，他也到处演讲有关中国的问题及教授中国语文. 他又在海克尼(或译“赫尼”，Hackneg)的家中开设一个妇女中文研究班，而且提倡组织一个“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期望实现派遣未婚妇女到外国去. 值得一提的是，入读这个班的妇女当中，有个名叫欧德施(Aldersey)的女

士. 她开始学习中文时, 才19岁, 过后成为第一位前往中国内地的未婚女子. 他也极力提倡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设立中文讲座. 这个请求虽得到理解, 但未立刻生效.[31]

简而言之, 在欧洲提倡研究中文的贡献上, 马礼逊可谓劳苦功高. “他在中文取得的成就已成为当代欧洲中文学者中的第一人. 其后有理雅各博士(先领导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后迁香港), 翻译《四书》为英文, 后出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 此后, 传教士(宣道士)的汉学家辈出, 如英国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湛约翰; 美国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卫三畏等, 有直接受他培植的, 或有间接受他影响的. 时至今日, 中西文化沟通成绩卓著, 实由马礼逊开创先河, 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不朽的成就”[32]

(F.3)　开创医药宣道事业

英国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副校长贝尔德博士(Baird)也认为马礼逊所印行的作品大有价值. 贝尔德博士自己正收集资料写一本全球贫穷苦难的历史, 所以写信请马礼逊助他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儿、疯狂者的详细数目, 及用什么方法照顾他们 — 用国家税、或者用地方税作救济费等.

关于此事, 马礼逊得到公司所聘用的李文斯顿医生(或译“李温士敦”, Livingstone)代作详细的调查. 结果李医生写了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 发表在《中印拾遗》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 这刊物是马礼逊和米怜两人合资出版的, 另将此篇文章直接寄给贝尔德博士. 这事间接令李医生致力于中国医药的研究, 由马礼逊代为购入8百卷中国医药书籍, 过后李医生和马礼逊两人更合作开设一间诊疗所, 专为中国人治病. 他们还聘请了一位擅长中医药的华人助手, 这成为在中国施行医药宣道事业(Medical

Missionary Work，另译“医药传教事业”)的先驱.[33]

(F.4)　扩展其他宣道事工

他不单对中国的宣道事工有大负担，也渴望将福音传到亚洲其他地方. 他常梦想、计划即献议在亚洲其他地方发展宣道工作. 他曾建议在槟榔屿(即现今马来西亚的槟城)设立一个传道站(传教站)，作为到中国的踏足石. 他也组织了(印度)恒河外宣道会(或译“恒河外传教会”，Ultra-Ganges Mission)，以扩展宣道的事业.[34]

1813年7月4日，神为马礼逊预备的忠实同工及终生挚友米怜(William Milne)及他的妻子抵达澳门. 当时身在澳门的马礼逊对他们的到来喜出望外，可是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因着天主教教士们从中作梗，于次日下令米怜必须在18天内离开澳门. 米怜只好乘船“偷渡”进入广州. 米怜在广州住了4个月. 他和马礼逊觉得大有另寻地点设立传道站的必要. 1814年初，米怜南行游历马来半岛各大城，分派新约给中国侨民，并物色一个合适之处作为中国宣道士的居留地. 到了马六甲，英国长官花卦上校(Col. Farguar)成为他工作上的挚友. 那年9月，米怜回到中国，与马礼逊详细讨论全局形式. 结果在1815年4月，米怜夫妇前往马六甲，在该处建立基地.[35]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旨在栽培中英文学已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米怜出任首任院长，马礼逊则为永久董事.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校舍举行奠基礼，由马六甲英军司令花卦上校主礼. 校舍内有课室、教员寓所，及中英文印刷所等. 就在英华书院印刷所，马礼逊所译的第一本中文圣经 — 名为《圣书》的新旧约全书 — 得以面市. 除了印刷圣经，这书院印刷所也印行《中印拾遗季刊》(The Indo-Chinese Gleaner)、米怜所著的《开首十年之回忆》、有助于学习中文的《中文初阶》、柯利(另译“贺理”，Collie)所译的儒家“四

书”, 以及其他宣道小册等等. 马礼逊于1823年到访马六甲时, 也有一段时期暂任英华书院的驻院牧师, 同时力助各宣道士学习中文. 他在过后也努力于改善校址, 不惜自解私囊, 慷慨捐助. 据说他捐出半数积蓄来资助此书院及差会工作.[36]

马礼逊不仅关怀中国的宣道事工, 也常以邻国日本为念. 他在“恒河外宣道会”计划书第15条写道: “我们深愿关怀那重要的岛屿 — 日本, 尽量采集与她有关的一切消息, 而且一有可能即准备派人前去学习日文, 并考究圣经中文译本应如何修订或改译, 然后流通该国, 或确定是否必需日文译本.”有关这大志愿, 伦敦宣道会(另译“伦敦会”)议决: “赞成所提出的第15条全文, 并强调献议付诸实行.”[37]

(G) 高尚的品格

马礼逊不以本身是科技较优越的英国人而高傲, 藐视中国人. 他说道: “中国人有许多是文化高优, 学问丰富的, 不单不亚于我们, 反而比我们更优胜.” 他虽不满当时清朝官吏的颟顸腐化及市侩冷酷无情, 但对于一般中国人民则以基督的心为心, 一视同仁, 爱护与帮助备致, 一如对待欧美人士, 因此他说: “我立定宗旨, 将自己贡献给中国人.” 最初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执照而厉行自由贸易新政策, 他早已料到这制度的大变革必引起严重的后果, 便说: “但我祈祷使这事有利于中国, 不单只是有利于英国的, 因为我不是那一类的爱国者 — 要靠损害人家来尊大自己. 我不认为基督信仰(基督教)认同这样的爱国主义. 然而, 一般讨论自由贸易的人, 有几多会以中国的幸福着想呢?” 这几句话表现出他的正义感、人道感, 确是超越了国家种族的界线, 而能在国际间实践“爱人如己”的基督遗训. 这真是基督信仰(基督教)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的典型.[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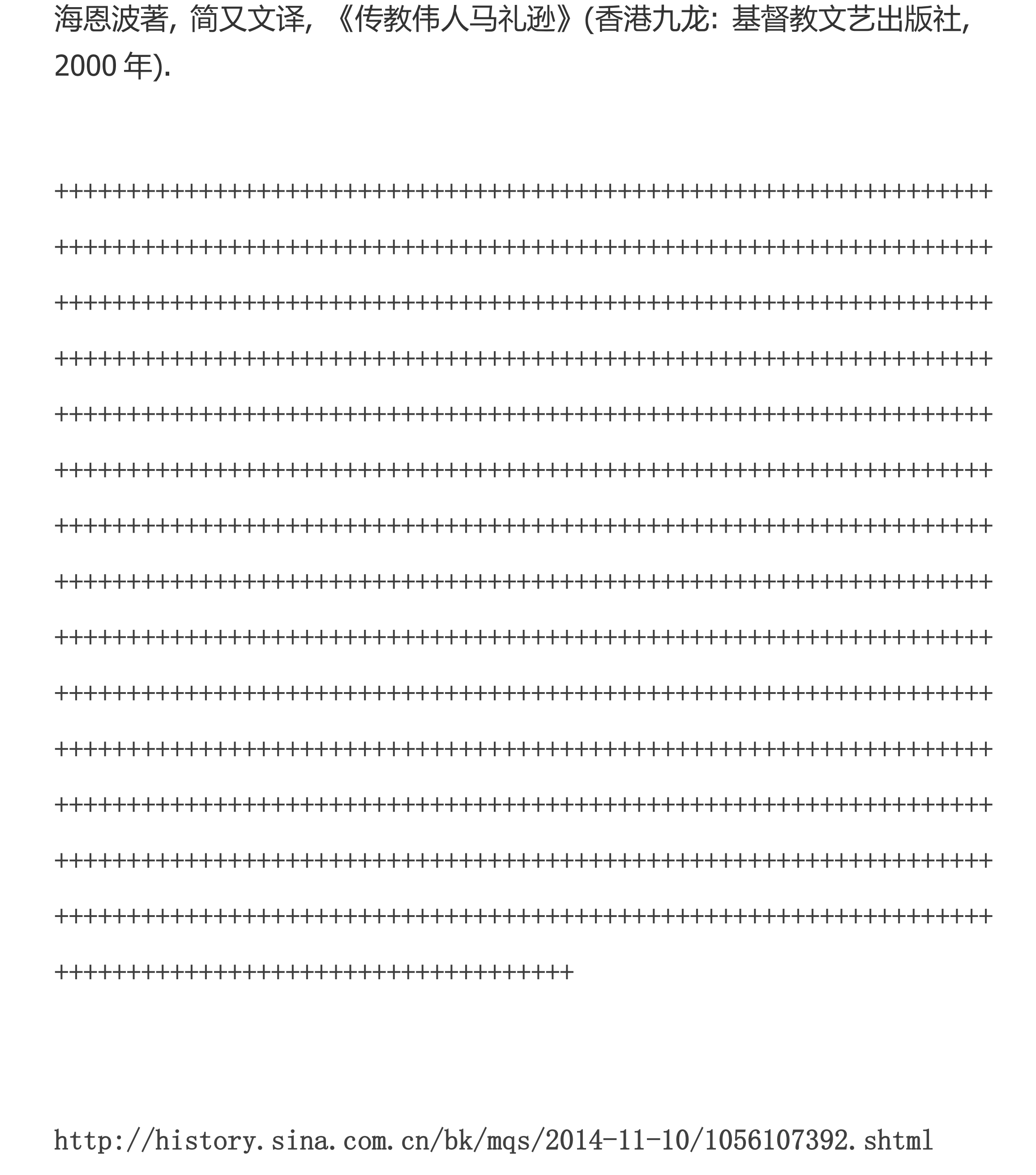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评论他道: “他是属于质朴忠实那一类人, 外

貌不算好看，不善装饰… 然而，他并不是缺乏才智机警与真知灼见的，而他所著的文章则满载关于传教问题的智慧语句，直到今日仍可奉行. 他有双方兼顾的能干而不偏于友人或敌人一面，更有劳苦工作和安心等候的韧力，直等到最后的彻底胜利. 他谦逊为怀却又刚毅勇猛；他热诚于心却又审慎周密；他胸襟宽大却又不肤浅浮薄；他勇敢而又绝非鲁莽. 他心志健全而又果断合度，且常以全心尽忠于基督. 他的生命标志是宗旨坚定，忍耐到底，及不屈不挠的毅力恒心. … '不问荣辱，不顾毁誉'，他不断致力于所指定的任务. … 他传流给世界'刚直与永恒'的性格."[39]

(H) 总结

1833年12月，马礼逊与妻子和五个儿女离别，带着长子离开英国乘船回广州去. 他在船上写信给妻子，结尾时写道："我立定宗旨将整个自己贡献给中国人，特别是贡献给圣经，一如以往的决心."[40] 回到广州，马礼逊又投入文字的工作，但由于体弱，越来越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礼逊因多年的劳苦而病倒. 1834年7月，他的病势垂危，延至1834年8月1日，星期五晚上10时，这位至死忠心的主仆终于歇下地上的劳苦，永享天堂的福乐. 有人叹惜马礼逊因工作过劳以致寿命减短，死时年仅52岁. 不过，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虚度！他工作的果效存到永远！这使到他在世短少的生命在永恒赏赐的亮光中变得可贵，永不言悔.

"这个辛勤的工人已停工歇息了，他的工作却延续下去. 他已遵从上帝的旨意，为那一个时代服务，如今终于瞑目了，然而他的生命是永远受用到将来的. 不错，他的《英华字典》现已以更好的姿态出现，而他所翻译的圣经亦已经有多种的修订本了. 然而，在这些后起之秀中，他的工作依然存在，好像初播的谷种永远生存于以后的收获中."[41] 是的，马礼逊正"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林前3:10).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九龙：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 年).

+++
+++
+++
+++
+++
+++
+++
+++
+++
+++
+++
+++
+++
+++
++++++++++++++++++++++++++++++++++++

http://history.sina.com.cn/bk/mqs/2014-11-10/1056107392.shtml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鸦片战争前天朝的真相

1807年，这位英国人冒着极大风险入华传教， 并留下了这个强盛帝国

在巨变前夜的斑驳记载—— 其中很多被后人视为天朝崩溃的诱因。

1807年1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从伦敦启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转道纽约时，一位美国商人带着一丝嘲讽问他："您真的相信，您能改变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吗？"那位虔诚的基督徒答道："不，先生，是上帝要这样。"

事实证明，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个上帝都会挠头的地方。马礼逊很快发现，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有一个专制王朝的傲慢与偏见。

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仅留下了第一部中文版《圣经》和第一部《华英字典》，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意味更加深远。

在马礼逊诞辰232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文字，看到天朝强盛外表下的另一面。

危险的事业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伯兰一个简朴的农家。由于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马礼逊自幼便受到熏陶，17岁那年，他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1804年5月，他向伦敦传教会申请成为传教士。

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是伴随欧洲工业文明的曙光兴起的，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和独特的文明，都对西方教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805年，伦敦传教会决定委派马礼逊到中国开辟新的教区，马礼逊欣

然接受了任命，并悉心地准备自己的中国之旅。

当时，有人去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常看到这位青年坐在里面非常用功地看书，书上的方块字奇特而让人无法辨识。于是此人忍不住走过去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文字？为什么要读它？年轻人回答，这是中文，是一种非常难懂的文字，但就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促使他去钻研。

经过8个月的旅行后，1807年9月8日傍晚，马礼逊抵达了目的地广州。岸边货船装卸的喧闹，河上民船来回穿梭时，船民们的大声喊叫，都让他感到极度兴奋。

然而，理想很快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负责迎接他的美国领事及英国商人，都不约而同地提醒他，“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要住在中国及请中国老师教授中文有多么大的困难。”

19世纪初的清朝，执行的依然是雍正时期便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活动是被严厉禁止的。帝国的统治者们相信，一旦臣民们信奉了洋教异说，清廷的法令就难以实行，政权的合法性便难以维系。如同乾隆皇帝在《四库全书总目》序中说那样，西方宗教“悠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

1805年12月，也就是马礼逊来华前不久，嘉庆皇帝刚刚重申，广东省务必禁止一切传教活动，除了商人以外，一律不准外国人在澳门居留，有内地百姓暗中接应的，应当惩办。这是“整风饬俗之要务”。

因此，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一开始，他试图从衣着打扮上变得更像中国人，以期待和百姓打成一片，他练习用筷子吃中国饭，穿中国人的衣服。他按照中国人的姿势写汉字，

这弄得他两侧肩膀非常疼痛。甚至于，他在头上挂了一根辫子，并且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手指甲留得老长——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不讲卫生的习惯。

但他很快察觉，这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他跟其他外国商人不是一个圈子，于是他又像其他外国人一样，穿上了白外套。

另一个麻烦随之而来，正如马礼逊一开始被告诫的，学习中文是危险的行为。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

马礼逊好不容易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这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准备一旦被当地官府发现，随时服毒自尽。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

就连中文书籍，马礼逊也是偷偷买来的，有一次，他的男仆和人串通，在买书时诈骗了他30元，马礼逊明知真相，也只得接受。

令他更为不解的是，他发现自己要教中国人学英文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在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学英文，只有少数中国商人跟西洋人学会了一些英文商品的名词，能够与西方人贸易往来，就以此为满足了。这似乎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中国人见到我们时称我们是番鬼，他们认为我们很奇怪，尤其当我坐下来用中文同他们谈话，非常好奇，年轻的中国人此时会有意举止轻浮，表现不敬重我。"

停滞的帝国

1809年，马礼逊受聘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从而终于获得了一个在华居住的合法身份。他在写给教会的信中心境复杂地说道，这项任命首

先可以使他居留在中国，也可以促使学中文，当然也有薪水。但是这项任命不利之处在于，这将占据他很多时间，从事与传教无关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权宜之计，马礼逊一边担任公职，一边暗中翻译《圣经》，并向身边的人们布道。

成为了译员，意味着将和更多的官员打交道。中国官员的优越感显然比普通百姓更强烈，在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后，马礼逊认为“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由于中国和东印度公司发生了贸易纠纷，1816年7月，英国派出了一个以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与北京的宫廷调解。马礼逊被任命为随团成员。这使得他有幸得到了一次一睹天颜的机会。8月12日，英国使团船队抵达了天津，第二天出席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马礼逊注意到，英国特使和传教士只能坐在非常低的垫子上，而皇帝的随员则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上。

双方随后就觐见礼仪开始了一场长达八天的谈判，英国特使被要求使用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中方表示不强求这些礼仪了。但是，又催促使团立即动身赶赴北京，英国人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抵达了皇帝所在的圆明园，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服，就被领到了大殿门外。

英国人提出，经过了一夜行程，使团已经过于疲劳，要求延迟到第二天会见。于是一位中国大臣进入殿内启奏皇上，说英国特使病了。皇上恩准其休息，并派了一位御医来看病。御医发现英国特使并没有病，回去如实禀告。这触怒了嘉庆皇帝，他随即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解释真相。

嘉庆随即降旨要求使团立即离开，这次中英谈判宣告夭折。后来，皇帝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革去了相关责任者的官职，但中方没有就此次事件对英国人做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使团离开中国的当晚，派人赠送给英国人三件礼物，称为“赠品”，也收受了使团三件礼物作为回礼，称为“贡品”。

与它的傲慢相比，这个专制政权的执行能力令人生疑。1809年底，马礼逊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提到，整个夏季沿海的中国海盗船不断在广东沿海烧杀抢掠，有数千居民被海盗杀害，有时在广州城的总督府都可以听到海盗放射土枪的巨响。但是中国官府的水师战斗力非常差，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广州府曾请英国人协助剿灭海盗，英国人表示只要中国总督正式提出请求，他们可以协助，但中国方面却再也没有下文了。

另一份相关记载是，1822年10月2日晚上，广州外国商行以北的一家中国糕饼店突然失火，并蔓延到所有外国商行。破晓前，马礼逊连忙用中文写求援信给总督府，要求派人来推倒危险房屋和维持局面，到了凌晨5点钟，又写了两封求援信给中国官员，同时又写了一封直接送往两广总督处，但中国官员竟然无动于衷。火灾最终导致数千间房屋和商号被焚毁。事后总督说，他没有收到马礼逊的来信。

这个帝国似乎处于全方位的停滞状态中。在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时，马礼逊在序言中写到“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或士大夫的目的是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政府的目的就是……选拔优秀的人才担任官职，来统治国家。知识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等，都不在政府的考虑之内。”

事实上，这个帝国也并不像它表面上这样自信。据马礼逊记载，1814年，中国北方发生叛乱，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这是天主教徒煽动的，导致

朝廷下令秘密调查澳门天主教与葡萄牙人的动向，还颁布谕旨，禁止百姓阅读民间小说，因为小说内容常常讲述“官府压迫与百姓反抗的故事”。

权利与义务

或许是因为社会的停滞，在马礼逊眼中，中国人对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在广州见到的那样，在路边和市场的摊位上，随处可见摆放着出售不加遮盖的干巴巴的蔬菜。当地有一位名医，看病基本只用一种药，就是大黄，这位医生姓王，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大黄王”。当马礼逊在当地开设了一个诊所后的几个月内，广州周边地区数千个病魔缠身的人涌入这里。

另一种懵懂来自于法律制度上的，1822年，一艘英国兵船的水手与中国海岸上的居民发生了争斗，有中国人被杀。总督府要求英方交出凶手，根据中国的法律判处死刑。但英国人否认自己的人在此次事件中有罪。一些中国商人建议英方息事宁人，他们甚至建议英国指挥官，就说他们的船上有两人失踪了，这两个人就是凶手，因此也就没有引渡可言了。而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有效，也是十分荒唐可笑不能采用的。

随后，马礼逊参加了对中国政府的谈判。他首先承认，在欧洲国家里，外国人犯了杀人罪，应当受到居住国法法律审判，但是他不认为在中国应当如此，

“对两个国家，或两个人而言，双方都各有权利与义务，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言，也各有其权利与义务。可是中国人却不承认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地服从中国的法律，在其法律中不给外国人以任何实际的保护……事实上，中国的法律是由坐在公堂上审讯的县官高兴而任意解释和判决的”。

马礼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1820年末，他写道，最近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的一位官员持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据闻凶手已经潜逃，而中国官员前来调查时，发现船上有人自杀，便认为凶手就是那个自杀者，草草结案，“这种奇怪的法律模式却绝对有效地执行了。”这场谈判以英方的获胜而告终，凶手最终没有被交出来，而两国之间因为此次事件受到影响的贸易往来也恢复了。

这项开“领事裁判权”先河的事件，往往被后人视为传教士“侵华”的铁证。在远赴中国之前，他曾说：“中国人有许多受到较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他们不会在我们之下，只会超过我们。”而在1824年，当他回国进行公开演讲时，这种评价变成了“中国人对落水即将溺毙的人无意去施救。他们虐待家奴和妻妾。中国政府的公堂里，对尚未认罪的男女严刑拷打”。

无独有偶，马礼逊的好友，1793年曾随马嘎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也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在1824年写给教会的报告中，马礼逊用耐人寻味的口吻，中国人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我们基督教新教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1826年5月，在英国休息了三年后，马礼逊重新启程回到了中国，并在这里工作到了1834年病逝为止。他被安葬在澳门。

七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文明的尝试终究被武力侵犯替代。这一年，一败涂地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拥有80万军队，而进犯

中国的英军只有7000人。

这些苍白的数据，仿佛都是一个专制王朝的昔年旧梦罢了。

+++
+++
+++
+++
+++
+++
+++
+++
+++
+++
+++
+++
+++
+++
++++++++++++++++++++++++++++++++++++

https://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iography/morrison.htm

神所使用的先锋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梁以宁

寄居时期：1782 — 1834
在华时期：1807 — 1834

马礼逊可算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先锋中的先锋”：他是第一个到华的“更正教”宣教士，翻译了第一本华人采用的“更正教”新旧约圣经；给第一位信徒施洗，按立第一位华人牧师。

1807年，马礼逊环绕地球大半个圈，从英国来到语言、文化、风俗，完全迥异，神秘而叫人心生畏惧的中国。他依靠神，强忍一切从外、从内而来的压迫与阻难，完成圣经翻译。立志在事奉岗位上尽忠，直到见主面。这种爱神、爱人的悲壮情操，马礼逊这个名字，对我们这些现代信徒，便不再陌生了。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出生的时候，正值英国致力开拓航运、殖民地和对外贸易的时代。东方大国是中国，这个国家有着当世先进的文明，其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却不为西方所认识。她的大门紧闭，皇室及官吏，对外排斥，自满自大。
那又是 一个冒险的年代，充满着机会。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于英国那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父亲来自北方的苏格兰，双亲均是敬虔的基督徒。少年时候的他，放任妄为，几误入歧途。早年曾在一母舅的工厂做木屐铁圈工作，又曾加入旅行剧团，周游各地。重生得救后，勤读圣经，参加聚会，探访病人。17岁时有机会阅读当时两份有影响力的宣教杂志，内心萌生到海外宣教的渴望，只是他是八兄弟姊妹中最幼的一个，母亲最为宠爱；所以母亲去世后，才为未来作宣教士准备一切。1804年，他申请加入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很快获得接纳。马礼逊本想加入一个非洲宣教队伍，其后有多项印证，向他指示神是要把他安

排到中国去。

恶劣的传福音环境

马礼逊接受了到中国的挑战。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前往中国。当时，中英贸易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利。因为利益关系，该公司不愿意用旗下船只接载宣教士到中国，中国也不欢迎西教士。马礼逊唯有取道美国，转乘中立国的船只，环绕大半个地球才能到达中国，行程亦要花上九个月。1807年9月马礼逊抵达广州，时维清嘉庆12年，当时的马礼逊才25岁。

那时，中国政府对外人行使许多严苛规条，外国人只许留在特定地方，即广州城外珠江北岸一小块区域。在那_除英国外，还有美国和荷兰共13个洋行。广州“十三行”即是这些洋行的遗址。洋行雇员的女眷亦不许住在广州，外商只好将家眷安置在当时中葡共管的澳门，但进出澳门都要缴纳苛重的人头税。外人又不许学习中文，违者学生和老师都会定罪。在此排外的心理下，传福音更是严格禁止。东印度公司除不许员工传福音外，亦不许马礼逊为其员工举行崇拜，唯恐被误会举行非英国国教的礼仪。澳门亦非“更正教”宣教士易居之地，因为有天主教教士的难阻。从这些背景可知，当时马礼逊希望在中国宣教，是何等难以起步。

工作的转捩点

1809年2月20日是个大喜日子。这一天马礼逊与住在澳门的玛丽小姐结婚，同日接受了东印度公司聘请他为翻译员的聘书，意味着从此可以明正言顺在广州居留。当然，同时受聘于差会及东印度公司，身份角色冲突，容易受到猜疑；但马礼逊已有心理准备，为了留在中国，完成使命，只有这样做。

加入东印度公司果然受到差会的质疑，马礼逊唯有去信差会解释。他说：“我曾经将我受聘的种种理由奉告：（一）令我可以安全留居此地（得公司名义之掩护）；（二）此职务大有助益于学习中文；（三）所得薪金可以减轻英国教会在传教工作上之经济负担；（四）也许可令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再仇视传教士，因为传教士现正为公司服务。”

在实际生活上，马礼逊还要忍受另一种烦恼，就是公务及事奉繁重，而圣经翻译却是他的首要任务，还要编写介绍信仰的小册子和单张。此外，他又负责编写《华英字典》，

和一些有关中文文法的书籍，以帮助西方人学习中文；所费心神，实在不少。

这位给人形容为“严肃又毫无幽默感”的宣教士，像铁人一般，勤奋埋首工作，每日十多小时，渐受本地人爱戴，称他为“马老师”。不过，马礼逊心感“一心事二主”之难，盼望到南洋一个较自由传福音的地方事奉。主听了他的祷告，1813年，他的同工米怜牧师和夫人安抵澳门，从此成为马礼逊生活、工作和属灵上的知己好友。

由于澳门禁止米怜牧师居住，马礼逊就差派他们往南洋一带，顺道携带翻译好的新约圣经2,000本、《真道问答》5,000本及其他宣道小册一万本，在华侨间散发，并寻觅适合作宣教总部的地点。米怜夫妇后来在马六甲建立了“恒河外传教会”，在马六甲、爪哇、安保拿、槟榔屿及新加坡一带，做了很多福音工作。在马礼逊的倡议下，米怜在马六甲创建了英华书院，自任首任院长。书院兴办印刷业务，出版传教期刊和书籍，在传教及培训人才方面，均开创了新局面。

马礼逊一心只希望中国人信主，印刷书刊只视为一种有效的传福音工具，

绝没想到对中国近代的报刊及印刷业，起了发扬及推动力量。马六甲的传福音基地出版了基督教第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The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米怜创办，以报纸形式出版，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先驱。马、米二人又自资出版了英文刊物《中印拾遗》（Indo-Chinese Gleaner），在欧洲发行，介绍中国、南洋一带的福音需要，在欧洲甚具好评。马氏在澳门亦自行出版不定期护教刊物，担任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志乘》的撰述员，在他的专栏内传福音、论述宗教道德，甚至言论自由。

先锋者的艰难脚步

或许有人说马礼逊在“直接传福音”这层面上，无甚建树，来华七年（1814年）才有第一颗“福音果子”，那是帮忙印刷新约的工人蔡高，马礼逊为他施洗成为第一位“更正教”基督徒。后来又在1823年按了第一位华人牧者梁发牧师。

马礼逊来华传教，由于家眷不能留在广州，经常要受分离之苦；没有家庭生活，经常担心妻儿的情况。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即在澳门去世。妻子玛丽体弱多病，所以有六年时间，要携同两名子女回英养病。1812年，她返到马礼逊身边后未几即与世长辞。再过不久，其好友兼“战友”米怜亦逝世，成为他一生中极艰难的时刻，因为不但丧失了伴侣，也失去了同工。

1824年，马礼逊来华16年，卒得回国。在英国两年，马礼逊推动设立东方语文学校，又提倡组织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差派未婚妇女到外地宣教。马礼逊亦不时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及教授中文。南北奔走，风尘仆仆，以口以笔为中国的传教事业呼吁。1826年马氏举家返华；马礼逊知道东印度公司一日享有对华贸易的专利，英国的宣教士都不能来华，于是写信给

美国公理会的国外传道会，呼吁他们差派宣教士到中国来。也许神的时间亦到，要增派祂的仆人来华，在马礼逊写信前的数星期，该会在纽约开会，并募捐了一笔钜款以备差派传教士到中国。再后来，美国的差会真的差派了裨治文及雅裨理两位牧师到华，他们在中国各有成就。

鞠躬尽粹 死而后矣

马礼逊立志要死在工作岗位上。此时，52岁的马礼逊身体已呈不支，第二任太太亦体弱多病，必须回国休养。马礼逊虽然依依不舍，亦决定送妻儿回国，自己和大儿子马儒翰则留在中国。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终因久病离世，死前仍不肯放弃工作。他的遗体与元配妻子同葬于澳门。

时至今日，马礼逊所译的中文圣经，甚至《华英字典》已为更好的版本所取代。不过他的成就是独特的，因为这位“先锋人物”在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开展宣教，逝世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刚好结束。1842年发生鸦片战争，西方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宣教士得以在多个城市自由传教，并使用前人，例如马礼逊所留下的资料和中文圣经，不像马礼逊到中国前，什么中文资料都没有。而马礼逊这位“开山先祖”，在中国及南洋一带打开了传福音的“缺口”；神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上。

参考资料：

1. 《传教伟人马礼逊》，海恩波着，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7年三版。

2. 《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着，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9年三版。

3. 《地球村》网页： http：
//hk.geocities.com/joseph82dec/malishun.htm

4. 《维真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

最早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牧师(1782-1834)

一、家世与童年

1782年1月5日生于贫穷农家，父亲是教会长老。十七岁决志献身于海外宣教，母亲去世后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二、遥远而封闭的中国

1807年来华，历时七个多月，于9月7日抵达。

三、四面楚歌的日子

无论在澳门或广州，都无法享受平静安全的生活。

四、受聘于东印度公司

受聘的理由为：第一，可以安全居留；第二，有助于学习中文；第三，所得薪水可减轻差会的经济负担；第四，可以消除东印度公司对宣教士的仇视。

五、聪明的工头

从1807年到1834年，只回英国一次，不愧是一位「聪明的工头」（哥林多前书3：10）。墓碑上提及三大贡献：编印英华字典、创办英华书院、翻译中文圣经。

1834年8月1日病逝于广州，葬于澳门。

六、迎接2007年

来华两百周年，值得隆重纪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戴德生

（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BE%B7%E7%94%9F

戴德生（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原名詹姆斯•哈德森•泰勒（英语：James Hudson Taylor），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来华传教士，中国内地会（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戴德生在华51年。他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及建立了125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 of work）。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也在只有很少的传教士穿唐装的时代已穿起中国服装。在他领导下，内地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阶层、单身女性、不同国籍的个人吸纳成员。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19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历史学者褟嘉路得（Ruth Tucker）总结其一生："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昔传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 "

生平

少年时代

戴德生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巴恩斯利，父亲戴雅各 (James Taylor)是药剂师，一个卫理宗的平信徒宣教师（lay preacher），母亲是贺美亚（Amelia Hudson）。戴德生年少时离弃了父母的基督教信仰，1849年他17岁时读到一本传教小册后，决心归信基督信仰，同年12月决定献身为传教

士去中国传教。此时他与爱德华·克伦宁医生（Edward Cronin，首批往巴格达传教的普利茅斯弟兄会传教士之一）接触。一般相信戴氏的“信心传教原则”（faith mission principles，简称“信心原则”）是他跟弟兄会接触时学会的。戴氏又商借并勤快地研读了麦都思的《中国：她的现状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并同时开始学习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

1851年，他搬到赫尔一个贫民区居住，担任威廉·赫迪医生（William Hardey）的医疗助理。这也是他对以后的信心生活、事奉生涯的准备与操练：献身贫穷，相信上帝会供应一切所需。他从中熟习了在贫穷人中派发福音小册和露天讲道。他也再次与弟兄会接触，这次是在赫尔有著名的弟兄会教师安得烈·犹克（Andrew Jukes）。

1852年，戴德生开始在伦敦白教堂的皇家伦敦医院学医，以备到中国工作。当时英国兴起一股中国热。此热潮一源于英国人误以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大型运动，二基于传教士郭实腊所夸大的中国开放论。戴德生也因此投身于郭氏所创立的中国传教会，成为该会首名传教士。

首次来华

戴德生乘艇沿运河、水道向华人布道派《圣经》。

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a]派遣，搭船前往中国。

1854年3月1日，在上海登陆，先在上海附近宣教，此时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作战，枪弹在他的头顶上呼啸飞过，他虽然有受苦的准备，却不曾想到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他夹在中间，亲眼见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

戴德生学中国话，但很快发现自己所用的传教方式很有限，很多人不专心听他讲道，对他发的福音书籍和小册子也没有兴趣。他在街上穿着西装讲

道的时候，人家就一直注意看他的服装。戴德生决定改穿中国衣服，并蓄起辫子，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认同，以减少种族的分别，消除冲突。当他把这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了相当的冲激。

1855年，戴德生在上海遇到了苏格兰人宾惠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宾惠霖是是英国有名的布道家，是英国长老会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他比戴德生大13岁，当时已经到中国七八年，是识途老马。戴德生把宾惠霖当作属灵的父亲，二人十分投契。有一次，听到一位基督徒船长鲍尔斯（Captian Bowers）谈到广东汕头对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动，鲍尔斯给了他们免费船位。二人到达汕头后，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同出外传福音。后来，那里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愈；听到戴德生能用西药医病，请他来试，果然不久痊愈了。为了感恩，给他们帮助，工作和居住环境大有改善。二人认为配搭由宾惠霖传道，戴德生医病，是传播福音的好方法。于是，由戴德生回上海取回寄存的医药及器材，可是，戴德生回上海后发现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烧；剩下的被一名中国佣人偷走。不久，收到宾惠霖的来信，两名中国基督徒同工，因传福音被进监狱；宾为霖则被广州英国领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传福音。
1857年3月，戴德生接受乔治•慕勒的赞助和建议，前往浙江宁波，担任帕克医生（Dr William Parker）的助手，并建立“宁波差会”。
在宁波，有个英国的艾德锡（Mary Ann Aldersey）女士，开设第一所在中国的基督新教女子学校；有孤女碧劳拉和马利亚黛尔姊妹二人（Burella & Maria Dyer）帮助她。1858年1月20日，戴德生在宁波与21岁的Maria Jane Dyer结婚。
1858年8月，帕克医生的妻子突然患霍乱去世。伤心的帕克决定带孩子们回英国，交给他们的祖父母抚养。于是，戴德生接手医院和药房的工作。

中国内地会

1860年7月18日，他从上海启程回英国，一方面是休息，因为他身体累垮了，另外，他希望充实医学的训练，学到像是有毕业证书的水准的程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戴德生的旷野时期，他经常祷告，到处传递对中国宣教的负担，并深刻的思考在中国宣教的策略和方向。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在伦敦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义将十英磅的小额款项存入银行，标志着中国内地会的成立。1865年10月，戴德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指出中国每天有三万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亡，他们灭亡是因为没有基督救恩。中国虽然签订了北京条约，传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仍然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内地11个省份未有宣教士踏足，所以，中国内地会原则是呼召愿意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希望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宣教士驻点。
1866年，戴德生选取了18名应征的宣教士，5月26日，戴德生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率同这18名宣教士，乘兰茂尔(Lammermuir)号帆船离开英国。1866年10月，第一批内地会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选定的第一个传教站是浙江省会杭州，以此为基地，迅速扩展到浙江许多城市，特别是南部的温州。内地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教堂——崇一堂位于杭州清泰街新巷，近年易地复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礼拜堂。
内地会后来成为“信心差会”跟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西方宣教史以他作为分界线，可以看到戴德生在宣教运动上的重要性跟地位。内地会的“信心原则”（Faith Principle），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要做的工作。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公开向人募款，而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
1868年8月，戴德生抵达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城市江苏扬州，计划以此为基地，将福音扩展到华中和华北。8月22日，扬州皮市街的内地会传教站受到上万名暴徒的攻击、抢劫、放火，戴德生怀孕的妻子玛莉亚也在跳楼逃生时负伤。这就是著名的扬州教案。

1870年，爱妻玛莉亚病逝。1871年，他与1866年同船到达中国的女宣教士珍妮富丁（Jennie Faulding）结婚。
1887年，又有102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宣教阵营。19世纪末，内地会已经发展成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差会。戴德生去世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已增至828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北欧国家，散布在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2500人。

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埋葬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与原配妻子玛莉亚和4个孩子合葬。碑文上写着：A MAN IN CHRIST（他一生常在基督里）。墓地已经被毁，但墓碑仍保存在由昔日镇江英国领事馆遗址改建的镇江博物馆内。何斯德(Dixon Host)接续了中国内地会总监。
到现在为止戴家有五代在中国宣教工作。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在他们这一家族里面是落实了。其中第四代的戴绍曾（Jim Taylor）牧师曾任海外基督使团总裁、圣光圣经书院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又在 1994 年协助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SI），并承担为第一任MSI 总裁，于2009年3月20日离世归主，享年79岁；第五代的孙子戴继宗牧师现在香港事奉，于1993年与台湾基督徒声乐家柯悦敏小姐结婚，柯小姐成为戴家第一位华人成员。而戴德生成立的内地会，于1964年改称"海外基督使团"，总部设于新加坡，继承戴德生的宣教心志，向东南亚的民族传教。

影响
戴德生的"信心原则"对后世福音派教会带来广泛的影响。著名的例子包括奥运金牌得主传教士李爱锐（Eric Liddell），布道家葛培理等。中国内地会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新教）的差会之一。

逸事
戴德生名言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励传教士和基督徒：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ur? ”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岂能为祂做太多？我们能为这宝贵救主做再多吗？”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改穿中国人服装

21岁的戴德生1854年3月1日，在上海登陆，在上海以及宁波、汕头等地传教。他很快发现自己所用的传教方式有限，在街上穿着西装讲道的时候，人家就一直注意看他的服装。一次，他在布道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摇头晃脑的似很专心地在听。戴德生很兴奋，讲完后就去找这个人说，“刚刚我看你点头又摇头，到底刚刚你的问题在哪里？我可以再给你讲解说明”。那个人回答说，“我是做裁缝的，我看你穿的西装，看来看去就是想不通。这个西装前面开叉开这么大，那冬天的时候不是很冷吗？还有，你这西装袖子上多缝的三个扣子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大概扣子掉的时候免得找不到替换的，但你的扣子会常常掉吗？我搞不懂这西装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而且这西装这么硬，穿起来不是很不舒服吗？”

戴德生经过这个教训以后，就发现他如果穿着这个洋人的洋服在这里传教，人家会把你当外人。所以他那时候就有一个决心要跟中国人一样，他的日记写道：“梳辫子对我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这个辫子要留很长，而且还要用猪油把它涂在辫子上面让它可以光跟亮，否则梳不起来，这猪油粘粘的很不习惯！”。然后穿中国衣服的话他说，“一条裤三个人可以穿得

下，很宽很大”所以他老是怕裤子会掉下去。他当时看西方人穿西装，过西方式的生活在中国传教遇到很大的困难。

信心原则

戴德生不时实践他的信心，正因如此，他有很多美妙、神奇的经历。举例来说，他在宁波时，和其他传教士每天(除星期日外)给平均约七十位穷人早餐。一个星期六，他们买了第二天的食物后，手上已不名一文，不晓得神如何为预备星期一自己和穷人的需要。但就在那一天，他们收到了一张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早餐，他们就深知这是神的预备。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

彰显基督的温柔

在义和团之乱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

++

++

++

++

++

++

++

++

++

++

++

+++
+++
+++
++++++++++++++++++++++++++++++++++++

http://www.wellsofgrace.com/resources/biography/taylor.htm

《戴德生传》前言

很少人像戴德生那样为了神的缘故去关心中国。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而改穿中国人的服装。他冲破宗派间的屏障而成立了超宗派的差传队伍。他一直有一个异象；即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每一角落。他的动机不是来自鲁莽的冒险，也不是来自个人的满足感，而是深切地关怀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中国人。他对于神的信实从不怀疑，这信心成为他毕生推动的力量。戴德生说过："假若我有千镑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如今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也应以同样的信心作出响应，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来证实神是信实可靠的。今天正是时候，我们应该关心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普通信徒也好，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也好，阅读戴德生传记、正好适合这时代的需要。

如今西方的信徒享有各种的自由和方便，反观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已往或是今日．他们所表显的忍耐和坚强实在足以使那些在西方享惯安逸的人感到羞愧。在中国的信徒们，只是单纯地相信，有一位永活的神，他已经说出他的话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赖的，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

空。

在戴德生的传记中，陈述了一些简单的原则，包括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真理的顺服、信靠神的祷告，和持久的忍耐。戴德生的传略，像一面镜子，催促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更认真地省察自己。愿神用戴德生的一生来勉励我们。愿荣耀归给神。

+++
+++
+++
+++
+++
+++
+++
+++
+++
+++
+++
+++
+++
+++
++++++++++++++++++++++++++++++++++++

中国内地会

（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A4%96%E5%9F%BA%E7%9D%A3%E4%BD%BF%E5%9C%98

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或OMF International）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公理宗的差会；它的前身是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1964年改称现名。

1854年，戴德生作为郭实腊的中国传教会传道人，首次从英国来到中国，先在上海、汕头等地传教，1857年定居宁波，并成立“宁波差会”。1860年他回到英国，两年后（1862年）在布莱顿招募到宁波差会第一位志愿者宓道生，并派往宁波。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为“中国内地会”（本文简称“内地会”），并确立其宣教方针，就是要召募一批可以迁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将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内地；内地会的总部最初在杭州，1890年迁至上海，慢慢把宣教工作深入中国内陆，最远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直到1950年代才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背景下撤出中国。

1964年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持续向亚洲17亿的异教徒人口传扬福音；现时海外基督使团有大约一千名宣教士，来自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及香港等地。

原则

拓荒植会

仿效使徒保罗，不在有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扬福音。戴德生和早期内地会宣教士看见中国内地的需要，决定将福音传给那些被遗忘或被忽略的群体，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目标是在中国各省都建立教会。

顾名思义，中国内地会是特别为中国设立的，目标是希望中国每一个省份

都至少有一对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当时西方宣教士主要是在沿海的通商口岸传教。虽然到了《北京条约》以后可以自由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宣教士都还是只在中国沿海地区，遍布于从东北地区到南边的广东，很少有宣教士能深入到内地里面去。

信心

戴德生设立中国内地会以后，就带领一批宣教士来到了中国。内地会后来成为西方的所谓"信心差会"和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那么西方宣教史就以他作为分界线，所以就看到戴德生在宣教运动上的重要性跟地位，从那时候就称为"内地宣教时期"。内地会的"信心原则"（Faith Principle）就是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呼召去进行工作。不借贷，不募捐。遇上经费的困难时，他们不会公开向人征款或筹款，只让上帝感动人来帮助他们。

以下是戴德生的一些语录"亲爱的妈妈，请继续为我祷告。虽然我的衣食充足，充满快乐和感恩，但是我需要你为我代祷。。。妈妈，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是多么渴望成为宣教士，渴想把喜讯带给那些贫困又正步向灭亡的罪人呢。求主使用我，让我为那代我受死的主鞠躬尽瘁！。。。妈妈，试想想，有一千二百万人——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多么难以想象——是的，在中国每年就有一千二百多万灵魂，在没有神，没有盼望底下步向灭亡。。。啊，让我们有怜悯的心看待这庞大人民的需要！神既怜恤我们，我们也应该体恤祂的心意。。。。。。 我要搁笔了。你愿不愿意因那为你而死的主耶稣献上一切？妈妈，我知道你愿意。愿神与你同在和安慰你。当我储备了足够的路费时，我可以立刻启程吗？我深感假若我不为中国做点什么，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了。"

载自《属灵的秘诀：戴德生信心之旅》

这封戴德生写给他妈妈的信大概写于1851年，他于1865年创办中国内地会，毕生竭力把福音传到中国各省。

跨越文化

内地会的宣教士们打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隔阂，来到中国内地传福音，并建立教会，克服重重困难。初期，内地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后，必须改穿中国服，并梳中国发式 （去发留辫）。当时，戴德生更因而被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士指控叛国。但戴德生认为只要能领人信主，穿中国服不是什么大麻烦，反而可以让传福音的工作更加顺利。

历史年表

1860年代

1860年7月18日，戴德生从上海启程回英国，11月20日抵达泰晤士河口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1862年1月8日，戴德生以“宁波差会”名义招募的传教士宓道生，启程前往中国创立宁波传教站

1862年7月，戴德生获得外科医生证书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中国内地会”

1865年10月，戴德生在伦敦出版《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1866年3月12日，内地会在伦敦出版第一期会刊

1866年5月26日，以内地会名义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戴德生的率领下，乘坐“兰茂密尔”（Lammermuir）号船，启程前往中国，9月30日抵达上海。

1866年12月，“兰茂密尔号船传教团”（the Lammermuir Party）抵达杭州清泰门新开弄（新巷）1号

1866年 浙江 ： 杭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总部)

1866年 浙江 ： 奉化 甘比治（George Crombie） 建立传教站。

1866年 浙江 ： 绍兴 范明德（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妻子Ann建立传教站。

1867年 浙江 ： 萧山 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卫养生

（James Williamson (missionary)）建立传教站。
1867年 浙江 : John Sell 死于天花
1867年 浙江 : 杭州: 戴德生的长女Grace Dyer Taylor 死于脑膜炎
1867年 浙江 : 台州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Josiah Jackson 建立传教站。
1867年 江苏 : 南京 童跟福（George Duncan） 建立传教站。
1868年 江苏 : 扬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站。同年8月22日，扬州教案
1868年 浙江 : 湖州 麦克悌（John McCarthy ）建立传教站。
1869年 安徽 : 安庆 宓道生，卫养生建立传教站。同年11月3日发生安庆教案。
1869年 江西 : 九江 高学海（John Edwin Cardwell）夫妇建立传教站。

1870年代
1870年7月23日，"差会的母亲"Maria Jane Dyer在江苏镇江去世。
1871年11月，福珍妮嫁给戴德生。
1871年-1875年 江西 : 大姑塘镇（今九江庐山区姑塘镇） 高学海夫妇建立传教站。
1874年 湖北 : 武昌 戴德生和祝名扬（Charles Henry Judd）建立传教站。
1875年1月 《招募18个同工》在伦敦出版
1875年7月，《China's Millions》第一期在伦敦出版
1875年 河南 : 戴亨利（Henry Taylo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该省是中国未听见过福音的9个省份之一。
1875年 湖南 : 祝名扬和都天德（Adam C. Dorward）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后来在1880-1882年，二人旅行1500英里穿越中国。
1876年 山西 : 秀耀春（Francis James (missionary)）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开始救济"丁戊年华北大饥荒"的难民。

1876年 陕西 : 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金辅仁（George King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1876年 甘肃 : 义世敦（George F. Easton）和巴格道（George Parke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1876年 四川 : 贾美仁（James Camer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George Nicoll在巡回布道之后定居此处。
1877年 贵州 : 祝名扬和包兰顿（James F. Broumton）是该省最早的新教巡回传教士。包兰顿 later pioneered 在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中工作。
1877年 广西 : Edward Fishe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同年去世。
1877年 云南 : 麦克悌从镇江徒步旅行，经过汉口、四川、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八莫；履行持续7个月，沿途传道。他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新教传教士。
1877年 西藏 : 贾美仁从重庆步行到巴塘，第一个传福音给藏人。然后他去了大理和八莫，又经过广东回到重庆，行程遍及当时中国18个省份中的17个。
1878年山西 : 福珍尼 Jennie Taylor (Jane Elizabeth Faulding)是最早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女性传教士。
1879年陕西: 金辅仁和 Emily Snow King 是第一对迁入汉中的传教士夫妇
1879年 四川 : M. A. Howland Nicoll是第一名住进重庆的女性传教士

1880年代

1880年山西: Harold A. Schofield在太原开办内地会第一所医院。
1880年 甘肃: Elizabeth Wils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女传教士
1880年 贵州 : George Clarke (missionary) 和妻子Fanny 定居该省
1881年 云南 : 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Henry Soltau在86天中徒步旅行了1900英里，从八莫、昆明、重庆、武昌到上海，从西向东穿越中国。
1881年 云南 : George and Fanny Clarke settle to work in 大理.
1881年 山东 : 芝罘学校在烟台开办(最初称为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
1885年3月3日，“剑桥七杰”抵达中国
1887年，派出“一百名同工”来华
1888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创办《National Righteousness》：一份宣传戒毒的期刊
1888年10月30日，第一批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上海

1890年代
1890年，戴德生在虹口区吴淞路9号正式建立内地会第一个总部大楼，可供300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购屋经费由荣晃熙(Archibald Orr Ewing,1857~1930)捐献。
1890年，第一批澳大利亚传教士抵达
1894年甲午战争，稻惟德在烟台参加红十字救助伤员的工作。
1895年，Newington Green office Headquarters 伦敦

1900年代
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中，有58名内地会传教士和21名他们的孩子被杀害（见义和团教案中内地会殉道者名单）。
1901年，戴德生拒绝接受清政府对财产和生命损失的赔偿，展示‘基督的温柔和良善’
1901年，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被指定为代理总监督
1902年，杭州崇一堂落成。
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内地会总监督
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
1906年，胡进洁（Sir George W. Hunter）进入新疆迪化传教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内地会向 江苏，安徽和河南派遣洪水和饥荒慰问团队

1910年代

1910年，J. O. Fraser抵达中国

云南西部部落地区有了60,000名基督徒

1911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在戒毒运动成功后去世。（第一届世界戒毒大会于1909年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海班明是大会主席。）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内地会传道员超过1000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

1920年代

中国内战（Chinese Civil War）和非基督教运动迫使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暂时撤退

1927年-1932年，何斯德发起200人专案活动，援助内地宣教运动，从1200名申请人中挑选了共计203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1929年39人，1930年47人，1931年117人）

1930年代

1930年，总部迁往上海新闸路1531号，有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同工宿舍、礼拜堂、招待所。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牧师在贵州被迷路的红军抓到，随肖克和贺龙的部队长征达560天，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5省，行程达一万公里，1936年4月在云南被释放。11月，他将在红军中的经历出书——《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中文名《红军长征秘闻录》），是西方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专著。

1934年12月8日，200人专案中的师达能牧师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在皖南旌德县被红军绑票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传教士到更偏僻的内陆 - 或被日本人投入狱中，直到战争结束

1940年代

1942年11月，位于烟台的传教士子弟学校芝罘学校被关闭，所有学生和职员被日军关进集中营。
1945年8月，芝罘学校被美国伞兵解救。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代

1951年， 三自爱国运动，政府控制教会。"三自宣言"发表以后，内地会开始撤退传教士，到1953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
1951年11月，在新加坡建立新总部，机构名称也改为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60年代

1964年，中国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文化大革命 1966年-1972年: 取缔包括三自爱国运动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活动
在泰国农村的医疗工作开始

1980年代

中国教会受洗信徒人数达到2150万，包括慕道者的基督徒超过5200万

在华传教站列表

其中安徽、四川、贵州、甘肃、陕西、云南、河南等省都由内地会首先开辟。1927年1月内地会在中国共有937个宣教站，到了同年7月只剩296个。1928年1月开始有宣教士回来重开宣教站，便增为 305个，同年7月465个。再过半年，北伐内战渐平静，1929年1月，宣教站达840个。

浙江

杭州（1866），绍兴（1866），奉化（1866），台州（1867），温州（1867），宁海（1868），平阳（1874），衢州，常山，金华，兰溪，永康，天台，仙居，新昌，嵊县，黄岩，莫干山，

教堂：杭州崇一堂、敬一堂，温州花园巷堂

江苏

扬州（1868），镇江，清江浦（淮安），安东县（涟水）（1893）

教堂：扬州皮市街教堂（扬州教案发生地，今皮市街149号）、南门街教堂（今甘泉路343号），镇江伯先路教堂，清江浦铜元局教堂

镇江和扬州分别设有面向男性传教士和女性传教士的语言训练所。

上海

上海没有面向中国人的教堂，只有供传教士使用的地丰路礼拜堂（今新恩堂）。

安徽

安庆（1869），阜阳，太和，六安，正阳关，舒城，广德，宣城，泾县，郎溪，芜湖，

江西

九江（1869），大姑塘镇(位于九江庐山区），吉安（1891），南昌，赣州，上饶，宜春，鄱阳，信丰，弋阳，河口镇（铅山），樟树，贵溪，东乡，遂川，【永丰】，【永新】

湖北

宜昌，老河口

河南

周口，社旗，襄城，开封，

教堂：开封大纸坊街礼拜堂、南关福音医院礼拜堂

四川

重庆（1877），成都（1881），阆中，巴中，万县，广元，渠县，南充，梁平，垫江，达县，奉节，灌县，江津，

贵州

贵阳（1877），安顺，赫章葛布，结构，旁海，遵义，镇远，平坝，

湖南

常德（1879）、华容、湘潭、湘乡、长沙

山西

平阳府（临汾）（1878），洪洞（1886，山西省总部），霍州，平遥，祁县，潞安府（长治），隰县，大宁，孝义，河津，赵城，介休，潞城。

学校：洪洞县普润学校（Hoste Schools），内设中、小学。

陕西

汉中，凤翔，城固，洋县，

甘肃、宁夏、青海

甘肃天水，甘肃兰州，甘肃武威，宁夏银川（1877年传入，1885年设立银川传教站），宁夏平罗（1932年），青海西宁。

教堂：兰州山字石教堂

云南

大理（1881），昆明（1882），武定洒普山，腾冲，丽江，楚雄

教堂：昆明三一圣堂（1903年）

山东

烟台，牟平（1886）

烟台设有传教士子弟学校芝罘学校和疗养院。

河北

获鹿（1887），邢台（1888）

新疆

迪化（1906）

统计

1919年，内地会差会在华传教士960人，在各省分布情况如下：

四川117人

江西78人

山西65人

浙江64人

江苏59人（其中上海54人）

河南54人

山东53人

安徽41人

甘肃36人

贵州29人

云南25人

陕西21人

直隶15人

湖北11人

新疆6人

湖南4人

1919年内地会在华信徒50541人，在各省分布情况如下：

浙江7900人

贵州5279人

四川4743人

河南4192人

云南4014人

江西3993人

山西3694人

安徽1341人

江苏1004人

甘肃620人

陕西514人

湖北459人

直隶294人

湖南282人

山东173人

福建8人

新疆

著名人物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905）

何斯德(Dix E.Hoste，1861-1946)

宓道生(James Meadows，1835-1914)

海班明

剑桥七杰

施达德（Charles Studd），

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

司安仁(Stanley Smith)，

亚瑟.端纳（A.T. Polhill-Turner），

宝耀庭(Cecil Polhill-Turner)，

盖士利(William Cassels)，

童跟福（George Duncan）

戴存仁

海思波

盖群英

祝名扬

高学海

王志明

富能仁

遗迹

中国内地会原伦敦总部大楼，位于北伦敦伊斯灵顿区与哈克尼区之间的纽因顿格林（Newington Green）。到19世纪末，内地会大楼投入使用时，这个曾经的乡村早已被并入伦敦大都市。纽因顿格林是围绕英国非国教徒和他们著名的学院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内地会总部介于纽因顿格林的另外两座保护建筑之间：纽因顿格林一位论派教堂 (1708)，以及纽因顿格林52-55号，是伦敦最古老的砖砌联排住宅，著名的牧师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曾住在这里。该建筑已由哈沃斯汤普金斯建筑师事务所翻新。现在称为 Alliance House，作为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学生宿舍。

上海内地会总部大楼

1890年，内地会总部迁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区（虹口区）的吴淞路。1930年，迁至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新闸路1531号。1950年代，内地会总部建筑被改为上海第六医院（目前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使用）。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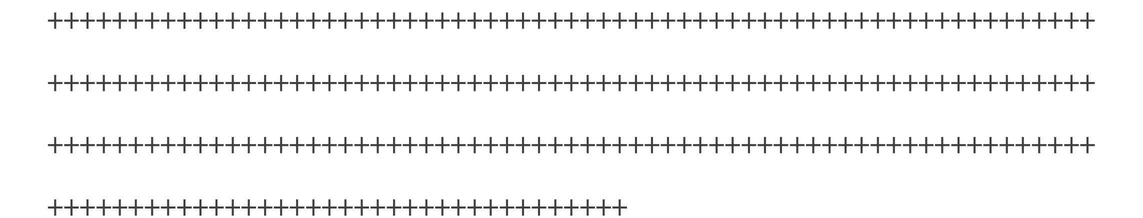
+++

+++

+++

+++

+++



https://chinachristianedu.com/2019/10/20/1800-1950%EF%BC%9A%E4%B8%AD%E5%9B%BD%E7%9A%84%E5%8C%BB%E9%99%A2%E9%83%BD%E6%98%AF%E4%BA%9B%E8%B0%81%E5%BB%BA%E7%AB%8B%E7%9A%84%EF%BC%9F/

1800-1950：历史不能遗忘的中国教会医院

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两千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早期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 （绝大多数由天主教会建立），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医院，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所有的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从1800到1950年间，占中国医院绝大多数的中国教会医院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西医和福音得以经基督教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

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

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其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

在19世纪30年代，齐鲁医院创办。该院及医校的建立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为近代的济南及山东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早年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嘉约翰抵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和于医疗。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

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

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

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即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建成中式平屋 8 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当时设病床30张。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他自己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在苏州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 x 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 x 光机的医院。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

已。”。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札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 R. 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Parker，1804—一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华美医院与医校

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

院（今青龙桥北后坡街117号）。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该院实行男女分诊，一般免费诊疗，并开始实行医护分工。1891年设养病室，收治住院病人。与此同时，又建立华美医院医校，收徒授课，传播医学知识。

进入20世纪后，华美医院、医校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华美医院在1929年后另设女医院，以妇、产、小儿科为主，并接受产妇住院分娩，有产床15张，是当时设备较全的医院。1934年后，并入齐鲁医院。华美医校则在20世纪初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1903年华美医校与山东省内青州（今益都）、邹平、沂州（今临沂）的三个基督教会医校联合，轮流在各地上课。同时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人开始筹建新校。时值济南在1904年开埠后，开始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吸纳异域文明，逐渐成为山东及华北地区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此条件下，英、美两国教会遂将校址确定在了济南。

1907年，英国基督徒艾宗敦捐巨资给英国浸礼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也募到了一批款项。第二年秋，两教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以西动工兴建学堂，与聂会东创办的医校合并，称为“共和医道学堂”。同一年，作为学堂的实习基地，聂会东在今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和医院，分内、外两科，设药房、化验室，美籍医生徐伟廉任化验室主任。

1910年3月，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学员10名。在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竣工后，1910年4月17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举行庆典，并于次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科长（即校长）为聂会东，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1915年9月，养病楼竣工启用，山东督军靳云鹏亲临开幕典礼。

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部分师生并入共和大学医科。

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教，在济南集资兴办了齐鲁大学。此后，外国教会医士团体中国博医会将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的部分师生并入该校，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共同组建齐鲁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1928、1937年日军两次侵占济南期间，因是外国教会势力创办，该院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免遭兵燹之灾。1934年后，华美医院并入齐鲁医院，成为其门诊的下属分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齐鲁大学被迫南下成都，与华西大学暂时合并，齐鲁医院则被日军仁字部队强占为伤兵医院。当时未随校南迁的英、美人士，全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以尤家骏为首的部分华籍医护人员，则另行组建“济南市立医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医院重新恢复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后，山东的大学几经调整，齐鲁医院现已成为山东大学的附属医

院，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

1911年春，加拿大传教士福古森（W.D.Ferguson）医生夫妇利用药房治病救人，传播福音。1913年，泸州地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泸州福音医院至此正式诞生。

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 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上海同仁医院。

1908年，上海成立圣玛丽医院，创办者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会和主教帕里斯(Paris P.)。初期仅有四个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医院建筑扩大，拥有70张病床，属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院，并在姐妹会的协助下，增设了一个护士学校。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上海仅有两家外国医院，且远远不能应付日趋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滩街办法国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改称公济医院。1880年，美国圣公会建上海虹口医院(后称圣路加医院)，文恒里医师在此任职。不久，医院接受了郭实腊医院董事会提出与圣路加医院合并的建议，创建郭实腊医院。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两名女医务人员。最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莱芙斯纳德(Reifsnyder E.)医师，于1883年抵达上海，第二年春天，在旧城开一小诊所，两个月后关闭。旋即她又与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护士麦基奇尼(Mckechnie E.)合作重开诊所，对需要入院者转圣路加医院。后来她俩募集得一笔总数达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门外徐家汇建起一个有20张病床的医院——威廉森医院(Williamson M. 曾为该医院捐款，为纪念她，称威廉森医院，中国名为：西门妇孺医院)，1885年开诊。

1861年洛克哈特终于来到北京，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国，北京的工作交卸给伦敦会另一个传教士德贞医生。

1865年，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的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树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美国卫理公会1875年派遣医生来北京。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到北京后自办诊所，后来，与戴维斯(Davis G. 作库姆斯的助手)办了一所35张床位的妇婴医院。

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诊所，1886年办安定医院。1889年，英国圣公会到北京也开有一间诊所。

1902年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床位34张，有一个门诊部，放射科，电疗室和药房。

1902年，美国长老会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重开道济医院，

1903年，美以美会（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于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霍普金斯纪念医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来，此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

1906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圣卢克医院及诊所。

1866年伦敦会医生到达汉口设诊所，

1868年伦敦会建天津诊所，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医师在东北营口从事医疗活动，

1870年圣芳济会在宜昌设有诊所，187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进入山东登州，同年，英国浸礼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医生开始在烟台活动。烟台毓璜顶医院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于1890年创建的教会医院，现已发展成为烟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

1883年重庆有了美国圣公会的诊所，而同年美国公理会医生在山西太谷县开创医疗工作。

1885年美国长老会建山东济南诊所。同年，美国基督教纽约长老会在海南海口建福音医院。

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云南、贵阳均有教会医生涉足其间；总之，教会医学医药事业遍布中国南北大地。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Inventory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iled for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1800-1950 project （//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做基督徒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

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如下面的讨论中所述，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
统计表中列出的传教士最早建立的医院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后称博济医院（Canton Pok Tsai Hospital），现在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也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的医院在当年11月4日开始应诊，虽然标明免费治疗，开诊当天也门可罗雀，但整天无人胆敢问津就诊。第二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但无钱求医的妇女，怀着战兢的心态姑且一试，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因伯驾医术高明，和蔼可亲，不分贵贱，很快赢得了广州百姓

的信任，在开诊的头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其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

百度百科伯驾条目的介绍说伯驾是“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实际上，1807年英国伦敦会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里逊（Robert Morison）1820年在澳门也开设过诊所，尽管是中式诊所，但雇有中西医师，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3]。但可能是因其规模相对还较小，又没有延续下来，因此，一般还是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不仅最早开设医院，同时也注重培养中国医学人才，在他的中国助手中，后来也有可以独当一面的。如下所述，也是博济医院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1886年孙中山就是在此学医。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嘉约翰传教士手上的事。

统计材料中中国的第一个公立医院是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统计表中说其成立于1908年。但国民政府实际上是1927年才接管同济大学和它的医院的。在这之前，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立的同济医院和学堂。宝隆是基督徒，但不是传教士，1891年作为军医随德国军队赴上海，对上海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非常震惊，因此退伍后在上海行医，后感到军医知识片面不足，又回德国再深造两年后于1893年重返上海，并在德国领事馆附近设立了一个诊所。1899年宝隆在德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获得了一块地基建立医院，取名同济医院，既为“同舟共济”之意，又与Deutsch（德国的）的发音相似。医院建立后，宝隆又开始筹备建立一个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学院。他1906年建立了一个建立医学院的基金会，从德国募得25万马克的资金和7万马克的书籍捐赠，于1907年开办上海德文医学堂，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就是后来的同济大学[4]。

统计资料中第二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是上述的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由博济医院创办，因此是一所教会医学专业学校。首任校长嘉约翰医生也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1879年它开始招收女生，因此也是中国最早开始培养女医生的。博济医学堂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5]。值得一提的是嘉约翰1898年在广州建立的惠爱医院，是中国的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他1901年在广州去世。

统计表中第三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它成立于1911年6月，1913年7月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31年8月改称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这可能是真正最早成立的公立医院，而不是接管的。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创立比较晚，比较少，而且还有些只是军医院校，如广西军医学校和军医学校广州分校等。

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医院是1907年成立于上海的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国红十字会起源于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当时中国东北发生日俄战争，为了有一个中立机构救援灾民，由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实业家盛宣怀邀集上海租界各国领事与富商效仿瑞士红十字会章程而成立。

统计表中的私立医院和其他不属于上述各类的医院，建立时间最早的是开滦矿业公司（Kailan Mining Company）建立于1900年的开滦矿务总局医务处（Tangshan 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General Base Hospital）。它有外资、外国人和清朝政府的参与。统计表中的第一家中国私立医院应是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表中说是创立于1906年9月。但光华医学院校史的研究认为是1908年3月1日正式招生上课[6]。

统计表中福建省有一个London Mission Hospital (Tingchow Hospital)医院，这就是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知道的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了。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伦敦会）教徒亚盛顿捐款25万英镑给伦敦会兴办的。1908年医院落成，取名"亚盛顿医馆"（后改为福音医院）。由英国医学博士传教士赖察理首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

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7]。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传教士担心安全撤回英国，傅连暲代理英国教会管理医院，成为院长。
傅连暲出生贫苦家庭，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在教会人员资助下入读教会学校。1915年冬从亚盛顿医馆毕业，被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和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本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1927年南昌起义时曾接受陈赓等300名受伤官兵[8]。1933年傅连暲参加红军，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有趣的是，网上有一篇2009年《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否决汀州医院搬迁议案》的新闻报道，说：“汀州医院原身为红军福音医院，位于城市中心，有60多年历史”[9]。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生，这报告的作者也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可能把“红军”和“福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命名医院，而且就是从红军1935年开始长征离开福建和江西算起，到2009年也有74年了。把1935年以前的历史全不算，该医院到2009年也不只60多年历史。希望将来我们民族的文化人士，不管抱什么样的政治观点，讨论历史时，对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会有尊重和严谨的态度，不会随意更改。
参考文献和分省统计表从略。详细资料见耶鲁大学的统计表。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14日

著名教会医院名单：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十字架与中国的医院

根据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历史回顾，旧时的生育之愚昧令人发指。中国孕妇是由产婆接生，一把剪刀一盆水就这样去接生，中国的女人不但裹一辈子脚遭罪，生孩子更是 遭罪，死亡率很高，有的难产而死，有的生下来不知道护理就夭折了，孩子生下来，接生婆随手从坑席上抽根席篾将孩子的脐带割断；为了止血，在脐带断口处撒一 把尘土。因为那根肮脏的席篾和那把尘土中的破伤风病菌，有20%的孩子在出生第四天到第六天死去，这就是千百年之久中国人生育史上的“四六风”。母亲生育 时流出的血色的液体被视为不洁之物，身下坐个土坯吸净。正是这块土坯和接生婆长而黑的指甲，导致很多母亲死于“产褥热”。推广的新式接生法，其实相当简 单，一

把用沸水煮过的剪刀和接生婆剪短指甲并用肥皂反复洗干净的双手；把母亲身下的土坯换成消过毒的布片或草纸。仅仅是这一点点改变，仅仅在50年代的中 国，上亿人的生命被挽救了。而过去出生及出生后感染细菌的死亡率就达70%。令今天的人们毛骨悚然的旧式接生法，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习以为常，没 有人感到那样做有什么不对。那么究竟是谁将新接生法带进中国的呢？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上《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作者：陈凤林,刘士英,梁峻（均为非基督徒）的资料：

150多年前的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是大哭！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重，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 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

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 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 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谁给我们带来新的接生法，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这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她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当时每一天在医院里就有好几百人信主，

许多宝贵真实的资料被故意人为的掩盖而十字架却保留了下来，今天你去看医生，或许你会信不过这个医生，因为医生有好有坏，但是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正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教会医院的建造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因此现在中国西医院都以“十字架”为记号！并且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将医院十字架的记号去除！好好看看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

感谢主的怜悯！如果没有当年的传教士将新式接生法带到中国，很有可能今天大量的姊妹同胞依然在卫生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生产。让自己及孩子的生命面对着威胁！如果没有当年传教士将接种防疫的疫苗带进中国，又会有多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患病甚至夭折？！

+++

+++

+++

+++

+++

+++

+++

+++

+++

+++

+++

+++

+++

+++

++++++++++++++++++++++++++++++++++++

在华医疗宣教

（维基百科相关文字，有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8%8F%AF%E9%86%AB%E7%99%82%E5%AE%A3%E6%95%99

在 19世纪里和 20世纪初期，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医生以及外科医师的在华医疗宣教，为中国现代医学奠下许多基础。西方医学宣教建立第一批现代化诊所和医院，训练第一批护士，并开设第一批医学学院。他们还展开反对鸦片滥用的工作。许多成瘾的中国人接受医疗和护理，最终对公众和官方舆论发生影响，将这种恶质贸易予以终结。
到 1901年，中国是医疗宣教教士最普遍的目的地。 当时有 150名外国医生，管理 128家医院和 245间药房，治疗过的患者达到 170万人次。 1894年，男性医疗宣教士占所有在华宣教士的 14％。女性医疗宣教士占 4%。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是由国际宣教士管理的医院，在 20世纪初期肇始。

耶稣会在华医疗宣教会的宣教士在 17和 18世纪参加过医疗工作。明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由利玛窦安排皈依天主教，受洗后取名保罗（Paul）。耶稣会宣教士使用从印度而来的一磅金鸡纳树皮，成功治愈康熙皇帝和朝中疟疾的患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宣教士罗德先（Br. Bernard Rhodes）还用自制的西药为皇帝医好上唇肿病与心臟病，

据说罗德先与另一名宣教士安泰（Etienne Rousset）也因此成了当时的御医”。人们对罗德先的评语是：“一个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有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 ”。

基督新教徒医疗宣教会

最早的西方医学疗法是 1820年由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牧师和约翰·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医生（曾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担任外科医生）在澳门为中国人而开的一家慈善药房中提供。

1828年，原来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基督教外科医生汤玛斯·理查逊·卡利吉医学博士在广州开设一家医院（博济医院，后改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卡利吉相信基督徒有责任帮助中国的病人，但他无法把全部时间投入医疗宣教的工作。他与当时的基督新教宣教士协会联系，并在 1834年由第一位全职新教医学宣教士伯驾，经由美国公理会差会任命，在广州开设一家医院。 伯驾很快意识到需要有经过训练的中国人的帮助，并于 1836年训练第一位医学学生Kwan Ato（关杜）。伯驾把乙醚麻醉和全身麻醉药（利用麻醉用氯仿）引进中国。孙中山医生是他的医学院学生中最有名者，他在 1886年在广州学习一年，然后返回香港继续学业。 1835年到1836年，伯驾和卡利吉，连同一些外国基督徒居民成立在华医学宣教学会。不久后，派克执业的消息传开。当时中国不允许公开宣教，外国人被限制只能住在广州十三行。虽然中国人半信半疑，他们仍然被新医院所吸引。来自村庄的已婚妇女整夜坐在广州大街上，以便在第二天清晨找机会排入拥挤在医生门口病人队伍里面。在 1840年，伯驾的医院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而关闭之前，已经治疗过 9,000例严重病例，还有无数的轻微病例。

在 1839年时，在中国的医疗宣教士衹有两名。到 1842年，更多的医疗宣教士抵达。 50年后，有 61家医院和 44个药房，其中 有 100名男性和 26名女性医生，以及一批经由医疗宣教士训练过的本地助手。西方医术在中

国普及之前，一般中国人对外科手术所知不多，但是很快的，他们对外科治疗的需求就远超出宣教医院的能力。在 1895年宣教医院的年度报告中说，每年接受治疗的病例不少于 500,000例，动了约 70,000例手术，其中约有 8,000例属于重大手术。起初，中国人必须对外科医生建立信心，并冷静地接受艰难的外科手术。万一有高风险的手术失败，医院会征询患者的亲属，通常他们不会对于医院有所怨恨。

在 19世纪传入中国的西医，主要是由基督教宣教组织派来的医疗宣教士，例如伦敦传道会（英国），大英循道会差会 (英国)，圣道公会（英国）和长老教会（美国）。 伦敦传道会在 1839年派遣医学宣教士本杰明·霍布森（生1816年，卒1873年年）到广州，成立非常成功的惠爱医馆。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由伦敦传道会于 1887年成立，第一位毕业生（1892年）是孙中山，他在 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香港华人西医书院于 1911年并入香港大学，成为香港大学医学院，于 2006年改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由于中国有男女授受不亲社会习俗，中国妇女不愿接受西医男性医生的治疗。因此，中国急需受过西医教育的女性医生。美以美会女子外国宣教协会于 1873年 安排卢辛达·库姆斯医师到中国北京，专门治疗中国妇女的疾病，她是第一位女性医疗宣教士。库姆斯医师还在 1875年建立中国第一家西医妇女儿童医院。上海的第一家西医女子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现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伊丽莎白·赖夫斯尼德在 1884年成立。

随后，女性医疗宣教士富马利（医学博士，生1854年，卒1927年）由长老教会（美国）的外国宣教委员会派出，在中国广州建立第一所女性医学院广东女医学堂，提供四年制课程。由于建校经费由美国印第安纳州 Edward A.K. Hackett 先生捐赠，该校后改名为广东夏葛女医学校（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后又改为私立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到 1915年，该校已经有 60多名学生，多数是住校。1936年该校并入私立岭南大学，其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院校，最终又成为中山大学医学学科的源流之一。

受到富马利医师的影响，大多数学生成为基督徒。学院文凭上标有广东省政府的正式印鉴，表示是政府正式承认的学院。这个学院致力在宣导基督教和现代医学，以及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夏葛医学院附属柔济医院，是学院的附属机构，学院毕业的学生包括周理信（生1890年，卒1979年）和黄婉卿（WONG Yuen-hing），两人在 1910年代末毕业，然后在广东省的医院执业。

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也存在其特有的风险。在乱世时，流传说外国医生会挖人眼以制药饵。 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是由这种错误观念所引起。当1894年夏天在广州和香港爆发腺鼠疫瘟疫时，有谣言说外国医生散布有气味的药袋来杀人，一闻到就会致命，因此密谋全面举事，诛杀外国人。

大多数早期宣教医院一开始仅配备一名医疗宣教士，没有其他受过训练的人员协助。最早的宣教医院中，有伦敦传道会在上海设立的“中国医馆”（由雒魏林于 1844年创立）在运作，雒魏林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英国军队占领舟山时，在浙江省定海开设第一家中国宣教医院，。后来被称为“仁济医馆，英文则称为山东路医馆”（请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宣教医疗进展中断，直到1865年，宣教医院和医学院开始建立，属于永久性质的机构。东华医院在香港成立，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1912年后改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附设的医疗服务及其有价的医疗记录在此期间展开。由于当地中国人不相信西医，以及不相信外科手术，海关医疗服务的医生通常治疗的是外国患者。

万巴德（Patrick Menson）爵士（生1844年，卒1922年）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的“济世馆医”工作。他在那里服务期间发现肺吸虫。 1866年，美国美以美会差会的 Hong Neok Woo 和 E.H. Thompson，D.D. 两位牧师在上海创立同仁医院。 1871年，英国海外传道会的詹姆士·盖特（James Gait）医学博士来到杭州，建立一家医院，后来称为广济医院，这所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大卫·杜赖恩·梅因医学博士领导下，蓬勃发展，设有专

门的麻风病和结核病疗养院，有 459张病床。
1875年，西格妮·特拉斯克从美以美会获得经费，在福建省福州市建立一家女子医院，该医院在成立后第一年年底已有 1,208名注册患者。特拉斯克的福州当地学生有许金訇，被安排到美国学习。之后，许金訇在 1895年回到福州，为当地的妇女提供西医训练。1880年，英国海外传道会的约翰·肯尼思·麦肯齐医学博士建立天津教会医院和药房（现为天津市人民医院）。弗雷德·C·罗伯茨博士医学博士接任麦肯齐，让这家医院成为当地颇负盛誉的医院。

在此期间，另一位著名的医疗宣教士是中国内地会（现已改组为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戴德生，他曾在皇家伦敦医院受教。虽然最初的中国内地会少有训练过的医生，但后来有两位训练有素的宣教士 R. Harold A. Schofield和海恒博 加入。1883年，杜高德·克里斯蒂在中国东北（满洲）建立一所医院，（盛京施医院，现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克里斯蒂后来在 1912年在医院旁建立奉天医科大学（后被并入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
台湾
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医学博士于 1865年开始在台湾开展医疗宣教工作。他育有两位著名的医疗宣教士儿子。詹姆斯·普雷斯顿·麦克斯韦和小詹姆斯·莱德劳·麦克斯韦。普雷斯顿（Preston）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妇科学教授，小詹姆士（James Junior）在前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请参考中国医疗行业）工作，并担任麻风病医疗传道会远东区秘书。小詹姆士最终于 1949年初重中国，在杭州担任麻风病专科医生，并在浙江医科大学担任医学教授。他于 1951年去世，小詹姆士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尊重，葬礼时政府有派员参加。在香港的喜灵洲有“麦克斯韦纪念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医院在 1975年被关闭，病人移往荔枝角医院）。
20世纪

1931年，在中国的 500家医院中，有 235家由基督新教宣教士所管理，有10家由天主教宣教士所管理。西方训练的医生中，宣教医院占 61%，护士中，占 32%，医学院中，占 50%。到1923年，在中国的宣教医院病床的数目以及教会医生的数目，都占全世界的一半。到 1937年，中国共有 254家宣教医院，但其中一半以上，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 空袭炸毁，或者在中国抗日战争，或者在国共内战之中，两军交战时被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医院中的大多数至少已部分复原，最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但仍继续作为医院运作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think.sina.cn/doc-ihvhiewr7852866.d.html

外国传教士给中国建了多少如雷贯耳的名牌大学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片圣土，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人才济济，若出其中。

东吴大学：

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学科发展包括文、理、医学、神学及法科（在上海昆山路），另有四所附中、二十所附小、

惠寒小学、吴语学校等组成完整的东吴教育体系。各学科除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突出，更为社会培养无数专业人才。学校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校训强调学生人格的陶冶。

1915年，以东吴大学为本，于上海创设“东吴大学法学院”。学院教学突出“英美法”内容，专以讲授“比较法”为主，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历经三位美籍校长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葛赉恩（John W。 Cline）及文乃史（W。 B。 Nance）
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

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其主体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燕京大学：

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 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

燕大有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

家）、王世襄（著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黄笃修（淘大品牌创始人）、杜联喆、房兆楹夫妇（著名学者）、沈昌焕（中国外交教父）、谭其骧和侯仁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李慎之（社科院前副院长、周恩来秘书）、俞启威（1949年新政权的天津第一任市长）、中国前外长、大陆恢复联合国地位后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等。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燕京大学香港部分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齐鲁大学：

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院系神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国学研究所、农业专科，获得加拿大政府批准立案，获得国民政府批准立案。

校训：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齐鲁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毕业生刘世传曾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孔祥熙、老舍先生、钱穆、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

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齐鲁大学被解体，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化学三系并入今山东师范大学，药学系并入今中国药科大学；文学院中的天算系并入南京大学，天文台也搬到紫金山；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组建山东财经学院；文学院其他专业并入山东大学；农业专科为今山东农业大学；医学院归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泰山医学院。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

上海圣约翰大学：

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 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升格为圣约翰大学，乃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 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 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1949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及部分文理系科）并入国立复旦大学，；1951年圣约翰大学（土建系科组）并入同济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并入今上海财经大学；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并入今华东政法大学；圣约翰大学（理科各系、教育系、中文系）并入今华东师范大学；圣约翰

大学（医学院）参与组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并入上海交通大学。

该校培育了有宋子文、林语堂、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施肇基、邹文怀（香港电影教父，一手打造出李小龙和成龙）、史久镛（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大法官）、经叔平（老上海商业巨子、民生银行创始人、原全国工商联主席）、吴肇光（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孙学悟（中国基础化学奠基人）、颜福庆（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周有光（汉语拼音创始人）、黄嘉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顾震隆（中国复合材料研究奠基人）、刘鸿生（老上海实业大王）、严家淦（政治家，原中华民国总统）、吴宓（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成幼殊（著名女诗人、成思危姐姐）、黄金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的英语、法语口译）、陈成达（50年代国足总教练）、黄宗英、黄嘉华（中国前驻联合国圈圈大使）、何占春（原上海纪委书记）、吴宗锡（著名评弹艺术家）、董鼎山（知名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董乐山（著名翻译家、作家）、王永年（新华社著名翻译家）、曾楚霖（香港著名演员）、鲁平（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等。圣约翰大学校友多活跃于商界、政界、文学界、外交界和医务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要影响。

之江大学：

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学校坚持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希望学生能够了解国际学术发展动态并和国际接轨。因此校方顶住社会压力，在全校范围内推广深度的英文教育。学生入校之后，所有学科都必须修读中文和英文。

之大校长、著名教育家李培恩先生亲自教授本科生经济学课程，并且在授课过程中全程使用英文，他要求学生的作业和考卷也必须全部使用英文完

成，并且在批阅学生作业和考卷时，李校长也坚持使用英文。

培养了：

潘希珍，笔名琦君，散文家，擅写怀旧抒情散文。
束星北，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
张理京，著名数学家，翻译家。《美国与中国》译者。
陆蠡，原名陆考原，著名散文家。著作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等，译著有《罗亭》、《鲁宾逊漂流记》等。
朱生豪，原名朱文森，又名文生，学名森豪，笔名朱朱、朱生等，中国浙江省嘉兴人，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
林汉达、金仲华也是之大校友。

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之大建筑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财经系并入今上海财大，工程学院各系、文学院各系及部分数理化学系先后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华西协和大学：

当时的成都市民称为“五洋学堂”，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共同开办的，故名华西协合大学。

1904年，五个外国神职人员，在成都酝酿创办洋学堂。他们分别是美以美会负责人毕启、甘莱德，英美会负责人启尔德、杜焕然，公谊会负责人陶

维新，这几个人草拟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提交华西教会顾问部通过。

1907年，华西协合大学理事在成都选定校址，购地300 余亩， 兴修校舍，划定教学区，以中央为公共场所，四周为“宿舍”区。每舍占地约60亩。

在西方著名教育家波尔顿、张伯伦的指导下，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等都采用了当时英美模式。与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的“中西并重”不同，华西协合大学可以说是“全盘西化”，实施教育也以西学为重。

学校的组织管理按“协合”的原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实行“学舍制”，即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这个创造性的体制既解决了各教会提供资金、设备和相互的协调工作，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的特点，保证了学校在育才方面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

毕启是美国传道士、教育家，由他担当首任校长。华大开初只有简易建筑，毕启执着地募集永久性建筑经费。往来于中国国内拜会政要、资本家、教会人士之间到处化缘，并先后15次横渡太平洋回国筹集办学经费，经手的中外各界捐款达400多万美元。

毕启任职期间，华大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以及农艺专科、农艺系、乡村教育系、乡村建设系，还开办了女子学院……

荣杜易以英式田园风格+中国特色，负责华西坝建筑设计和整体规划，毕启年复一年为此争取捐赠，十几年间修建了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39幢。这些中西合璧的典雅堂舍，大部分建筑仍然保存完好：如怀德堂（行

政楼，1915-1919年捐建）、合德堂（赫裴院，1915-1920年捐建）、万德堂（1920年捐建）、嘉德堂（生物楼，1924年捐建）、雅德堂（广益宿舍，1925年捐建）、钟楼和塔（1925-1926年捐建）、懋德堂（图书馆，含历史博物馆，1926年捐建）、教育学院（1928年捐建）、药剂楼（1942年捐建）……

林则于1917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建牙科系，此后成了华西的“百年品牌”。这位多伦多大学的牙医学博士，也成了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100多年前，林则和新婚妻林铁心坐木船过三峡到成都，开始传教兼医牙，他医术精湛手到病除，上至总督千金，下至普通市民，都找他求医，场面火爆，于是他开办了医科医院。1917年，随着第三名牙科医生的加入，林则在华西协合大学医科里建立了牙科系，并出任主任。他把中国学生黄天启培养为第一位牙科博士。后来，华西牙学院又陆续来了几位美国、加拿大的牙医骨干，教学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毕业生供不应求。华西牙学院成为全国的牙科医学中心、“远东最好的牙医学院”。

四川省当局和国民政府捐款大洋万元（袁世凯捐资4000大洋），建校后在各方共募得资金400多万美元。学校采用当时牛津和多伦多大学的办学模式，目标是建成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如莫尔思、林则、唐茂森、米玉士、吉士道、安德生、苏道璞、刘延龄等。学校也聘请前清优贡、举人、进士、翰林等作为国学教员，如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设立文学院、理学院、医牙学院，大学管理以“协合”为原则，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

1920年，开始向少数优秀毕业生同时授予华西协合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4年，开始招收女学生，成为四川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也率先在西部实现了男女合校。

1927年，医牙合并为八年制医牙学院。

1934年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正式接受华西协合大学为兄弟学校，授予医牙学院毕业生医学博士学位和牙学博士学位，授文学院和理学院毕业生文学士和理学士学位。

1942年，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在牛津大学提出一份中英文化合作计划，剑桥牛津相继成立中英文化交流委员会，东西文化学社在华西坝成立，一场对20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由此发端。李约瑟，海明威，林语堂等人纷纷前来华西坝讲学交流，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纷纷致函表达沟通中西的愿望。

1949年前夕，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已是1所包括文、理、 医、牙4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设有26个系和2个专修科，7 所附属医院。其中创刊于1946年的《华大牙医学杂志》已发展成国际一流水准的口腔医学杂志。

冯玉祥、孔祥熙、朱家骅等人担任名誉校董，省主席张群、交通部长张嘉敖、副部长卢作孚、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等都任了校董。

1952年院系调整中，该校被肢解，学校医学院接收了重庆大学医学院后建立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文理哲学院被合并给四川大学，藏品丰富的历史博物馆也调整到川大；社会学系及民族学（即人类学）组构成今西南民族大学；工学院被合并给今四川联合大学；农学院被合并成今四川农业大学。

华中大学：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20世纪初，三校各自都开设了大学课程。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在湖南长沙开办了雅礼大学。美国复初会在岳阳也开办了湖滨大学。

这些学校中，以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华书院规模较大。早期建筑中圣诞堂至今保存完好。20世纪初，又陆续建造了教学楼、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翟雅各健身所、多玛室、博约室、颜母室等建筑。

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
1924年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并入。
1929年岳阳滨湖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大学部并入。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以原公立华中大学为主体，集中了私立中华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教育学院，南昌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平原师范学院，海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建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
1953年，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
后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迁往城外，原华中大学校园又改办湖北中医学院。

金陵大学：

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私立大学。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 位的毕

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4年，金大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了与其他国际间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颁发获国际认可之学士和硕士学位。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始建于1888年。1910年经各联合教会协议，由每个差会交付相当于4万美元的土地、房屋、设备、现金，提供3名教师，每年出捐助费0.24万美金。后来，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到1922年时，提供教师数增加为5名，年捐款数增加为0.4万美金。

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

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金陵大学文学院全部及理学院主体并入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今南京师范大学；农学院主体并入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并入今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电机系并入今东南大学；理学院化工系参与组建今南京工业大学；电影与广播专修科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福建协和大学系创建于1915年的教会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美以美会（1939年以后称卫理公会）在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大学。1951年1月，教育部决定接办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将两校合并成立福州大学。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区内设福州大学农学院。1952年厦门大学农学院并入福州大学农学院，是今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以后改名福建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子教会大学，1915年在南京开学。

1911年冬至1912年初，美国8个传教会在上海聚集一堂，制定在长江流域开办一所女子大学的计划，并向在这个地区工作的传教士发出倡议。1913年夏，由美国北长老会，北浸礼会，南、北卫理公会，基督会等各选3人，组成校董会，是年11月13日，校董会公推北长老会代表德本康夫人为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校长。1914年11月教会的管理董事会正式通过以金陵女子大学名称代替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名称。

1928年，德本康夫人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推选金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获博士学位的吴贻芳为校长。

1930年12月，金女大立案照准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1930年12月，金女大立案照准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1951年，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私立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主体与南京大学合并。

沪江大学：

1902年，经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和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代表各自差会合作筹备，在杨树浦军工路购得165.5亩土地，建造第一所校舍，名思晏堂。1906年，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了浸会神学院（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是万应远博士

（Dr.R.T.Bryan）。

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校长是柏高德博士（Dr.J.T.Procter）。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1910年成立格致部（理学院前身），设置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课程。

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为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博士（Dr.Francis John White）。此后校务发展很快。

1913年，葛学溥教授在学校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到1930年，社会学系成为全校除商业系外学生最多的学系。

1914年，根据副校长董景安的建议，校董会将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同年，沪江大学同学会成立。1916年，其生源已涉及国内九个省。

1916年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表彰沪江大学的办学成绩，特授予"澡雪心神"的匾额。

1917年，沪江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立案，并获得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沪大创设沪东公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实验基地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学校在杨树浦路1509号购置了一处原为教堂的房产，作为沪东公社社址，"以供沪大社会学系之实验；同时又为教育、宗教、经济各学系实习之所"，亦为提升当地社区文化和生活质量的社会服务中心。

1918年，校园面积扩充到303亩。

1920年5月、6月，孙中山、美国教育家杜威先后来校演讲。

1920年秋，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1929年3月18日，沪江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英文校名也由Shanghai College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大学部按国民政府规定，文理商、教育科改为文、理、商、教育4学院（后将教育学院并入文学院）；中学部、小学部改称附属中学（沪大附中即今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沪大附中分校即今上海市金陵中学）、附属小学。

1933年，中国建筑师学会陈植、黄家骅、庄俊等人应刘湛恩邀请，筹划兴办沪江城中区商学院建筑科。该科为两年制专科，以招收在建筑事务所工作的在职人员为主，以培养能力工作的建筑师为办学目的。该科始终得到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大力支持，许多学会会员主持或参与教学工作，是当时上海最早正规的建筑教育基地。

至1936年，校园面积320余亩，大小建筑40余幢，在校学生由最初时的4人发展到900余人。大学部设有文、理、商三学院二十个系，并附设研究院、中小学、幼稚园。1937年8月统计，沪江大学已有各类建筑物五十余幢（所），总房产估值近四十万美元。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分别并入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为今上海理工大学。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在旧中国最初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以后收归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

广东官民希望哈巴博士能在广州尽快建立一座理工学院。当时有400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有乡绅、学生、商人和其他人士，全部是非基督徒。这些人中包括10位翰林院、11名进士、100多名举人和秀才、100多名政府官员。哈巴看了请愿书非常高兴，说："我从未听说在整个传教史上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同意将校址定在广州。第二年，哈巴开始在美国募捐基金，设董事局。

1888年，按照美国式大学创办的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在沙基金利埠（现六二三路）开办了。哈巴担任管教，有学生十多名，学校以"本诸基督精神设施最高标准的教育"为办学理念。

1904年迁至广州市海珠区康乐村，改名岭南学堂。

1918年定名岭南大学，主要设立文理科，由美国人任学校监督（校长），中国人任副监督和教务长。在美国设有董事会。

自20世纪30年代起，岭南大学先后设立文、理、工、农、商、医等学校；在理科招收研究生，颁授硕士学位，还与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一些大学建立交换生制度，并和美国纽约大学相互承认毕业生学位。该校教学注重基础理论，大力发展自然科学，重视英语训练，提倡体育运动，学术空气浓厚。国内不少著名学者曾先后在该校任教。

1952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理工科合并，组成现

在的华南理工大学，校址设在岭南大学旧址。其余学科经过合并调整，分别组成中山大学、今华南农大、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医学院。

辅仁大学：

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并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创始人之一同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与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英达祖父）。

1922 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逝世，庇约（ Pius ）十一世继任。他对中国文化素所重视。6月，传信部长要求全美本笃会各会院协助合作，促成北京公教大学的建立。后又任命刚恒毅（ Celo Constantini ）总主教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着手创办公教大学。到 1924 年 2 月，教宗鼓励本笃会会士来中国建校。

1924年6月27日，罗马教廷发布敕令，确定北京公教大学为一所教廷大学，并且赋予圣文森总院长筹建大学全权。

1924年8月，本笃会委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圣文森会院（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院长司泰莱（ Aurelius Stehle ）负责进行，其他各会院予以支援。司泰莱受命后， 1925 年 1 月即任命发起人奥图尔为公教大学校长，教廷委司泰莱为监督，全权处理未来在北京设立公教大学一切事宜。

1925 年2月，奥图尔来中国北京筹备建校工作；3月，以16万美金，永租李广桥西街10号原涛贝勒府，作为北京公教大学校址，计地 65 亩，原有房屋 600 余间。租定后，鸠工修葺，7月完工。1925年7月，在校内另辟一部开设国学专修科，招收学生一班23人；10 月 10 日正式开学，讲授中国文

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课，作为升入大学的预科，取名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委派英敛之任社长。聘请四位著名学者陈垣（ 历史学家 ） 、张蔚西（地理学家）、郭家声（前清进士）和李泰 棻（史学家）担任主讲。

11月28日，辅仁社社长英敛之将辅仁社成立经过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请准立案。

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邓黎昌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药物学家彭勤淄、美国迈阿密大学化学研究所夏松谰、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叶嘉莹、日本驻华第一任大使小川平四郎等，都曾是辅仁大学的学子。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作家萧乾等也都曾在这里就读。

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现辅仁大学旧址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震旦大学，原名震旦学院，由马相伯神父于1903年2月27日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马相伯是震旦大学的首任校长、董事长和终生校董，尽管同耶稣会有矛盾，仍然是震旦的主要捐助人，并在有生之年运用他的影响支持震旦。1908年迁址卢家湾。1928年改称震旦大学。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

University和Université l‘Aurore。

震旦大学为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大学，曾经有“东方巴黎大学”美誉，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校，拥有中国第一家博物馆“震旦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至1947年，震旦大学设有医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文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两所附属中学，并附设两所高级护士学校。

1952年秋，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震旦大学被撤销，其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在原址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系科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震旦附中和震旦女附中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原址合并改为上海市向明中学。震旦大学原址现为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舍。

另外，李提摩太对办山西大学的巨大贡献等，几乎举足轻重。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多深刻的影响，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155899

（有删节）

国内有哪些组织、机构是由基督教会创建，而今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基督教会起源的？

民国时期中国的教会大学共有二十三所，其中基督教大学二十所。

十四所在华教会大学1919年10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大学校长会议，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的，这十四所大学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这十四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全部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这些大学称为“在华十四所”。

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有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岳阳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已开设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它们称为“会外五所”。

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加入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有区别，简称“协和”。

此外天主教教会大学有三所，分别是辅仁大学，简称辅仁。起初由中国神

父创设的教会大学有上海震旦大学，简称“震旦”，还有天津工商学院，简称工商。

第一家教会医院于1828年在澳门，由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开设的。至1949年共达340余所，遍布全国各地。（出自：神经百科）其中最著名的有：
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Tsai）１８３４年３月，由美国公理会的传教教士伯驾，在广州长堤开设的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是眼科医局。孙中山先生曾经在该院习医，改名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改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现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830年美国公理会派遣裨治文前往广州行医传教。1836年郭雷枢（T.R.Colledge）发表《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商榷书》首倡用治病的方式在华传教，主张教会多派遣医师来华，并与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传道会。从此传教活动以医学传道为依托。
仁慈医院（Love and Mercy Hospital）是由美国南长老会创办，是位于江苏淮安的一所著名医院。1887年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年，赛珍珠之父）和林嘉善（Edgar A rchibald Woods）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清江浦慈云寺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仁慈医院。

武汉大学广慈医院又名武汉市第五医院，开办于1923年，是爱尔兰传教士创办的一所教会医院。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也称为大同市肿瘤医院。１９２４年由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设立的医院。
湘雅医学院（现全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是现代医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教会创办的医科大学。医学院位于湖南长沙市。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Yale China Association）联合创建。创始人叫胡美博士（Edward Hicks Hume）和颜福庆先生。建校于1914年。先后更名为湘雅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2000年4月29日更名为″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由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工业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而成的“西南大学”之一。

苏州广济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广济医院）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之一。由美国传教士惠更生（James R. Wilkson）于1923年创建。座落于苏州西部的古运河之畔。

由英国圣公会差会（1799年）所建立的21所医院是：

北海普仁医院，在维多利亚教区及港粤教区，1849年创办。

杭州广济医院，宁波仁泽医院，慈溪保黎医院，临海恩泽医院，在浙江教区，1872年创办。

保宁仁济医院，绵竹教会医院，在华西教区，１８９５年创办。

福州柴井医院，福清惠爱医院， 普爱女医院，连江普孺医院，霞浦圣教医院，屏南潘美顾女医院，宁德妇幼医院，建瓯基督教男医院，建宁妇幼医院，莆田圣路加医院，华实产科医院，仙游圣路加医院，罗源圣教女医院，在福建教区 （Fkien Mission）1906年创办。

桂林道生医院，在桂林湘教区 （Kwangsi Hunan Mission）1909年创办。

昆明惠滇医院，在云贵教区 1947年创办。

南京鼓楼医院于１８９２年创办。创办者马林（William E Macklin, 1860/1947年）是一位19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教著名传教士，加拿大人。鼓楼医院前身叫“基督医院”，俗称“马林医院”。１９１４年1月金陵大学收购“基督医院”，更名为“金陵大学鼓楼医院”。１９５１年改名叫“南京市人民鼓楼医院”。文革期间更名为“反帝医院”。1972年更改为“南京市鼓楼医院”沿用至今。１９８７年合并成南京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名华美医院，建于1843年。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马高温（D.J.Macgowan）兴办。迄今有167历史，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西医医院之一。

方济会圣心医院与耶稣圣心堂由数座带有文艺复兴后期的教堂建筑风格组成，占地1200平方。它始建于1922年。坐落在当时的天津意大利租界伊曼纽尔三世路（Corso Vittorio Emamuele）。今河北区建国道73号，当时隶

属于天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圣心医院原称意大利医院，现名为天津市第一医院住院部。
上海卫生疗养院创办美国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米勒尔和蓝德盛192９年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罗别根路（今长宁区哈密路1714号）建成了卫生院总部，即今天的空军上海第三医院。后又在虹口区老靶子路（今虹口区武进路）创立了医院的分部，即今天的海军411医院。
扬州浸会医院旧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苏北人民医院内。该医院由美南浸信会差会伊文思医师（Dr.P.S.Evens）创办于1900年（光绪26年），作为医院和传教士疗养所。
福康医院现称为绍兴市第二医院，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成区延安路123号。最初为1910年由美国传教士高福林（F.W.Goddard）于南街马坊桥所创办的教会医院（也称绍兴南街基督教医院），原为眼科为主的西医诊所。１９５４年改为绍兴市第二医院。该院的中医肾病专科为省级重点扶持专科。
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由美国人约翰 克尔（John Kerr）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支持下于1898年创办。是中国第一间精神病专科医院。曾用名：惠爱医癫院，惠爱医院，克尔氏医院，广州市第十人民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科大学，1882年英国苏格兰教会创办）。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沈阳市妇婴医院（1933年英国人建立的基督教会医院）。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雅安医院起源于1904年美国传教士柯理思创办的基督教会“仁德”医院和１９４６年的文辉医院。１９５１年初成为西康省第二医院和西康省第一医院。几经演变成为现在的雅安市人民医院。服务半径２１０公里，人口３００—５００万。是雅安市及其邻近地区的医疗，教学，科研，急救和技术指导中心。
“旧楼医院”的创办者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年3月18—1921年3月）是苏格兰人。于19世纪后期到台湾南部传教行医，是英国第一

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在台南首建一所西医医院。他的两个儿子也继承父业在台湾行医。
马偕医馆由乔治　莱斯里　马偕（Dr.George Leslie Mackay，1844年3月21—1901年6月2日）１８８０年在台湾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他是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台湾人称他是马偕博士或牧师。父亲是苏格兰人。马偕博士１８６７年于多伦多大学神学院毕业。１８７０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返回加拿大，同年底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科深造，于１８８０年获颁皇后学院（今皇后大学）荣誉神学博士。
赞育医院（Tsan Yuk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华人产科医院，位于香港岛西营磐，于1922年由伦敦会　传教士创立。赞育医院原址在西边街，１９５５年搬至医院道现地址。

上述资料源于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

其它有关传教士创办的上海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仁济医院，—１８４４年由英国伦敦传教士威廉　洛克哈脱创办。曾用名：仁济医馆，中国医院，麦家圈医院。文革中改为：工农兵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公济医院，也称上海红十字医院—１８７７年创办，它的前身是法国军人医院，迁到北苏州路后称公济医院。
上海同仁医院—１８６６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从前叫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同仁医局。
上海妇产科医院—１８８５年美国妇女布道会威廉逊夫人捐款建立的医院。曾用名：威廉逊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红房子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１９００年由德国宝隆博士创办。曾用名：宝隆医院，同济医院，中美医院。
上海胸科医院—１９０３年由美国圣公会建立。曾用名：广仁医院，宏仁

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１９０７年由法国教会创办。曾用名：广慈医院，圣马利亚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１９２０年由中国女医生石美玉和美国女教士胡遵礼共同创办。曾用名：伯特利医院。

以上资料来源《旧上海医院扫描》秦延模著

+++
+++
+++
+++
+++
+++
+++
+++
+++
+++
+++
+++
+++
+++
++++++++++++++++++++++++++++++++++++++